



《绍兴文博》编委会

主编：金 燕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史 霖 沈一萍 沈方圆 张丽君

金 燕 娄 烈

紹興文博

二〇一九

SHAOXING WENBO

绍兴博物馆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目录

第一篇 学术研究

001

- | | | |
|-----|--------------------|-----|
| 002 | 徐渭家族墓地历史沿革述略 | 周燕儿 |
| 012 | 天泉桥与“天泉证道”考 | 张玲琳 |
| 019 | 关于南宋龙泉窑青瓷研究的文献综述 | 唐若瑶 |
| 027 | 所见一套民国绍兴县文书述略 | 凌达彬 |
| 046 | 绍兴峡山都督第建造者及始建年代之我见 | 易舟 |

第二篇 文博论坛

053

- | | | |
|-----|---------------------------------------|---------|
| 054 | 传承青瓷文化重塑瓷源形象的探索与实践 | 王晓红 |
| 060 | 从近年出台的政策法规
谈新时代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 | 杨晔城 |
| 070 | 新时代博物馆诠释方式的困境与出路 | 方慧超 |
| 077 | 博物馆与社会教育服务功能刍议
——以绍兴博物馆为例 | 何志方 |
| 082 | 开展口述历史项目 传承本地优秀文化
——以绍兴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为例 | 茹笑辈 |
| 089 | 古建筑消防安全现状和对策分析 | 李立波 翁倩琳 |
| 094 | 绍兴名人故居文化的创新运用和前景 | 史霖 |

第三篇 史海钩沉

097

- 098 军事与开发：“兴越灭吴”背景下越地的经济文化发展 钱入深
- 108 耕耘播种在越文化研究的田野上 余德余
——我的越文化研究 40 年小结
- 122 维护国家“风宪”的历史遗存 孙伟良
——西湾“进士第”牌坊及其主人陈穀
- 127 “王城”考 张钧德
——由王城的史料、民俗以及民间故事等推论其是越国陪都

第四篇 人文绍兴

131

- 132 剡地与戴逵、戴颙相关遗迹介绍 王鑫君
- 142 论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的当代价值 邵剑耀
- 148 论绍兴堕民的日常生活 谢一彪
- 161 “大运河”曾让“越酒行天下” 谢 寰
- 172 白洋：一部人与海的发展史 王悦希
- 176 此“己巳”非清同治八年(1869),而是民国十八年(1929) 叶村人

第五篇 文物鉴赏

179

- 180 葛云飞营装披挂 娄 烈
- 183 鸚鵡镜的奇妙故事 娄 烈
- 186 泗龙桥 马峰燕
- 189 绍兴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北宋越窑青瓷简介 陈 峰

第一篇

学术研究

徐渭家族墓地历史沿革述略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周燕儿

【摘要】本文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为依据,对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戏剧家徐渭家族墓地的形成以及清代官民重修和现代保护修葺的经过,进行全面梳理、考述,为推进徐渭研究和做好墓地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新的资料。

【关键词】徐渭 家族墓 沿革 考述

徐渭是我国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戏剧家。徐渭家族墓地在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里木栅村姜婆山东北麓,由徐渭墓、徐渭父母墓、徐渭兄嫂及儿子墓组成。关于该墓地的历史沿革,由于史料匮乏,过去很少有人涉猎,现据历史文献所及和调查采访所得,不揣鄙陋,综述如下。

一、明代徐渭家族墓地的形成

徐渭家族拥有里木栅村姜婆山墓地始于何时,徐渭诗文语焉不详,其他历史文献亦未见记载。但从徐渭撰《题徐大夫迁墓(代)》^①获悉,

^①(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题徐大夫迁墓(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8页。

明正德十六年(1521)徐渭之父徐鏊去世时,尚未出现该墓地。又据徐渭在迁葬父母墓后为仲兄徐潞追作的《仲兄墓志铭》^①推测,该墓地的购置时间,应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或稍后,最早入葬的是徐渭仲兄徐潞。(图一)



图一 徐渭兄嫂儿墓

徐潞,字文邦。诸生。曾仿效其父徐鏊至贵州龙里卫军籍参加乡试,嘉靖二十年(1541)应试途中,患病客死他乡,享年40岁。其妻童氏将其遗体火化后,“拾其骨以归,葬父旁”^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徐渭长兄徐淮病卒,亦葬于家族墓地。徐淮,字文东,号鹤石山人。平生喜踢球、炼丹、客游、交友。徐渭在嫡母苗宜人死后,曾“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③。徐淮卒年54岁。妻杨氏。徐渭在迁葬父母墓后追作的《伯兄墓志铭》中,即有“以某年月日葬父母侧,合嫂杨”^④之记述。

明万历七年(1579)九月,徐渭为祭祀方便,将其父徐鏊和嫡母童氏、苗氏3人,迁葬(改葬)于徐渭家族墓地。徐鏊妾苗氏(即徐渭生母)以及徐渭妻潘氏、张氏,亦一并附葬,从而形成一座规模较大的墓冢。对此,徐渭《畸谱》有载:万历七年“秋,劳韩吴二贤改葬先考妣两室人,而未及两兄嫂,至今以为缺事”。^⑤这句话透露出:徐渭父母合葬墓是从他处迁葬(改葬)于此的新建墓;徐渭兄嫂墓是未经迁徙整修的原葬墓。是年,徐渭《与李子遂》信中也有“又稍治先人之莹,迨于罢锤,计亦凉

①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仲兄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3—634页。

②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仲兄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3页。

③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自为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9页。

④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伯兄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3页。

⑤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四册《畸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0页。

冷”^①之语,时间相符。徐渭在代南京兵部郎中王畿所撰的《题徐大夫迁墓(代)》中则写得更具体:“兹以万历七年九月廿有六日再改葬于此,合以童苗两宜人,祔以季子渭之母苗君,及其两妇曰潘曰张。童宜人所出伯子曰淮,妇杨;仲子曰潞,妇童。墓去此以步计,祭可告以合飨。”^②又据沈定庵《徐文长墓》介绍:徐渭父母等合墓“铭文的作者署着:‘赐进士南京兵部郎中表侄王畿拜撰’,旁一行刻着:‘渭儿谨书’”。^③可见,当时徐渭父母的墓碑铭不仅为徐渭撰文,而且还为徐渭书丹。此外,徐渭《治冢五首》中“买地苦无资,葬地苦无术,伏地苦无亨,改地苦无溺”^④等句,亦道出了此次营建墓地的艰辛与无奈。(图二)



图二 徐渭父母墓

徐渭父亲徐鏊,字克平,性喜竹,故号竹庵。因祖上在贵州龙里卫列有军籍,为获取功名,便来到云贵参加乡试,于明弘治二年(1489)中举,任云南巨津州知州,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卒。原配童宜人,生二子:徐淮、徐潞。早亡。继配苗宜人,云南江川人。“性绝敏,略知书。”^⑤未生育,卒于嘉靖九年(1530),被徐渭尊为嫡母。她对徐渭十分宠爱,如同己出,故徐渭《自为墓志铭》中有“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⑥之句。对于她的死,徐渭在《畸谱》中亦发出“渭百其身莫报也”^⑦的感叹!妾苗氏,系苗宜人婢女,徐渭生母,卒于明隆庆二年(1568)。徐渭原配潘氏,会稽人,系广东阳江主簿潘克敬之女。

①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三册《与李子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2页。

②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题徐大夫迁墓(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8页。

③ 沈定庵著:《定庵随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④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一册《治冢五首(夜观野火于松间,故三首云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

⑤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嫡母苗宜人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2页。

⑥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自为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9页。

⑦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四册《畸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6页。

嘉靖二十年(1541)与徐渭成婚,生子徐枚。嘉靖二十五年(1546)病故,年仅19岁。继配张氏,嘉靖四十年(1561)与徐渭成婚,生子徐枳。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徐渭误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撒手人寰,葬于家族墓地。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①说明其墓穴为生前营建。由于明清方志对徐渭墓地的记载极为简略,如清康熙《山阴县志》中只有“徐渭墓在木栅山”^②7字,清嘉庆《山阴县志》中亦仅见“徐渭墓在城西南十五里里木栅山”^③14字,故墓前最初是否树碑,已不得而知。(图三)



图三 徐渭墓

根据现有调查资料,徐渭墓前最早的墓碑,为万历年间著名文学家、“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所题。1987年,笔者随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沈作霖先生调查徐渭墓地时,曾听沈先生说起:“20世纪60年代初,《徐文长》^④一书的作者徐崙先生,从上海来绍兴寻访徐渭遗迹,当时我在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曾陪同他来到里木栅村,在村民的带领下找到徐渭墓地。记得墓碑上镌‘有明一代才人文长徐先生之墓’13字,碑阴还有题刻。徐先生看得很仔细,现场做了记录,他告诉我,这墓碑是袁宏道题写的。临走前还叮嘱我们要好好保护徐渭墓地。”

①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二册《自为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0页。

② (清)高登先修,(清)沈麟趾等纂:康熙《山阴县志》卷十六《祠祀志三·徐渭墓》,清康熙十年刻本。

③ (清)徐元梅修,(清)朱文翰等纂: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四《寺观冢墓·徐渭墓》,清嘉庆八年刻本。

④ 徐崙著:《徐文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别号六休、石头道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以宏道文学成就最大。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较深,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中的地位;于诗文不满李攀龙等的拟古主张,强调抒写性灵,旨在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作品多写闲情逸致,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艺术上则有感情色彩强烈和描写细腻的特点。后期以“淡”为“文学之真性灵”^①,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

袁宏道和陶望龄,是徐渭死后“遇见”的两位“伯乐”。徐渭生前“名不出于越”^②,死后在他们的发掘和彰扬下,才青史留名。特别是袁宏道,更将徐渭誉为明代“第一诗人”^③,并评点刊印《徐文长文集》。然而,查袁宏道撰《瓶花斋集》^④、《解脱集》^⑤、《潇碧堂集》^⑥、《锦帆集》(附《去吴七牍》)^⑦,陶望龄撰《歇庵集》^⑧,除收录各自所作的《徐文长传》外,还有诸多论及徐渭诗文、书画的书简,但却未见有袁宏道题写徐渭墓碑的文字。考袁宏道游历绍兴,在友人陶望龄家中发现并激赏徐渭诗文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夏之交,而袁去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故其为徐渭题写墓碑的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之间。

由于袁宏道和陶望龄对徐渭的推崇,徐渭墓地也逐渐成为文人墨客慕名拜谒之地。明末绍兴籍文学家王思任、戏曲评论家祁彪佳等,都曾邀集诗友祭扫过徐渭长眠之地。然而,由于徐渭晚景凄凉,身后萧条,二儿不才,且又“垂老无孙守墓田”^⑨,致使墓地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至明末,墓地已是松竹覆压,荆棘当道,杂草丛生,出入祭扫成为难事。祁彪佳在《游兰亭禹穴纪》中提到,“迨舟过梅里山,徐文长之墓在焉。”“诸友小憩古松庵,各以诗吊之。文长有知,当怒骂余辈,余辈不敢辞。”^⑩从此文亦可窥见徐渭墓地的荒凉和无处憩息的景象。而祁氏所作《吊徐文长先生墓》(其一)曰:“樵径无人行,长松覆古屋。欲访高士踪,松涛满空谷。”^⑪更表达出他敬仰徐渭,寻访徐渭墓地而又无法接近的怅憾之情。

徐渭家族墓地最后入葬的是徐渭的两个儿子,即徐枚、徐枳(一作徐杜),有现存徐渭兄嫂和儿子墓的墓碑可证。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3页。

② (明)袁宏道撰:《瓶花斋集》卷七《徐文长传》,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③ 范桥、张明高编注:《袁中郎尺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

④ (明)袁宏道撰:《瓶花斋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⑤ (明)袁宏道撰:《解脱集》四卷,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八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⑥ (明)袁宏道撰:《潇碧堂集》二十卷,明万历三十六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⑦ (明)袁宏道撰:《锦帆集》四卷(附《去吴七牍》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⑧ (明)陶望龄撰:《歇庵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乔时敏等刻本。

⑨ (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一册《春兴(紫洪笋绝佳)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

⑩ (明)祁彪佳撰:《远山堂文稿》不分卷《游兰亭禹穴纪》,北京图书馆藏清初祁氏起元社抄本。

⑪ 王红卫:《祁彪佳诗歌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二、清代官民重修徐渭家族墓地

徐渭家族墓地在清代早期,依然一片荒芜。直至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才有过3次不同程度的保护和修缮。

徐渭家族墓地首次保护是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当时山阴县知县万以敦鉴于徐渭墓地已“片石未刻,更久将湮没矣”^①,特立《天池先生墓表》碑。碑文约1100字,除抄录徐渭《自为墓志铭》外,还记述了徐渭的奇人、奇事,以及晚年“绝粒十年,挟一犬与居”^②的凄惨境况。墓表的监制者为时任山阴县典史沈伟。《诗巢今雨唱和集》第一集收有万以敦所作诗一首,记录此次树立墓表事宜。诗前小序曰:“余宰山阴,得访文长翁故居并修其墓,时墓表初立,书于碑阴。”^③诗曰:“古藤聊与祀生时,七十三年事事奇。幕府偶然笈白鹿,相门何苦觅青伺。文参司马监争长,狂谢中郎夜读碑。竹前有筠人有焰,客星炯炯照天池。”^④可见,当年《天池先生墓表》碑阴刻有万以敦的题诗。后该墓表移置于绍兴城内龙山诗巢,今已不存。

万以敦,字觉山,云南临安府阿迷州人。清雍正元年(1723)恩科举人。曾任浙江山阴,山东肥城、汶上等县知县。据清嘉庆《山阴县志》载:万以敦任山阴县知县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任上“拒宾客,绝苞苴”,“廉正有声”。^⑤又注重海塘堤防建设,乾隆二十五年(1760)修复被风潮摧毁的绍兴三江口所城。万以敦与会稽籍诗人、易学家茹敦和交谊甚深,茹敦和曾为万以敦的《戴星图》作题跋。万以敦莅绍期间,曾归里省亲,茹敦和又以《送山阴邑侯万觉山明府归滇》诗相赠。又据清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云:万以敦为官时,还曾以自己的俸禄去替贫民缴纳赋税;买来粮食去救济受灾的饥民;平反过不少冤狱,释放受株连的绅士数名。著有《觉山小草》等。其弟万以徵,字久齐,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曾任广西平乐府恭城县知县,亦以清廉闻名。

徐渭家族墓地第二次保护修葺是在嘉庆年间。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山阴人陈昌从施姓手中购得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作为住宅,为礼敬徐渭,在保存原有景物的同时,补筑点缀了“酬字堂、婴(樱)桃馆、柿叶居诸胜”^⑥,形成“青藤书屋八景”,总占地面积约5亩,兼具园林之美。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著名金石学家、浙江巡抚阮元应陈昌之请,

①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十七类《金石》第四十五册《天池先生墓表》,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93页。

②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十七类《金石》第四十五册《天池先生墓表》,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92页。

③ 董纪林:《〈青藤古意〉杂识》,中国柯桥网2008年3月7日。

④ 董纪林:《〈青藤古意〉杂识》,中国柯桥网2008年3月7日。

⑤ (清)徐元梅修,(清)朱文翰等纂: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二《名宦·万以敦》,清嘉庆八年刻本。

⑥ 陈五六主编,周燕儿执行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第四册《碑版编·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8页。

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碑文，提出了徐渭“有墓在山阴之木栅乡，碑跌仆泐，松楸惨然，倘能即为修葺，不使湮没于荒榛蔓草间”^①的愿望。陈昌遵阮元之嘱，打破不为外姓修墓的旧俗，决定出资重修徐渭墓地。但由于其时陈昌已经年迈，力不从心，便遣二子陈鸿逵、陈鸿熙寻访徐渭墓地，“摹断碑，勒石”^②，又“清界址，培土木，春秋祭扫，岁为例焉”^③。对此，清平步青《陈无波征君》^④、《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碑跋语^⑤等均有提及。陈鸿熙《徐文长先生墓在山阴之木栅乡，阮芸台中丞抚浙，命鸿熙兄弟访其地以表之，鸡豚致祭，岁以为常。谨赋一诗，即以告墓》即为此修葺徐渭墓地而作。诗云：“磊落孤坟三尺崇，英灵凭吊百年中。松楸惨澹重林古，枚枳凄凉旧卯空（先生二子名枚、枳，皆无后）。谁信啸天声似鹤，我知埋地气成虹。故居愧作青藤主，端合春秋祀此翁。”^⑥清钱泳《青藤书屋（绍兴）》中“况复披榛木栅乡，年年寒食拜斜阳”诗句，以及“盖文长无后（此语不实），有墓在木栅乡，将湮没矣，而陈氏昆仲复为修葺而祭扫之，又文长身后之遇也”^⑦之语，亦可资佐证。

关于陈昌重修徐渭墓地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但依据上述诗文，大致时间段仍可框定，即在阮元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碑的嘉庆九年十二月之后，阮元任浙江巡抚期间。查《浙江省人事志》（《浙江省志》丛书）^⑧，阮元曾先后三次出任浙江巡抚，其中符合修葺徐渭墓地条件的，为嘉庆六年（1801）至十年（1805）、嘉庆十二年（1807）至十四年（1809）两次。据此，陈昌修葺徐渭墓地的时间，应在嘉庆十年至十四年之间。

陈昌，原名陈遐龄，字永年，号尚古主人。上舍生（大学生）。祖陈荣杰，字遂南，一字无波，号慕陵道人。诸生。曾任云南琅盐井提举。学识渊博，与毛奇龄、仇兆鳌为忘年交。“诗格清丽，尤工集唐，随题拈韵，凑拍天成。”^⑨著有《慕陵文集》《慕陵诗稿》等。兄陈松龄，字乔年，号大岩。诸生。著有《大岩剩草》。陈昌于嘉庆十年（1805）编有《青藤古意》一册^⑩。该书除自撰《青藤古意小略》一文外，主要辑录王思任、黄宗羲、董瑒、毛奇龄、阮元、商盘、洪亮吉等近 20 位名人题咏青藤书屋的诗文，以及文献中有关青藤书屋的记载和徐渭传记，是研究徐渭故居的宝贵资料。陈昌之子陈鸿逵、陈鸿熙、陈鸿磐等，均为越中名士，寓居青藤书屋。

① 陈五六主编，周燕儿执行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第四册《碑版编·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58 页。

②（清）平步青著：《霞外捃屑》（中）卷四《夫移山馆集闻·陈无波征君》，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25 页。

③ 陈五六主编，周燕儿执行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第四册《碑版编·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58 页。

④（清）平步青著：《霞外捃屑》（中）卷四《夫移山馆集闻·陈无波征君》，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24—225 页。

⑤ 陈五六主编，周燕儿执行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第四册《碑版编·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58 页。

⑥（清）潘衍桐辑：《两浙轶闻续录》卷十八《陈鸿熙》，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

⑦（清）钱泳撰：《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青藤书屋（绍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⑧ 浙江省人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人事志》第一篇《历朝浙江史治》，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47 页。

⑨（清）阮元、杨秉初辑，夏勇等整理：《两浙轶闻续录》第七册卷二十八《陈荣杰》，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59 页。

⑩（清）陈昌编：《青藤古意》，清刊本，绍兴王德轩先生藏。

陈鸿逵系陈昌长子,字用仪,号九岩,晚号迎曦。自幼好学,与弟鸿磐夜读,母亲要他们睡觉,他们常假装熄灯焚香,待母亲熟睡后继续燃灯苦读。嘉庆十三年(1808)考取举人,曾任广东大洲场盐大使,为两广总督阮元所器重。后负责运送军粮至四川,因病告归。他事母笃孝,终身勤俭。虽耄耋之年,仍步履稳健,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视细字书不需目镜”^①。清同治二年(1863)卒,享年84岁。陈鸿逵精研古典诗文,著有《囊翠楼诗稿》。蔡元培早年曾藏有此书,并载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十日《日记》^②。

陈鸿熙系陈昌次子,字丙南,号十峰。肄业于蕺山书院。诸生。曾随父客居吴中,遍交当地名流,切磋琢磨,学业大进。清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方正。工诗文,善书画。其诗“汉魏、六朝、唐宋靡所不学,而不专袭其貌”^③;其书绝似董其昌;其画以山水居多。著有《藤阿文稿》《藤阿吟稿》,书名出自“青藤书屋八景”中的第二景“漱藤阿”。

徐渭家族墓地第三次修缮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由陈逢申出资钩摹翻刻徐渭父母墓前已碎裂的墓碑铭。《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采录的《徐文长先生世墓》碑文所附跋语云:“天池先生手书原碑碎裂,口修人摹勒上石,以垂久远。道光十六年后学陈逢申重修。”^④与此同时,陈逢申还修缮了徐渭兄嫂和儿子的墓,并树墓碑一通。碑高120厘米,宽59厘米,厚13厘米,楷书阴刻,文曰:“明鹤石山人诤淮徐公暨配杨孺人、府学诸生诤潞徐公暨配童孺人、处士诤枚徐公、处士诤杜徐公之墓,道光十六年十月吉立。”^⑤现墓碑保存完好。

陈逢申,原名樾,后改名逢申,号安生。陈鸿熙之子。道光五年(1825)举人。对古典诗文研究颇深。还在其参加童试时,所作诗文即得到浙江提督学政汪守和的赏识。晚清文史学家平步青亦称其“得先生(指陈鸿逵)之学为多”^⑥。

三、现代保护修葺徐渭家族墓地

民国时期,徐渭家族墓地基本保持原貌。《天池先生墓表》碑石尚存龙山诗巢,只是石质渐趋风化,其时采录的碑文中,已有三分之一的文字剥蚀难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渭家族墓地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保护。1963年3月4日,徐渭墓被绍兴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

①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五册《人物列传·陈鸿逵》,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② 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③ (清)陈鸿熙撰:《藤阿吟稿》李尧栋《序》,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④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十七类《金石》第四十六册《徐文长先生世墓》,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55页。

⑤ 周燕儿:《绍兴摩崖碑版史实补正》,《绍兴文博2017》,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⑥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五册《人物列传·陈鸿逵》,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期间，徐渭家族墓地遭到毁坏，墓碑用来铺路，祭桌移作他用。尤其是徐渭墓，墓石被挖，墓冢夷为平地。1996年4月，笔者利用参加兰亭里木栅变电所扩建工程考古勘探、发掘工作间隙，经采访当地知情村民后获悉：徐渭墓系单穴券顶砖室结构，规模不大。当年被毁时，葬具无存，尸骨基本腐朽，仅见胫骨（腿骨）残骸，显得较为粗壮。这与史载徐渭“修伟肥白”^①的身躯特征相一致。墓内随葬品不多，只有铜笔套、石砚、瓷水盂、瓷笔架等文房用具，体现了他生前贫困、身后萧条的身世。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当场就被村民打碎。

1987年7月24日，绍兴县人民政府重新公布徐渭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1988年初夏，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查考文献资料、开展实地调查、走访知情人士和咨询省内外文物保护专家的基础上，精心编制修复方案，对徐渭墓地按原样进行修复。在徐渭墓前重树墓碑一块，碑文“明徐文长先生墓”7字，由时任绍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李月兔先生请“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补题。1989年初，在修缮徐渭父母合葬墓时，发现三截《题徐大夫迁墓》碑铭残石，经笔者撰文考证，确为徐渭所书^②，现由文博部门妥然收藏。

1998—1999年夏，绍兴县文保所又对徐渭墓地进行全面修缮。鉴于徐渭父母合葬墓的墓碑铭已毁，便根据《徐渭集》收录的《题徐大夫迁墓（代）》一文，请绍兴著名书法家沈定庵先生重书，碑题改为“明徐大夫墓”，款署：“赐进士兵部郎中表侄王畿拜撰，渭儿谨书。己卯初夏同里后学沈定庵补书。”与此同时，为丰富徐渭墓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县文保所还新建四周围墙、七开间碑廊、三开间徐渭纪念室、接待室等附属建筑和管理用房，总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其中碑廊为单披式屋顶，内壁陈列绍兴县文物部门历年征集收藏的唐宋以来碑版、墓志拓片以及徐渭手书《煎茶七类》碑（翻刻）等30余件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和历史研究价值。此次整修后，徐渭家族墓地形成墓园，并正式对外开放。（图四）

2005年3月16日，徐渭墓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又以“青藤书屋和徐渭墓”

①（明）陶望龄撰：《歌庵集》卷十四《传·徐文长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乔时敏等刻本。

② 周燕儿：《绍兴发现徐渭撰书墓铭残石》，《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第75—78、80页。



图四 徐渭墓园外貌



图五 徐渭纪念室

之名,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绍兴籍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和抱华楼弟子为徐渭墓捐赠香炉一只,炉上镌刻“万古青藤”四字,为何水法所书。同年,柯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徐渭墓园实施环境整治,并重建五开间徐渭纪念室,陈列内容分为“悲歌一生”“一代怪才”“文长故事”“越中十子”“徐渭与阳明心学”五部分,展示徐渭坎坷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图五)

如今,徐渭家族墓地粉墙围护,松篁叠翠,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已成为一处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园林胜景,供游客参观凭吊。

天泉桥与“天泉证道”考

绍兴图书馆 张玲琳

“天泉证道”是阳明心学的灵峰和里程碑,是圣学的制高点,也是阳明心学传播的秘诀或“法门”。“天泉证道”发生在王阳明故居伯府的天泉桥上,由于年代久远,伯府内已经不见天泉桥。由于对“天泉证道”所证之“道”理解上有分歧,也导致了王阳明身后阳明心学的分歧。由于不见了天泉桥,有人也怀疑是否存在“天泉证道”这一心学典故。因此,我们对天泉桥和“天泉证道”情状再作严肃考证显得十分必要。

一、王阳明故居伯府第及天泉桥考

绍兴王阳明故居伯府源于王阳明父亲王华的状元府第。王华因喜山阴佳山水,在登第之前后曾在山阴光相坊东置买宅第。这是王华在山阴的第一处宅第,是王华的始迁地。王华在山阴的第二处建筑是状元府第。王华致仕以后,就在上大路南面,即现在的王阳明故居伯府第的地方建起了状元府第。王华致仕与王阳明赴龙场是同一年,即明正德二年(1507),王华建“状元第”约用了三年时间,等王阳明从庐陵回北京时,“状元第”已启用。但这个状元府第不断在扩建,扩建完

成时,已是正德十二年(1517)了。扩建的房子据说是为王阳明回家居住准备的,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北海新居”。王阳明在给妹夫徐爱的信《与徐曰仁书》中说:“……北海新居,奴辈能经营否?虽未知何日得脱网罗,然旧林故渊之想,无日不切,亦须曰仁时去指督,庶可日渐就绪……”^①写信时,王阳明和诸氏夫人一起在赣州,新居的布置由家里的用人料理,王阳明希望在山阴养病的妹夫徐爱去给予指导。王华在山阴的第三处建筑是光相坊西的三个大台门。王华考虑到四个儿子都已到成家立业的年纪,而且女儿女婿也要住在一起,于是打算在光相坊西边建造三个台门,给另外的三个儿子成家用。关于这三个台门的建设,王阳明在给父亲王华的信中都有提及。王阳明于正德六年(1511)给父亲王华《寓都下上大人书》中说道:“闻欲起后楼,未免太劳心力,如木植不便,只盖平屋亦可。”^②这是王阳明对建造光相坊西面房子的建议。

王阳明故居新建伯府第,绍兴民间多称伯府,这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的住宅,是在王华状元府第的基础上改建的。据王诗棠回忆,王阳明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朝廷封其为“新建伯”,次年钦赐御建伯府。同年二月十二日,王华去世,丧成后,王阳明才将状元府第改建为伯府第。伯府曾是华东地区明清时期最宏伟的私人宅邸之一,占地面积十六亩。主要建筑有豪华的伯府大厅。大厅梁柱由珍贵的材料构筑,屋顶高大,鹤立鸡群,威武雄壮。三十多年后,伯府前面的豪华宅第吕府建成,绍兴民间有顺口溜:“吕府十三厅,不如伯府一个厅。”虽然吕府占地四十八亩,比伯府大三倍,但就大厅来说,仍比不上伯府。由此说明伯府大厅的宏伟大气,也说明明代建筑在气势体量上是有规制的。因王阳明是新建伯,朝廷允许建造与其封号相称的高大的厅。吕府是致仕官员吕本的房子,间数虽多,但房子的体量规模和高度是不能超越当时的规制的。

伯府大厅建成后不到一年,由于弟子众多居住不下,王阳明又在大厅周边建了数幢约五十间楼房,供弟子们使用,这些都是伯府的主体建筑。伯府大厅几经变故,不复存在,在原大厅正门,现尚存一石门框。

伯府的主要建筑都有出典和名字,可惜记载有限,不能一一对号了,但主要的几处建筑还可以考证。如大厅的名称,可能就叫天泉楼。因为大厅是王阳明晚年讲学的主要场所,是伯府的书院。明嘉靖五年

①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1526)三月,董沅来绍兴问学,王阳明有诗《天泉楼夜坐和萝石韵》云:“莫厌西楼坐夜深,几人今夕此登临。白头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鸣榔闲过棹,映窗残月见疏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当年只苦吟。”^①此前董沅有诗《宿天泉楼》,王阳明的上述诗是依董沅诗韵回赠的。从这两首诗里,我们知道伯府里有天泉楼,而这天泉楼是讲学和门生弟子居住的地方。

王阳明在建造伯府的时候,还在大厅的南面、伯府中轴线的东边,原大有仓的地方挖了一个大水池,取名“碧霞池”。碧霞池,民间又称“王衙池”。“王衙池”和“王衙弄”均因伯府而得名。碧霞池西距西小河不足六七十米,河水与池水相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绍兴府志》有记载:“碧霞池,在承恩坊王守仁宅内。”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绍兴地图上,也可以清晰看到碧霞池的位置。可见碧霞池确实是王阳明故居新建伯府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要建碧霞池呢?我们考证,起因在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曾登泰山之巅,拜访过碧霞祠。碧霞元君为泰山之女,在民间信仰中属于生育与平安的保护神。王阳明与妻子诸氏结婚三十多年,却一直没有生育。于是他在扩建伯府之时,添建碧霞山房,挖碧霞池,希望自己老来得子,以续王家香火。

经过这次考古调查,挖到了碧霞池原址地基,发现现在的碧霞池大小基本与原来一样,只是在北边缩小了2米左右。也就是说,原来碧霞池北边直接与房墙相连,没有现在使用的2米宽的路。现在的碧霞池东西长35米,南北宽24.5米,位于王阳明故居中轴线东南面。

王阳明在挖碧霞池的时候,把挖出来的土堆到大厅的北面,堆起一座南北宽10余米、东西长20米、高4—5米的“假山”,假山上设“观象台”,是王阳明夜观天象所在。王阳明三十一岁时,因病在会稽山阳明洞天修炼养病,洞天北面的山上也曾辟观象台,以便夜观星象。因此,伯府填土设台也是王阳明的内心想法。伯府大厅西南面50米左右,建有“伯府大埠头”。河边南自谢公桥、北至北海桥的狭长沿河小道,叫“船舫下”。

约嘉靖四年(1525)初,伯府主体建成后,由于跟随王阳明学习的门人增多,伯府边上的至大寺、光相寺、天妃寺都住满了人。为了满足弟

^①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子居住的需要,由弟子王艮等负责,在光相桥东下大路王家老宅的基础上建成了阳明书院,供弟子听课和住宿。但阳明书院和伯府主体北隔上大路和一条河,约有百米的距离。王阳明过世后,阳明书院前建成了阳明祠,后来连同阳明书院通称为“文成祠”,供大家祭拜。

伯府大厅虽然仅剩一个石门框,但观象台和碧霞池俱在,西小河和王衙弄依然是伯府的东西分界,上大路和吕府依然是伯府的南北分界。伯府主体地面框架原封未动,这为我们保护重修提供了条件。遗憾的是不见了天泉桥,而天泉桥是“天泉证道”典故的发生地,学术意义十分重大。文献记载有天泉桥,但天泉桥是什么样子的,在什么位置,没有具体记载。带着这个问题,市文保所2019年初对碧霞池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碧霞池中间有一个建筑遗址,近百平方米的台基,与历史文献记载碧霞池中的建筑物大小相符。根据考古发现,碧霞池的建筑遗址正对伯府东厢房,池中建筑物与东厢房之间应有桥相连,这桥就是“天泉桥”。

对天泉桥的记载自明末消失,估计天泉桥毁于明末清初。那么,天泉桥是石桥还是木桥呢?针对这个问题,考古报告明确地回答,考古发掘后,只发现建筑遗址,没有石桥桥墩遗迹。这样可以断定,天泉桥不是石桥而是木桥。

文献记载可以印证:天泉桥上可以设席宴饮。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五日,王阳明和门生弟子在天泉桥上大摆宴席,共度中秋。大家借酒助兴,载歌载舞,场面热闹。王阳明忘却了所有的烦扰,这算得上是这些年来少有的高兴。王阳明作诗两首,记载了当时欢乐的场面。《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撓!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①

《周海门先生文录》卷之二《越中会语》记载了阳明弟子周汝登等人在天泉桥开展的一次纪念王阳明的活动：

辛丑中秋之夜昏，时微云稍翳，已而云净月朗，诸友迎先生，凡五十余人，宴于碧霞池之天泉桥。酒数行，先生曰：“此桥乃阳明夫子证道处也。证道在嘉靖丁亥岁，先三年甲申亦以中秋燕门人于此，在侍者百人。月白如昼，酒酣歌发，诸生兴剧。阳明子乐之，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今日我辈复宴于此。秋同节也，地同景也，月同明也，歌同声也，人同济济也，真是百年稀有之遇，便当不负。……”^②

这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秋，王阳明弟子周汝登与诸友及弟子五十余人宴于碧霞池之天泉桥的场景。周汝登作诗《中秋大会天泉桥》云：“天泉桥上会群英，露湿罗衣鼓瑟声。证道百年人未散，赓歌千古月常明。偶同令节原非拟，一扫浮云若有情。不到此中谙与兴，男儿几已负平生。”多种文献记载说明，天泉桥在碧霞池上。

二、“天泉证道”考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与门人朱得之、杨文澄讲论良知心学，首揭“王门四句教”。嘉靖六年(1527)初，王阳明再与门人讲论良知心学，修正诠释“王门四句教”。嘉靖六年(1527)六月，王阳明接到朝廷诏旨，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九月八日，启程赴两广，有诗别诸生。《别诸生》：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

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③

虽然写了告别诗，但阳明先生还是放心不下，以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为代表的门人弟子对“四句教”有不同理解，他正准备找机会给他们说清楚。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载：

九月壬午，发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

①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周汝登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究竟话头。”德洪曰：“如何？”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畿曰：“明日先生起行，晚可同进请问。”^①

第二天接待完访客已是夜深，王阳明听闻学生钱德洪和王畿前来拜访，请老师王阳明判断对“四句教”理解的错对。王畿和钱德洪都是王阳明在绍兴讲学时收的弟子，两人入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机灵聪敏的王畿和稳重踏实的钱德洪很受王阳明的器重，在王门也有很高的地位。王阳明带着两人来到碧霞池的天泉桥上。天泉桥是王阳明与弟子经常论学的地方。王阳明笑着对两人说：“正要你们有此一问！我明天就要启程，朋友当中还没有论到这一层的。你们两人的看法正好相辅相成，没有谁对谁错，不可以非此即彼。王畿要用钱德洪的功夫，钱德洪要悟透王畿的本体。你们两人互取对方所长，我的学说就完满了。”原话是：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馊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②

王阳明以为，人心本来就是清澈透明的。在他的学生中，有一部分能够领悟到心就是本体；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由于外界所蒙受的太多，应该扫除掉这些，才能够领悟到本体。

钱德洪和王畿正好是这两部分人的代表。王畿应该注意钱德洪所说的为善去恶的功夫，钱德洪则应该明白王畿所说的本体。

①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再次嘱咐弟子说：

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可不早说。（《传习录》）^①

由此可知，四句教虽然说到本体，但主要是讲成圣成道致良知的功夫，意蕴着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等不可分割的功夫。

因此，“天泉证道”是阳明先生选择了一个神圣的地方“天泉桥”，向弟子及世人作出了一个严肃的决定，即致良知的内在义路就是“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先生这四句教言，是开“心、意、知、物”四面，以揭示一德性实践的内在义路。

阳明先生“天泉证道”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四句教”的正确性、可行性、唯一性。阳明先生虽然没有否认王畿的“四无说”，甚至表示王畿的理解与自己本意的契合，但这是肯定王畿的颖悟，是他与得意弟子王畿之间的私下交流，不是“良知教”的教育安排。阳明先生告诫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再次嘱咐弟子：“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天泉证道”进一步揭示了心学中最基本的三大关系问题，即“知与行”“本体与功夫”“良知与致良知”。明确“行”“功夫”“致良知”的重要性，使世人进一步领会致良知于吾心、致良知于事物物的重要意义。“天泉证道”是心学的高峰，也是心学成熟的标志。但“天泉证道”后，阳明心学还是走向了分裂，这是心学本身的问题。心学本来就是体悟之学，缺少客观规范，容易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我们不能因阳明心学以后的分裂来贬低“天泉证道”的学术意义，否定“四句教”的定盘星作用。

^① 引自《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关于南宋龙泉窑青瓷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美术学院 唐若瑶

【摘要】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窑系,南宋时期是其集大成的昌盛阶段之一。近年来研究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的资料很多,并逐渐由概括式的整体研究发展为面向不同部分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大致分为龙泉窑与官窑关系、烧造工艺、装饰方法、海外传播、美学内涵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南宋时期 龙泉窑 青瓷 综述

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窑系,位于浙江省西南部,自创烧以来发展变化延续至今,南宋时期更是其集大成的昌盛阶段之一。明代和清代的古籍中有对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涉及南宋龙泉窑的文献多数是考古方面的发掘报告,具体的研究资料比较少。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出现系统性的研究,并逐渐由概括式的整体研究发展为面向不同部分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经过整理,大概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部分黑胎青瓷与南宋官窑关系的研

究,这在研究史上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由于决定性的发掘出土证据缺乏,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别;二是关于南宋龙泉窑烧造工艺的研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南宋龙泉窑的烧制工作一直在进行,这项研究开始较早,文献也相对翔实细致,在此主要分为胎、釉两方面进行陈述;三是关于南宋龙泉窑青瓷器形及刻花纹样装饰的研究;四是关于南宋龙泉窑青瓷的美学内涵研究,这两部分有重叠之处,但不同文献有其侧重点;五是关于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海外传播的研究,以海外发掘为基础,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出土状况进行陈述总结。

一、龙泉窑与官窑关系研究

早在1982年的《中国陶瓷史》中就提到该问题,认为龙泉窑中的黑胎青瓷不是传世哥窑,而是仿南宋官窑的一种。查阅之后的论文与期刊资料可发现,在该问题上许多专家学者仍然支持这种观点。^①

关于这一问题,明代古籍《菽园杂记》中“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常被学者用来佐证部分窑口曾用于烧制规格超出民间器的官家瓷器,很可能属于“官搭民烧”的性质,此处“上等”应该是指专供朝廷的宫廷用瓷。^②该文认为哥窑是南宋官窑(包括龙泉大窑搭烧的官窑)中的一部分黑胎厚釉开片类青瓷,哥窑说法源于明中后期民间所传,没有确实根据。但2009年林志明所作《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记载窑址上发现了刻有“章”的匣钵,一定程度上为民间传说提供了一些依据。^③

2013年,陆明华所著《试述龙泉黑胎青瓷》将两者关系阐述得更系统具体。指出目前主要存在的观点有三:一是在龙泉烧造的南宋官窑产品;二是南宋时期杭州官窑瓷或元代的仿品;三是南宋官窑烧造以前就产生的进贡瓷器。

针对以上观点,该文逐条进行了研究。总结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官方倾向非常明显,但至今仍缺乏直接认定为官窑的硬依据。龙泉窑中的黑胎青瓷与慈溪上林湖低岭头、寺龙口产品性质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低岭头、寺龙口窑场被定义为官窑,龙泉窑中这部分青瓷也可作相同认定;如果低岭头、寺龙口窑场是“制样须索”的产品,龙泉黑胎青瓷可能也属于近似的类别。此外,由于慈溪上林湖低岭头、寺龙口窑场出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页。

②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嘉靖年本,第10页。

③ 林志明:《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现时间比杭州地区的官窑早,也不排除是仿上林湖产品。对于一直以来的仿官窑说法,该文认为龙泉窑中黑胎青瓷烧造较为分散,而官窑的烧制一般相对集中,仿南宋官窑的可能性依然是极大的,且性质很可能是“官府指定的仿烧官窑作品”,即“官仿官”。^①

二、胎、釉工艺研究

关于胎色,《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记载,绝大部分南宋龙泉窑青瓷为略带灰的白胎,其次是香灰胎,也有少量纯白胎。较深的胎色使釉面呈现偏灰的粉清。^②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所著《龙泉历代青瓷烧制工艺的科学总结》记载,南宋时期龙泉窑胎的铁含量比较高,大致为2.1%—2.4%,黑胎青瓷甚至高达4.5%。而龙泉地区的瓷土中铁含量较低,为提高铁含量,一般采取在胎中掺杂紫金土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使胎色白中带灰,衬托釉色更显雅致。这一点可能是受北方青瓷及越、瓯窑的影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瓷器的烧成温度。此外,这种方式有助于烧成后二次氧化形成“紫口铁足”。^③除加入紫金土外,《中国陶瓷史》研究得到胎色变化也与烧制温度有关。“烧成温度高,胎呈深灰;烧成温度较低,胎的颜色也相应变淡。”^④2017年,夏侯文、夏侯辉的《龙泉青瓷装饰研究》记录关于胎底的研究,发现南宋龙泉窑普遍存在底部未上釉区域出现黄色或红色的“朱砂底”的现象,成因是胎内的二次氧化。^⑤

关于釉的研究,雷同的文献较多。大部分认为价值最高的是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成因在熊樱菲的《历代龙泉青瓷釉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南宋以后龙泉青瓷釉中的过氧化钾含量明显提高,石灰碱釉的使用这一创造性进步使釉色更雅致,且由于石灰碱釉比较黏稠,容易堆积创造出玉一般较厚的温润质感。另外,该文认为南宋时期多次施釉和还原气氛控制技术的提高,使龙泉青瓷釉可以质地如玉并拥有青翠釉色。^⑥

另外,还存在一些相对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如《中国宋代龙泉青瓷釉的组成和结构》提到,普遍认为南宋时期龙泉青瓷釉的半透明性是由于石英颗粒和气泡的存在。而经过分析比对得出龙泉青瓷釉相当粗糙,结晶相应应该是其半透明性的成因。^⑦大部分文献资料提到,南宋时龙泉青瓷拥有的玉质感是多次施釉形成薄胎厚釉的效果。《龙泉青瓷烧制

① 陆明华:《试述龙泉黑胎青瓷》,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2页。

② 林志明:《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③ 周仁、张福康、郑永圃:《龙泉历代青瓷烧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④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⑤ 夏侯文、夏侯辉:《龙泉青瓷装饰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⑥ 熊樱菲:《历代龙泉青瓷釉的初步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16卷第2期。

⑦ P.D. 范迪弗、W. D. 金格瑞、张侃:《中国宋代龙泉青瓷釉的组成和结构》,《中国陶瓷》1989年,总第104期。

技艺》则记载大部分灰白胎青瓷产品看上去多为单施一次厚釉，而溪口黑胎青瓷则多有多次施釉的痕迹。原因可能是白胎青瓷烧制温度相较溪口更高，釉层融合无法分辨施釉分界线。^①

三、器形及装饰研究

杜鹏《宋代龙泉青瓷的装饰风格及特点》关于刻花、纹样研究比较细致。认为南宋早期釉色尚未发展到极致时，仍部分继承北宋的刻花，刀法变化多样，使刻花富有韵律、变化自如。^②根据《龙泉青瓷装饰研究》所作，南宋时，因为“厚釉失透”，刻花、划花、篦纹等已经很少见，改为浮雕、弦纹和堆贴花。使用最广泛的装饰是器物外壁的莲瓣纹。南宋晚期，盘底双鱼纹、樽式炉外堆贴花卉纹样也很普遍。^③《宋代龙泉青瓷的装饰风格及特点》阐述莲瓣纹和鱼纹的演变。早期莲瓣尖呈圆形，内划直线，晚期莲瓣多肥硕，瓣脊清晰明显。单鱼纹较早出现，在双鱼纹装饰的器物中，两鱼同向者一般比两鱼相向者早。^④（附图）

李纪贤在《宋元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美》中记载，南宋龙泉窑青瓷一般薄胎厚釉，为避免棱角部分过于圆润，没有瓷釉厚薄变化，显得呆板，烧制过程中会充分关注器物转折处釉的不同厚度，恰到好处地进行处理，使器物呈现出“出筋”的效果。^⑤

- ① 林志明：《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98 页。
- ② 杜鹏：《宋代龙泉青瓷的装饰风格及特点》，《徐州教育学报》2007 年，第 22 卷第 4 期。
- ③ 夏侯文、夏侯辉：《龙泉青瓷装饰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34 页。
- ④ 杜鹏：《宋代龙泉青瓷的装饰风格及特点》，《徐州教育学报》2007 年 12 月，第 22 卷第 4 期。
- ⑤ 李纪贤：《宋元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美》，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7—84 页。



附图 南宋龙泉窑青瓷双鱼洗，口径 13.4cm，底径 6.0cm，高 4.0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孟龙《略谈龙泉青瓷的装饰方法》研究了器形的特殊之处及雕塑饰纹。如出现像生器物,即根据植物造型塑造出的器形。另外,该文记载,南宋时期为体现釉色,出现装饰精巧的双耳或盖纽。耳和纽大部分为半立体,模印后装饰在器物颈、肩或盖顶部位,对器物形体起到较好的装饰作用。南宋时多采用塑、印、贴的顺序。^①

关于器形,贺夏在《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与纹饰艺术》中提出仿古类器物,即南宋时期龙泉青瓷部分器形以古代礼器中青铜器和玉器作为蓝本,还有部分仿铜器产品。该文认为,这部分产品很多是作高级陈设品用。在此文中,作者还提出南宋时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了部分新造型。^②

张建平《龙泉青瓷书法装饰创新研究》关于青瓷表面文字有相关记叙。研究得出南宋中早期仍有部分带文字的青瓷产品,有些直接用白釉书写,有些为印刻,后期这种方式逐渐变少。许多碗盘底部有“河滨遗范”或“河滨违范”方章,表明龙泉窑坚持自己是陶瓷烧制的正宗。另外,南宋龙泉窑生产的常用瓷器上常见一些吉语,如“福”“寿”“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一般是用楷体书写,表达人们的美好期盼。南宋时期龙泉窑发展繁荣,为表示区别,在大窑、溪口等窑址匣钵上会刻一些文字记号。^③

四、海外传播研究

新加坡的林亦秋先生在《寻找龙牙门——印尼宋元明龙泉青瓷的行踪》一书中研究了在印尼的南宋龙泉青瓷。认为13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兴起,由于回教徒认为青色是吉祥之色,印尼青瓷输入量增大。另外,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阿拉伯等国家和中国海上贸易交往频繁,印尼位于航线冲要地区,存留了大量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众多龙泉青瓷碎片甚至完整器物。南宋时期青瓷大多出土于慕西河,釉色保存良好,凸雕双鱼盘碟数量占多数,在印尼用以餐宴盛食。^④

林姝伶所作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龙泉窑青瓷研究》一文,研究了对日传播的情况。认为宋代龙泉青瓷传播主要依靠中日两国间商人、僧人的交流往来。该文指出,南宋初期日本逐渐鼓励对外贸易,平清盛掌权时,开启了濑户内海的水上航道。镰仓幕府时期,宋代采取积极的海上贸易政策,并给予日本商船一定的优待。此时中国茶文化在日本

① 陈孟龙:《略谈龙泉青瓷的装饰方法》,《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

② 贺夏:《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与纹饰艺术》,《中国陶艺家》2006年9月。

③ 张建平:《龙泉青瓷书法装饰创新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

④ 林亦秋:《寻找龙牙门——印尼宋元明龙泉青瓷的行踪》,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447—459页。

的流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陶瓷茶器的外销。而龙泉青瓷也正处于产量很大的繁荣时期,成为输出日本的瓷器中占比很大的一部分,大量通过庆元港输出日本。日本称粉青釉青瓷器为“砧青瓷”。南宋晚期至元代,“砧青瓷”生产规模扩大,开始大量外销。此时日本政局稳定,也开始有能力输入“砧青瓷”。该文还得出结论:龙泉青瓷输入日本带去了瓷器烧制技术,日本青瓷的样式、烧制方法、釉色特点也基本上是学习宋代龙泉青瓷。^①

《冯先铭谈宋元陶瓷》研究古代外销瓷问题时考据了朝鲜和韩国地区,即高丽。指出南宋时期与高丽商业往来频繁,官商私商兼备。虽然韩国出土北方窑系瓷器更多,但龙泉窑青瓷应该是南方出口最大的窑口之一。^②

另外,还有一些距离较远的海上传播研究。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德雷克·康奈特、张然和英国大英博物馆赛斯·普里斯曼所作《近东地区考古遗址发现的龙泉窑瓷器——英国威廉姆森藏品及斯拉夫遗址调查藏品中的龙泉窑青瓷简介》一书,研究了英国和斯拉夫的碎瓷片出土情况。记载威廉姆森藏品中龙泉窑残片数量达到了1002片。南宋末期的龙泉青瓷残片中莲瓣纹小罐发现比较多,粉青釉色;胎色不太致密,呈灰白色;外侧分布莲瓣纹样。与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及埃及等地出土状况相似。进行海外贸易时基本选择节省装载空间的器形。“龙泉青瓷的贸易和传播,先流行于海岸线附近的区域,然后向内陆传播。”^③

《浙江龙泉青瓷海外流传历史及风格演变研究》一文对其在非洲的传播也有简单研究。指出主要流传于东非埃及和坦桑尼亚地区。具体形制与其他地区相似。多用于显示财富与地位。该文还总结龙泉窑青瓷传播受航海条件限制,多盛行亚洲,欧洲、非洲的出土以碎瓷片为主。^④

五、美学内涵研究

有关美学内涵研究主要是结合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进行的。陈和杰、余艾琳的《回归自然之美——小覷宋代青瓷》总结南宋龙泉窑青瓷“釉色润、色调纯、品质雅”,认为龙泉青瓷清秀简洁的特点

① 林姝伶:《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龙泉窑青瓷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② 冯先铭、冯小琦:《冯先铭谈宋元陶瓷》,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③ 德雷克·康奈特、张然、赛斯·普里斯曼:《近东地区考古遗址发现的龙泉窑瓷器——英国威廉姆森藏品及斯拉夫遗址调查藏品中的龙泉窑青瓷简介》,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45页。

④ 汪梅、米朝辉:《浙江龙泉青瓷海外流传历史及风格演变研究》,《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13年第2期。

是士大夫审美取向的反映。釉色至青,而青色是东方色的代表,且中国古代有东方为上的原则。天青色釉符合宋代人追求的自然美,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中庸思想和道家“天得一以清”的理念。^①黄胜在《论宋代青瓷的美学品格》中认为,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装饰简洁含蓄,力求造型整体统一,并非“为装饰而装饰”,而是延续“天然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作者还将这种风格归为一种自然韵味,认为是南宋时期人们追求感情与自然,拒绝绝对理性的表现。^②R. L. 霍布森在《宋元器物3:瓷器》中也得出结论:南宋龙泉窑青瓷的迷人釉色反映出中国文人崇尚“天人合一”。^③

《宋元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美》根据南宋时烧制的符合文人雅趣的文房用具、棋子及鸟食罐等,得出南宋时期社会文化有闲、雅取向的结论。另外,此文还认为宋代的复古思潮也影响了龙泉窑青瓷的造型,比如仿古青铜器鬲、觚、觶、投壶,多用于陈设观赏。虽然仿青铜器,却非古代青铜器的磅礴大气,“而成为宋时统治阶层和文人士大夫精致生活和典雅气质的产物”。^④而只在龙泉窑地区发现的仿周代礼器玉琮的琮式瓶,因方形器有别于传统的圆形、卵形,更营造出庄严稳重感。

叶永平所作《论宋代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特征》认为,南宋龙泉窑青瓷的釉色及装饰是为追求“玉”代表的祥瑞美好及纯净无瑕的品格。^⑤

六、总结

在进行文献整理、筛选、综述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近期关于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研究的文献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且进入21世纪后研究方向更多样,内容也更具体。对龙泉窑中黑胎青瓷与官窑关系的研究仍没有确凿的定论,在现今及日后依然是研究重点,但随着更多古窑址的发掘,研究材料的可信度逐渐提升。对烧制工艺的研究分为美学研究和为现代烧造服务的单纯工艺研究两大类,其中关于釉色研究的文献相对比较雷同。造型及装饰研究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研究角度也更多样,由于南宋时期早中晚阶段造型装饰各不相同,也有文献从演变的角度展开研究。对海外传播的研究文献多以海外出土为基础,但总述类资料比较少。对美学内涵研究的文献与对釉色、器形、装饰纹样等研

① 陈和杰、余艾琳:《回归自然之美——小窥宋代青瓷》,《陶瓷研究》2016年第10期。

② 黄胜:《论宋代青瓷的美学品格》,《美术观察》2007年第2期。

③ R.L. 霍布森:《宋元器物3:瓷器》,《伯灵顿杂志鉴赏家》1909年第15期,第75页。

④ 李纪贤:《宋元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美》,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⑤ 叶永平:《论宋代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特征》,《艺术与设计》2010年,第2期。

究的文献有重合之处,之所以单列板块是因为该部分文献更侧重青瓷器物与此时社会人文精神的链接。

总体来说,文献资料虽翔实丰富,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完整的梳理,且许多研究资料都是在重复前人的观点,缺乏新的见解或结论;另外,对黑胎青瓷与官窑关系的研究,仍是一个存世之谜。希望在将来更多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器物出土的条件下,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更精确的资料考证,人们对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研究能有更大的飞跃。

所见一套民国绍兴县文书述略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凌达彬

【摘要】笔者现有一套民国绍兴县文书，共40件，包括抵补金执照20件、上下忙执照18件、业户执照1件、推收费收据1件。文书以缴纳田赋执照为主，年份从民国四年到民国十六年，连贯有序。公布考释这套文书，希冀为研究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赋税变革、国家地方税收制度创建及征税流程等问题提供原始档案，也希望能够对了解绍兴地方历史文化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同时，作为实体文物，其内田赋版串票单的形制演变，也能为研究绍兴乃至浙江、全国版串提供可作对比的基础材料。

【关键词】绍兴 文书 地丁 抵补金 田赋

笔者现有一套民国绍兴县文书，2019年3月收自杭州二百大文物交易市场^①。文书以缴纳田赋执照为主，年份从民国四年到民国十六年，连贯有序，且户主三易，产权更迭、推收过户资料犹存，颇为难得。源于此，作文介绍这套文书有关内容，并浅略注释、考证，希冀为研究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赋税变革、国家地方税收制度创建及征税流程等问题提供

^① 据售者口述，此批文书为其在无锡乡下购得，由户主上人自绍兴迁入无锡时携带而来，是老家绍兴所有产的证明材料。在所售文书纸堆内，确也以无锡、绍兴这两区域为大宗。关于文书来源的真实度，实无法考证，于此仅表备查。

实物资料与参考意见,对了解绍兴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及地名更替也稍有裨益。

此套文书共 40 件,户主先后为陈兴、王益记、陈鸿生三人,包括执照(抵补金)20 件、上下忙执照(地丁)18 件、业户执照(户粮推收)1 件、收据(推收费)1 件。另有 1 张民国二十七年陈鸿生绝卖屋契,虽然卖屋与上述赋税事宜无什关联,但契内部分文字对解读业户陈鸿生其人及分析整套文书流传、经历会有一定帮助,特后文一并稍做引用介绍。

一、内容概述

1. 上、下忙执照

今据会稽上都亡(望)图/坊业户陈兴所有产,完纳民国四年分上(下)忙成熟地丁,原额银四分四厘(上忙)/四分五厘(下忙),每两连粮捐折征一元八角,合银圆 $\times\times\times$ 正。

附加县税照原额银每两带收银元四角四分正,合银元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备荒特捐照原额银每两带收银元三角六分正,合银元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自治附捐照原额银每两带收银元八分正,合银元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塘闸捐照原额银每两带收银元七分正,合银元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征收费照原额银每两带收银元一角六分二厘,合银元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

小塘/曹蒿捐钱(上忙)

经征人: $\times\times\times$

中华民国 \times 年 \times 月 \times 日绍兴县县公署给执,会字第一百八十(汉字小写)号。

此民国四年分上、下忙执照为二联串票形式,长 26.5 厘米,宽约 21 厘米,上忙在左、下忙在右。两忙内印刷文字除上忙联左下角加“小塘/曹蒿捐钱”外,其余文字相同;页面中间有“已完民国四年分上下忙成熟地丁八分九厘”大号字样,左、右边页分别为“已完民国四年分上忙成熟地丁银圆 $\times\times\times$ 正”“已完民国四年分下忙成熟地丁银圆 $\times\times\times$ 正”。页面盖三枚红色“绍兴县知事印”方印,一枚“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椭圆印。

同四年分还有一张上、下忙执照,是陈兴另一块所有产地纳税之凭

证,印刷文字内容一样,只是地址变为“永都昌图/坊”“原额银一分三厘”,以及中间大字变为“地丁二分六厘”,结尾“会字第694(苏州码子)号”。

此套上、下忙执照共收 18 件,年份自民国四年到十六年,缺少十三、十四、十五年份,同一年一般 2 件,也有单存 1 件。和下文抵补金执照一样,民国五年改盖“绍兴县印”,民国十年开始户主由陈兴转为王益记。

版面文字为印刷体,其版式可分为五种,一版:民国四年;二版:民国五至六年;三版:民国七至八年;四版:民国九至十二年;五版:民国十六年。具体变化、区别情况如下:

民国五年:中间大字开始改为“已完五年分上下忙共地丁”;一县之印改盖篆书“绍兴县印”。

民国七年:备荒特捐开始改为“三角”。

民国九年:上忙左下部分开始改为“海塘/曹嵩捐钱”;删除“经征人”。

民国十年:业主变为“王益记”。

民国十一年:单有“二分六厘”一张。

民国十二年:单有“八分九厘”一张;带红色竖排戳字“自十七年四月一日起|新旧银米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带征军事善后|特捐各计银圆



图一 地丁上、下忙执照(民国四年)

一元正”，内容与民国十二年成熟抵补金执照上戳字相同。

民国十三、十四、十五年：缺。

民国十六年：只有“八分九厘”一张；另印刷文中加了一种税捐，名称文字模糊不清，税率为“每两带收银元一角一分”；页面上端中间加戳红字“每两带征亩捐银一元二角正”；“会字第二百七十七号”，其他“八分九厘”上下忙执照皆为一百八十号。

2. 执照

今据会稽上都亡(望)图 / 坊业户陈兴所有产，完纳民国四年分成熟抵补金，原米一升陆合，每斗五角，合银圆 $\times \times \times$ 正。

特捐照米额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合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征收费照米额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五分，合 \times 元 \times 角 \times 分 \times 厘。

经征人： $\times \times \times$

中华民国 \times 年 \times 月 \times 日，绍兴县县公署给执，会字第 107（苏州码子）号。

此民国四年分抵补金执照，长约 27 厘米，宽约 9.5 厘米。左右边页还同印大字“已完民国四年分成熟抵补金银元 $\times \times \times$ 正”，页面盖两方“绍兴县知事印”，一枚“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椭圆章。

此套 20 件抵补金执照页面“原米”额数，分“一升陆合”“五合”两种，为户主陈兴或王益记两份地产所应缴纳抵补金之征额。“一升陆合”执照文书坐落全为“上、望”，“五合”执照则为“永、昌”。年份自民国四年到十六年，仅缺少十四年执照，同一年一般 2 张，也有仅存 1 张。现存执照文字主要为蓝紫色印刷字，留空处墨书，原米征额内容为黑色戳字。

各张执照版面、排版及文字大体相同，除年份数字有变化外，一些如填写内容、印章、数字等也存在明显区别。一是民国十年开始，户主由陈兴转为王益记。二是民国四年页面盖隶书“绍兴县知事印”，而民国五年到十六年，一县之印全部改盖篆书“绍兴县印”。三是征收税费的费率，即数字略有浮动。个别年份上还会加戳红色字句，戳文为所派增捐税说明，也有仅戳数字用来修改印刷出的捐税税率数字的。

若从版面印刷体文字出发，20 张抵补金执照就可分为七种八版。一版：民国四至五年；二版：民国六年；三版：民国七至八年；四版：民国

九年；五版：民国十至十二年；六版：民国十三年；七版：民国十五年；八版：民国十六年。税率变更颇为频繁，具体如下：

民国四至五年：每斗五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五分。

民国六年：每斗四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五分；加戳“民国六年分抵补金□□」省长□省□□省会议□□每石折征银三元带」收省附税银一元抵补金特捐银五角……」银一角五分计每石共应收银四元六角五分□」除此年减抵银一元外实共收银三元六角五分”。

民国七至八年：每斗四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四分二厘五毫。

民国九年：每斗三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四分二厘五毫、省地方税每石带收银元一元（仅有“五合”执照）。

民国十至十一年：每斗三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三分六厘五毫、省地方税每石带收银元八角。

民国十二年：税率同十至十一年（仅有“一升六合”执照）；加戳“自十七年四月一日起」新旧银米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带征军事善后」特捐各计银圆一元正”。

民国十三年：每斗三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二分七厘五毫、省地方税每石带收银元五角（仅有“一升六合”执照）；加戳，文字同十二年。

民国十四年：缺。

民国十五年：每斗三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二分一厘五毫、省地方税每石带收银元三角。

民国十六年：每斗三角、特捐每石带收银元五角、征收费每石带收银元一角二分七（戳“一”字）厘五毫、省地方税每石带收银元五（戳“三”字）角（仅有“一升六合”执照）。

3. 业户执照

绍兴县知事余为给推收执照便民管业输粮事，今据会稽永都 / 坊昌图庄册陈兴户下后开产亩与册相符，覓保出推于本都 / 坊本图本庄王益记户下入册征粮，於 × × 年输粮为始。除将据备查外，合给执照



图二 抵补金执照(民国四年、民国六年、民国十二年、民国十六年)

执业,须至执照者。

计开:

坐字二百三十, 地四分七厘四毛。(盖“温厚平□”章)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二日给(盖“推收所主任员潘伯文之章”红色长条章)

绍兴县会字二万二百十七号

保除人:天生 / 元茂泰烟店(盖“会稽庄监虞炳晖”红色长条章)

此执照尺幅长约 30 厘米,宽约 18 厘米。右边页有“会字第二万二百一十七号”字样,日期处及右边页处各盖一方红色“绍兴县印”,保除人签字下有“如有添注涂改此单作为无效”红色字戳,页面还有红色戳字“是产倘有□经登记及盗除情事一经告发审判明确应归无效”,及“承纳次年粮米”(和所见成熟抵补金执照、上下忙执照从民国十年开始变为王益记输粮缴费情况一致)。

页面有后加“民十七年除入陈鸿生户”墨书文字,文字上加盖红色椭圆章“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据内容、位置及印泥特征,墨书“王益

记”处红色戳字“进入新户旧户注销”、计开墨书地产字号部分夹红色竖排戳字“此条删除”，应同为王益记将产“除入陈鸿生户”，到县推收所推收过户、呈验各件时添注而来。另外，民国九年“绍兴县知事余”，查资料为余大钧，1919年9月到1922年2月在职。

4. 收据

今据××邑×都×图推/拔户王益记，交到×××户。计出：推/拔□亩□分×厘×毫×丝×忽，呈请推/拔陈鸿生户管业。照章征收手数料银□元□角□分。除填明缴核及存根外，合给收据交收户×××收执，限××日内来所换领新户折及呈验各件。此据(注意)前项呈验各据如有应行归还推户收执之件，由授受双方自行交接清楚。

中华民国×年×月×日，绍兴县推收所给。

此收据长27厘米，宽13厘米。右边页有“字第六千二十号计推收费银××元×角×分”，且盖骑缝章“绍兴县政府印”，页面还有墨书数字。依收据内容，出推事即包括业户执照中王益记民国十七年将其坐字二百三十号“除入陈鸿生户”事。查资料知，绍兴县公署到民国十八年五月才更名为县政府，此收据年份当在此之后，很可能就是民国十八年所开。

二、行政与地名

此批文书距今已近百年，内容又多涉绍兴行政、地望等旧有名词，时过境迁，于今人略显陌生。现依文献等文史资料，做注解或考释如下。

1. 会稽与绍兴

秦始皇郡县天下时，改大越为山阴。南朝陈时，析山阴，分置会稽。至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山阴、会稽并设，成为定制。南宋绍兴元年(1131)，高宗改元绍兴，越州升绍兴府。民国肇起，废府并县，绍兴府一级行政区划取消，山阴、会稽二县合并，始为绍兴县，直属浙江省军政府。

此批民国绍兴县抵补金、地丁执照，坊名前加注“会稽”，而严格意义上讲，当时县一级以下为坊、都，绍兴县县城内直接划为16坊，各有坊名，“会稽”已不是某一地方行政机构划分之层级。这其实与绍兴府城以运河中流为界，东为会稽县境，西为山阴县境，两县城郭皆附绍兴



图三 业户执照、收据

府城的地域历史有关。民国虽将会稽县并入新建之绍兴县,但一县之执照仍然习惯以山阴、会稽先作区分,再写坊、都、图等具体详细坐落,无疑是对清朝“绍兴府会稽县”二级行政体系的延续,一定程度上也是民国初期基层机构对旧行政机制的杂糅产物。

2. 县公署、县知事

明清时期,地方实行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县设知县(正堂、县令)。进入民国,北洋政府县级政府改称县公署,县行政长官民国元年成立之初定为民政长,后旋改称县知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县公署又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

民初县知事一般主持县内政务,或兼理司法。“成熟地丁、抵补金”等征收事宜自然是其主管事务之一,所以页面所盖红色印才见有“绍兴县知事印”,后改盖“绍兴县印”。各执照末尾处“县公署给执”,一方面与县级行政主体责任和权威性有关;另一方面,当时税款为业户自封“赴柜投纳”,银粮柜就设在民国绍兴县公署内,即县前街原清代会稽县衙^①。

3. 上望坊、永昌坊

三种执照中所见“上望、永昌”名,如“上都望图/坊”,“永都/坊昌图”,“望”有的还简写为“亡”,二字分填,但实际上应是“上望坊、永昌坊”。

元代始,绍兴府城内改宋之厢为隅,下设坊,城外改乡为都、里为图,并以数字排列。山阴县城为西南、西北二隅,会稽县城为东南、东北二隅。元代,东南隅下还只是称“望花坊”,东北隅已有“永昌坊”。入明,会稽县东南隅领坊8个,其中坊名见“上望花”“中望花”“下望花”;东北隅领坊8个,“永昌”是其一,坊名犹存。清初继承明制,到宣统二年(1910),实行地方自治,废都、图、隅、里,城内仍为坊,城外改乡、镇。当时,会稽县城共分16坊,坊名包括“上望、中望、下望、永昌”等。民国元年沿袭清宣统二年区划,名称不改^②。

可知,民国“上望、永昌”皆绍兴县城之坊名,“上望”之名为元明之“望花”“上望花”逐渐传衍而来,而“永昌”自元代就有。二坊位置在原来会稽县城内,即城东区块。

①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8页。

②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0—118页。

三、田赋及附加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试行税制结构改革,构建国家税与地方税。田赋为当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除田赋外,往往还带征各色名目附加税。正税为国家税、省税,而附加税则多为县级自治地方税。浙江田赋包括地丁、抵补金两种,一般附加税及临时附加税则名目繁多,各县并不相同。

1. 田赋(地丁、抵补金)

地丁,为所有产土地田赋及人口徭役税之统称,清雍乾时已摊丁入亩,赋役合一,民国继承此制。抵补金,即清代所征之漕粮、南米,原为一种实物税,民国改称抵补金继续征收。《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载:“清之漕粮南米,原为供输京王公百官俸廩、旗营饷糈。民国肇起,国体既更,自可不再继续,元年浙江临时省议会议决地丁征收办法第三条规定,漕南兵米,一律裁免,都督朱瑞以漕南关系国家收入,电准财政部提经国务会议议决,浙江省漕南仍照旧征收,并交由参议院议决办法大纲,将浙江之漕南米名称变更为抵补金。”^①可知,本来民国元年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决之《浙江省地丁征收法议决案》第三条规定“浙西漕南、浙东南兵米一律裁免”^②,但遭到浙江都督抵制,旋又继续征收。直至民国二十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统一改称上期田赋和下期田赋,“地丁、抵补金”才正式废除。

民国初期,地丁和抵补金作为田赋,是按原先银、米数额,即执照所书之“原额银”“原米”,折算银元征收。清旧制粮米计量单位为“石、斗、升、合、勺”等,银数度量单位为“两、钱、分、厘、毫”等,十进制。收取田赋税费时需按照官方串票刊定之税率进行折算,转换成银元征收。实际收支不可能全是整数银元,大于一元可以用银元、军用钞票、纸币,小于一元的用小银元、铜币或制钱等。此结算形式转换为清末民初社会币制变革所致,《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载:“民国元年,浙江临时省议会首先提议将清代繁杂正附名目一律废除,并以生银久不通行,清已折合制钱,再以制钱合成银元,各县折率不一,每元作钱九百文至一千余文不等。因之统一折征银元标准,每银一两各照清原定折征钱数改征银元。”^③

①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56页。

② 《浙江军政府都督公布施行案第二十七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九册,1912年2月6日。

③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54页。

税率方面,地丁执照文书内正税“每两连粮捐折征一元八角”,固定不变。此税率数额源头为民国元年《浙江省地丁征收法议决案》第二条之规定:“每地丁一两各照原定折征钱数改征银元,……应以向来解省之正银一两合洋一元五角及抵补外债之三角为省税,余充县税。”^①正税“一元八角”中,只有“一元五角”为原额国家税,“三角”其实是“抵补外债粮捐”,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加征庚子赔款,民国转为省税^②。而抵补金之正税,执照内民国四年至五年“每斗五角”,六年到八年变为“每斗四角”(六年戳文改为三角),九年及以后又变为“每斗三角”,并稳定到十六年。据《关于浙江省三年度增加抵补金来电二则》《关于浙省抵补金来电五则》:民国之初抵补金税率规定为每石三元。民国三年二月袁政府财政部以命令增加二元,即每石五元。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去世,其称帝本就不得人心,待强人一陨,中央威权更加式微,号令不行,遂引起地方激烈反感。到本年九月,浙江对先前抵补金增加之事表示强烈不满,从浙江省议会、吴兴县议会议长、各县公民等各方纷纷来电国务院参众两院,称修改案为非法,“横征殃民、民力不堪负担”,甚至“誓不承认”此案,要求“恢复原案,以苏民困”。^③又据民国五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为省议会议决回复抵补金法定折价带征省地方税由》:浙江省议会准,“浙东各属五年分抵补金均系随同地丁启征,人民按照五元折价完纳者已居多数,……一年之内法价两歧,……易滋误会。应请令飭浙东各属将五年分抵补金仍照每石五元征收,划出一元留抵六年分抵补金以期便利而免窒碍”。^④所以,绍兴县六年抵补金最初官刊版串为“每斗四角”(即每石四元),少的一元就是上文所述五年分抵补金中“一元留抵六年分抵补金”。但最终,从戳文看,省议会等又重新减税,六年正税改为“每石三元”,但加征“省附税一元”,其余照旧,并“此年减抵银一元”,即为五年划出一元留抵六年分抵补金。到七、八年份又重回“每斗四角”,但取消了每石一元的省附税。九年开始正式为“每斗三角”。可见,六年、九年到十六年版串复定为“每石三元”,尤其六年,无疑是民国五年九月浙省去电北京参众两院争辩的结果,恢复了民初浙江抵补金原案“每石三元”之规定。

此外,抵补金民国六年戳记之“省附税”,民国九年开始改为“省地方税”。其实和地丁内粮捐相同,虽为带征附税,实则也为正

①《浙江省地丁征收法议决案》,《浙江军政府都督公布施行案第二十个》,《浙江军政府公报》第九册,1912年2月6日。

②《都督公布修正浙江省地丁征收法修正条文》,《浙江公报》第一百十册,1912年6月1日。

③《关于浙江省三年度增加抵补金来电二则》《关于浙省抵补金来电五则》,《参议院公报》第二期第十一册,民国五年。

④《国务院为省议会议决回复抵补金法定折价带征省地方税由》,《浙江公报》第一千六百七十七册,1916年11月13日。

税。执照内起始每石一元,逐渐减少为八角、五角,到民国十五年及以后稳定为三角。查资料知,十四年省地方税税率应为四角,因为从十三年起每年减少一角,到十八年止,迨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后,十五年减剩每石三角成为定案,不再递减。^①民国十九年(1930),又颁布《浙江省征收地丁章程》《浙江省征收抵补金章程》,直接规定地丁“一元八角”为正税,抵补金“三元三角”为正税。“原有地丁项下之三角粮捐、抵补金项下之三角省税,各名目均应自十九年分新粮起一律取消,以符法制。”至此,粮捐、省地方税名目,到民国十九年完全取消。其实十九年更名,总税率数额是未有增减的,只是规定统称“正税”而已^②。

所谓“上下忙执照”,始于雍正年间。雍正十三年(1735)规定,地丁银两上半年在二月开征,五月截止,名曰“上忙”;下半年在八月开征,十一月截止,名曰“下忙”。“上忙”和“下忙”所征收的地丁银两,称为“忙银”^③。民国延续每年田赋分上、下忙征收之制,不过浙省开征时间变为三种:上忙为四月一日、五月一日、六月一日,下忙为十月一日、十一月一日、十二月一日,上、下忙开征及终止日期各县由国税厅以命令指定。据民国三年《浙江国税厅筹备处指定各县地丁抵补金开缴日期表》所指,绍兴县等浙东地区上忙开征日期为五月一日,下忙开征日期为十一月一日。^④而纳税期限,因政策法规规定会有所变动,民国三年“每年仍分上、下两忙期,每忙自开征之日起限两个月内完纳”^⑤,晚到民国十九年则改为“上忙自开征起三个月内完纳,下忙则为两个月完纳”^⑥。上、下忙地丁,业户可单独缴纳,也可在上忙期内并纳下忙,悉听其便,但不得强制并纳。至于抵补金征收日期,民国肇起,一向系随地丁上、下忙同时并征。到了民国十九年,颁布了《浙江省征收抵补金章程》,内载:“抵补金征收日期依照地丁为理,但由漕改征抵补金各县适用地丁下忙征收日期”,征收“由地丁征收总柜或分柜兼理,但征册粮串及款项登记均须划清界限”。绍兴县抵补金为浙东南兵米改征,所以仍照地丁上、下忙征收。^⑦征收期限,应“自开征之日起两个月满为截征之期”^⑧。

2. 田赋附加(附税杂捐)

抵补金、地丁执照内赋税除正税田赋外,还有田赋附加税。一般,

- ①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94页。
- ② 《更正各县地丁抵补金以正省税名称》,《浙江省政府行政报告》十一月份,1930年。
- ③ 见清《皇朝文献通考·田赋考·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 ④ 《浙江国税厅筹备处指定各县地丁抵补金开缴日期表》,《浙江公报》第七百五十八册,1914年3月28日。
- ⑤ 《财政部核定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第八条,《浙江公报》第七百三十八册,1914年3月8日。
- ⑥ 《浙江省征收地丁章程》,《浙江民政月刊》第三十一期,1930年6月。
- ⑦ 《浙江省征收抵补金章程》,《浙江财政月刊》第二十九期,1930年5月。
- ⑧ 《浙江省抵补金滞纳金处分暂行条例》第二条,《浙江公报》第四百五十六册,1913年5月24日。

“随正(指正税)带征之特捐附捐及征收费一律於串票上分别刊列,其有临时加征者得加盖戳记”^①。所以,本套抵补金及地丁执照,都是先写明正税(国省税)名目及税率,后面再开列附加杂捐杂税名目及税率,遇临时附加税捐都以红色戳文注明。

本套文书所见民国初期附加税有十多种,如地丁附加县税、抵补金特捐、征收费、备荒特捐等是统一遵令征办,有的根据绍兴地方实际所需经议会议决再呈准开征,如塘闸捐、小塘(海塘)捐及曹蒿捐等,也有上级临时加派,如军事善后特捐、十六年份亩捐等。现分述如下。

特捐、附加县税,一在抵补金项下带征,一在地丁项下带征。抵补金特捐是在民国四年将原先带征之附税统入,改名而来。虽二者名目有别,但性质相同,都是加征的县税,充县地方之用,故又可统称为县税。《重修浙江通志稿·财务略·田赋》载:“抵补金附加县税初由县议会议决承准征收,各县税率不同,三年财政厅令各县一律按每石五角征收,原收不及五角或不征收者,照旧办理,故各县不同。自元年迄二十年,均按石为本位,折征银元。”^②此处县税,即抵补金执照内所见之特捐。所见抵补金执照内特捐税率从民国四年到民国十六年一直保持为“照米额每石带收银元五角”,与上文记载相符。而地丁附加县税,执照内所见一直保持为每两收银元四角四分。

备荒特捐,民国元年开征,地丁项下带征,专充灾荒救济之用,二十二年停征。结合上、下地丁执照看,民国六年及以前每两带征银元为三角六分,民国七年开始降为三角,此税率延续到民国十六年。

自治附捐,民国元年开始从地丁项下带征,和县税一样,是民国县自治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行如教育、卫生、慈善等公益事务及地方行政之用,执照内民国四年到十六年固定为“八分”。

征收费,于地丁、抵补金项下带征,全数留县支配。晚到民国十九年《浙江省征收地丁章程》第五条,其地丁征收费“照正税一元八角规定数带征百分之九,计每两附收一角六分二厘”,仍与本套上下地丁执照后附加征收费数目情况一致。而抵补金征收费税率,按“国家税项下附征收收费百分之三”,即按民国三年到五年正税“每石五元”计,征收费为每石“一角五分”。^③不过,从此批民国四年到十六年抵补金执照看,征收费变化较为频繁,“一角五分”、正税“百分之三”之制仅延续到民

① 《浙江省征收地丁章程》第六条、《浙江省征收抵补金章程》第六条,《浙江民政月刊》第三十一期,1930年6月。

②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56页。

③ 《咨浙江巡按使修正浙省抵补金暂行章程分别照准修改》,《税务月刊》第一年第十号,1914年10月。

国五年,六年时征收费未变,仍为一角五分,但正税已经减为每石四元,已经不是百分之三了。民国八年到十六年之间,抵补金征收费屡有变更,总体逐渐减少,先后有一角四分二厘五毫、一角三分六厘五毫、一角二分七厘五毫、一角二分一厘五毫四种。又民国十九年《浙江省征收抵补金章程》颁布“各县抵补金征收经费每石附收一角二分一厘五毫”,可知此税率从民国十五年起,至少延续到民国十九年。至于,民国元年、二年,动用正项百分之五^①,而元年、二年抵补金正税为每石三元,折算征收费也是一角五分。

塘闸捐、小塘(海塘)捐、曹蒿捐,三者都是为萧绍海塘维护修缮所支收,只是三者征收范围各有规定。萧绍海塘建于明末清初,西起萧山临浦麻溪坝,经绍兴至上虞蒿坝清水闸。民国绍兴县海塘基本维持在萧绍海塘一线,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围涂工程兴起,海塘线才急速北移。

塘闸捐,此附捐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征起,民国元年经绍兴县议会会议决续收,每地丁一两附收塘闸费七分^②,在地丁项下带征,为日常开支管理整个萧绍海塘之用。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地理》载:绍兴“东西临江,北面负海,藉西江、北海、东江三塘以资捍卫……全段塘长一百十八余千米。……沿塘之闸有十,其中因闸外沙地淤涨,闸港淤塞,已失宣泄效能闸洞,业经填塞者为山西闸、黄草闸;闸外沙涂屡涨屡坍,泄水之效能已去十之八九者为姚家埠闸;宣泄灵畅时启用者为三江闸、刷沙闸、宜桥闸、楝树闸、西湖闸。泄水以三江闸为主,刷沙、宜桥、楝树、西湖底四小闸为辅。遇天旱进水之用者为茅山、清水闸”。^③可见,绍兴地区江海环错,北为平原,南列会稽山,海潮山洪久存,水患南北夹击,为保境安民,历代多筑塘修闸。因此,绍兴县塘闸捐之“塘闸”应即此“三塘十闸”。

小塘(海塘)、曹蒿捐,清康熙时已随粮征收,仅支山阴、会稽两县东江、北海两塘塘堤岁修之用,民国顺延征收。^④“小塘”或“海塘”,指萧绍海塘之北海塘,“曹蒿”为上虞曹娥塘、蒿坝塘之合称。“自曹娥楼字起,迄上虞交界之梁湖溪明字止,共四十二字,别为曹塘,实则东塘之一小部分。若蒿塘则居东塘之南,自天字迄盈字,共十字,在蒿山、凤山之间,上置旱闸二座……是以(蒿坝)地虽属于上虞,而塘则隶属

①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95页。

②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八十一册《财务略》,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95页。

③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二类《地理》第三册《各塘概说》,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1页。

④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04页。

会邑。”^①具体征收税率,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地理》言:“案绍萧塘闸经费,旧山会两县向有小塘捐、曹蒿捐,计山阴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二十号,合计田九万二千二百三亩,每亩海塘捐四厘三毫七丝八忽(民国元年县议会议定每亩五厘),又长、宿二号,下田共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七亩,每亩小塘捐二文,两共每年额征钱四百九十三千六百六十九文。会稽荒字至汤字三十四号,合计四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九亩七分二厘,每亩小塘捐四文,计钱六百十四千一百十九文。又果、珍、汤、菜、殷五号,合计田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七亩七分七厘,每亩曹蒿捐钱五文,计钱七十四千六百八十九文。……查清代档案知此项塘捐专为东江、北海两塘岁修之用。”^②而民国税率,新编《绍兴县志》言:“按亩征收,亩征小塘捐 0.004 元,曹蒿捐 0.005 元。”^③笔者以为,民国地丁执照单列此捐钱名目,且不刊印税率,其税率征收应非统一标准,应与清朝相同,按田地性质及等级作依据划分来征额税率,范围也非全县,仅是受塘闸之益相关之地域。



1. 民国十二年抵补金执照军事善后特捐



2. 民国十二年地丁上下忙执照军事善后特捐



3. 民国十六年地丁上下忙执照亩捐

图四 田赋下带征军事善后特捐及亩捐戳文

① 《绍萧塘闸工程局呈报视察东蒿各塘情形文》，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2292 页。

②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二类《地理》第三册《经费沿革》，广陵书社 2012 年版，第 165 页。

③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县志》，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404 页。

亩捐,仅民国十六年地丁项下每两带征 1.2 元,以 1 年为限,一般称十六年份亩捐。此亩捐为临时加派特捐,非定例。

军事善后特捐,民国十七年四月一日起,在地丁、抵补金项下带征,

为临时性质特捐，“以地丁每两、米每石，各加一元”。十八年军事结束，军事善后特捐旋停，后改名建设特捐。此处“军事善后”，指北伐之事。民国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北伐军右路军周凤岐部入绍兴，解除孙传芳卫队旅武装部队武装。

整体看，民初田赋及附加税，在抵补金、地丁下附加税捐名目都有增变，也都会加征一些临时税捐。一般，抵补金下所带附加税捐主要是特捐、征收费、省地方税，名目较少。地丁下则名目多杂，如附加县税、备荒特捐、自治附捐、塘闸捐、征收费、小塘捐、曹蒿捐等。然而就税率而言，抵补金正附税的税率变化更为频繁，地丁则相对稳定。地丁除备荒特捐有一次削减外，其余多年皆未调整。还有，正附税比例方面，一般年份地丁、抵补金之正税税率会明显大于附加税捐，但若当年遇临时加派杂捐，附加税捐税率则会陡增，典型如地丁下带征军事善后特捐、亩捐之年份，甚至超过地丁正税，可见当时田赋带征附税杂捐十分繁重，民力困乏堪忧。

四、征税机构及实施办法

绍兴县田赋征收机关人员设置，在民国四年到民国八年抵补金执照及地丁上、下忙执照上稍有体现，即文书页面左下标之“经征人”。据民国三年《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第十六条，及同年《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实施细则》第二条述：“县知事对于征收地丁事宜应设置征收人员”，一般各县征收人员设置有5人，分别是1员总柜征收主任员，1员司会员，1员掌册员（征册），1员管串员，1员经征人，有的县还会设立分柜，也会对应设置分柜主任员和所需人员。总柜征收主任员受县知事任，负责监督指挥全县征收事宜；司会员负责征收现金、登记账簿等事；掌册员管理征册内业户完欠等事；管串员负责制发执照、截送报单等事；而经征人的主要职责，一是编造田赋清册，二是制造征册及粮串，三是分发由单，四是下乡催缴，五是查察业户有无匿粮情形。整体而言，“经征人”需负责县知事划定之所管区域内诸多事务，涉及征收初始册串等材料准备、由单派发宣传及后期催征，可谓“有始有终”，无疑是保障县地方田赋顺利征收的关键成员之一^①。

至于田赋征收具体实施的章程、办法与流程，“执照”文书一定程度

^①《财政部核定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实施细则》，《浙江公报》第七百三十九册，1914年3月9日。

上有解读之锁钥及提示。若仔细观察抵补金、地丁执照,页面上“绍兴县知事印”“绍兴县印”,皆在“银、米”戳字及手书文字之下,与一般印象中业户完税田赋后才能加盖官印不同,且官印左右骑缝。此现象为何产生?还有,为何地丁执照留存为上、下忙二联票形式,而抵补金为单联形式?种种疑问,自与民国县级征税机关机制、实施章程及方法密不可分。

首先,每年绍兴县政府于每届地丁上忙开征前需预先编造田赋清册,依清册造具征册及版串,然后在空白版串上加盖上述官印。至于串票形制,查资料,民国元年《浙江省地丁征收法议决案》第十条规定,应用“四联版串”:第一联为由单,先期分配业户;第二联为执照,俟业户完纳后制给;第三联为报单,呈验财政司;第四联为存根,留县存查。民国三年《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及民国十九年《浙江省征收地丁章程》都规定用“六联版串”:由单、上忙执照、上忙报单、下忙执照、下忙报单、存根。目前,虽未见完整四联单或六联单,但民国二年绍兴县地丁版串就已采用与本套执照相同的上、下忙执照联单形式^①。另参见《慈溪契约文化》第365号慈溪县民国六年地丁执照文书,其由单在左、上忙执照在右^②,所以笔者以为地丁串票民国肇始就为“六联”,而“四联”仅停留在议决层面,最终未被采纳。所谓“报单”,实际上、下忙报单形式内容与上、下忙执照一样,其天头部分也印“执照”二字,不过因二者需取一留作上报备查,才称之为“报单”。本文此套地丁上、下忙执照联单就是中间二联,由管串员截留给业户。其次,待版串造竣盖章书写好相应内容后,“经征人”在上忙开征前派发由单一联散给各业户,使之知晓纳额,待上、下忙开征日期明喻后,业户再凭由单主动到县公署或分柜处“赴柜投纳”,须如数缴纳田赋及附加税。“征收总柜设於县知事公署”,分柜则各地视地方具体情况增设。^③最后,若未及时完纳,县公署则派员入户立限催缴,并发督促令状,如再逾期则传案押追,并处以罚款。另外,按规定“由单、执照、报单、存根应对照田赋清册,注明都图、村庄、字号、业户姓名、亩分、应征地丁数目等,并详细记明应收银元、小银元、制钱、铜币等数,及并计总数与经征者之姓名”^④。但实际操作,一般“由单”会上详细填写业户所有产(田、地、山、荡等)种类及亩数,两忙原额银数额及折算银元数,而地丁执照上只会墨戳银额,合

①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03页。

② 章均立编:《慈溪契约文书》,宁波出版社2018年版,彩版第22页。

③ 《财政部核定浙江省征收地丁暂行章程》第十五条,《浙江公报》第七百三十八册,1914年3月8日。

④ 《浙江省地丁征收法议决案》第十一条,《浙江军政府都督公布施行案第二十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九册,1912年2月6日。

征银元数处皆未填写,一方面是发给执照之县署征收处“管串员”省事未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由单”上早已写明银元数,业户只要收到官方发给之上、下忙地丁执照即可证明已如数完纳,书与不书银元数对于双方都不甚紧要。

抵补金方面,向来是照地丁征缴办理,流程、方法也大体相同。不过,从其版串看,与地丁分上、下忙不同,应为一年一缴。抵补金版串,清代浙东各县南兵米(即后来之抵补金)“有单独征收者,有于地丁征收时盖戳记带收者,有并入地丁科则一串征收者”三种。民国三年起,令飭浙东各县,除专串征收者照旧办理外,其随附征收者,于地丁串上加盖戳记,并串征收者需一并划出。^①绍兴县抵补金征收就采用第一种,单独专串征收,与地丁版串相分离。目前,未见版串联单完整实物,依照现存单据右边页文字及骑缝章推测,应也是通知由单、执照、报单(和执照同)、存根组成的四联票形式。希望以后能有实物加以验证。

五、文书传承背景

本文这套文书包括抵补金、上下忙执照、业户执照与推收费收据,年代明确基本都在民国十六年前,有的或到十八年,同收的还有一件民国二十七年陈鸿生绝卖屋契。笔者结合文书内容及年代关系,试分析此批文书转接、传承背景。具体如下。

成熟抵补金执照、上下忙执照从民国十年开始户主由陈兴改为王益记,这与业户执照民国九年陈兴将征粮事出除王益记户下,且“承纳次年粮米”情况一致。同一张业户执照内,后加“民十七年除入陈鸿生户”墨书文字,字上加盖“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红色椭圆章,知民国十七年王益记又将此产转除到陈鸿生户下输纳。再据推收费收据文字及县印信息,此收据当开于民国十八年五月“绍兴县政府”成立之后,是陈鸿生到县推收所办理民国十七年王益记出除粮米过户手续时,照章征收手数料银所给收户收据。“换领新户折、查验各件”,此处“各件”即原户王益记所持民国历年之“抵补金及地丁执照”及“业户执照”。其中包括第一任业户陈兴所执“抵补金及地丁执照”,应是民国九年陈兴推收时留予王益记的。一并呈验时,验件符合的,加盖“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章,抵补金、地丁执照及业户执照都有加盖。所以,原先

^①《浙江行政公署训令第一百三十一号(通令浙东各县抵补金办法由)》,《浙江公报》第三百九十五册,1913年3月24日。



图五 民国二十七年陈鸿生绝卖屋契

“地丁、抵补金”执照上是没有查验讫章的。这在民国九年一张“八分九厘”上下忙执照上就有体现，此执照未盖“查验讫”章。领取“新户折”后，“各件”一并交割给了新业户陈鸿生。因此，第一任业户陈兴、第二任业户王益记的文书才会同入陈鸿生之手。

此外，推收过户、入册征粮之事，通过民国九年、民国十七年两次看，九年推收时也需查验，但推收所未盖“绍兴县推收所查验讫”章，而到了民国十七年出除时，实际上是民国十八年下半年后推收，此时已历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再出除查验各旧件，验毕则需加盖推收所“查验讫”章，此种转变或受牵于民国政权更迭。

那么，文书最终所有者陈鸿生为何地、何人？所幸，此套文书中另见民国二十七年陈鸿生绝卖屋契，契内记有一些陈氏信息。“绍兴县上望坊绝卖屋契人陈鸿生”，将自己户内坐字号朝南房屋一所挽中出卖于本县陈（长房陈子清、次房陈子浚）处名下。房屋位于“上望坊白衙弄四号台门内”，房屋产地字号为“坐字一百二十九号，地一分七厘；坐字一百二十九号，地三厘”。此产原为“旧管十九都五图陈兴户”内，现为“新管本都本图本户”内。可知，陈鸿生屋地在民国绍兴县城东片，即原会稽县城所在区域，与陈兴、王益记相同，三人应当相熟，所以才会有此产地买卖推收过户之事。

六、结语

此套民国绍兴县文书，记载了绍兴城内三位业户之间十多年来输

粮纳税、推收入册、产权交易等经济事宜,具有一定的史料及文物价值。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是我国税收制度由封建传统走向现代、农业税为主格局逐渐式微的重要时期。这些文书,尤其是田赋执照,年代基本覆盖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当时官民处理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凭证和收据,相信对于分析民国初期转制过程中中央、省、县三级机构税收体系构建、田赋正附税名目与税率设定,探讨其税率数字增减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原因,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与意义。同时,通过本文可知民国初期各县级衙署设有征税机构及办事人员,其田赋征收流程又析分成前期册票制发、确定征期、发送通知由单、署柜收税、催纳惩罚等诸多环节。这些机构、人员、程序之设定总体“亦步亦趋”于民初政府、议会历次颁布的抵补金、地丁有关征收章程、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级税赋法规、章程最终于县、乡具体落实的状况。

总之,希望此套文书的公布与论述,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绍兴地方文书,以及绍兴的历史文化,也希望引起相关同行、学人对契约文书这类民间原始档案的收集与关注。

绍兴峡山都督第建造者 及始建年代之我见

绍兴市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 易舟

【摘要】绍兴峡山明清民居之一的都督第，是一处典型的明代府邸。然而对于其宅主，现代方志中为何景星，此宅始建年代为明嘉靖年间。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调查所得，提出宅主宜为镇浙都督何斌臣的新说，并认为该宅的始建年代在明天启年间。

【关键词】都督第 建造者 何斌臣 新考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峡山村的都督第，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江南较为典型的明代官宦第宅。1987年7月24日，被绍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该第宅的宅主，绍兴市、县志，文物专志以及所有介绍书刊几乎均称是何景星，并云：“查何氏谱系，唯何景星曾任都督，时为明嘉靖年间。”^①何景星“曾任都督府都督、浙江总兵”^②。对此，笔者稽诸历史文献，提出不同看法，并略做考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将都督第定为何景星宅之说，据笔者所知，主要是依据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以下简称《简谱》）。《简谱》共一卷，稿本，

①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卷35《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页。

②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著：《绍兴县文物志》第五章《古代建筑·第宅民居》，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小楷,现藏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谱中对何镐、何景星父子是这样记载的,“七世祖峡峰公,讳镐,字周卿。授通议大夫。行实载祭酒周文焯志。”“次子景星,字子瞻,号梅湖。前□军都督府都督、浙江总兵官,授荣禄大夫。”^①

关于山阴峡山何氏谱牒,笔者除仔细披览《简谱》外,还曾翻检过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山阴峡山何氏家谱》、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其中前者系清何经文重修、清何焯补订,清乾隆十五年刻本,残存卷一、二、十九、二十,共两册,但谱文中未涉及何景星支系^②;后者则收录有峡山何谨顺、何枢、何兰汀、何秉常、何惟杰、何寿章、何楸等人的《朱卷》^③,但在记述世系时,均未及何景星其人。至于他省及国外的峡山何氏宗谱(支谱),笔者则无缘经眼。不过仅就上述《简谱》及相关资料而言,即存在着三点疑义:一是官职品级无法对应。《明史》志第五十二《职官五》云:“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④同书《职官一》又云:“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⑤若依《简谱》所述,何景星官“前□军都督府都督”,属正一品官阶,至少应授“特进荣禄大夫”,但谱中只署“荣禄大夫”,为从一品官阶,两者自相矛盾。二是职官封赠不符典章。明代沿袭古制,推恩臣下,根据文武官员的品阶与功绩,将官爵或封号授予其父母妻室、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生者称封,死者称赠。《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云,封赠“一品,三代四轴。二品、三品,二代三轴。四品、五品、六品、七品,一代二轴。八品以下流内官,本身一轴”,“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⑥何景星之父何镐,据明刘栋撰《何镐传》载,“夙志冲淡,不乐进取”^⑦,以父何诏之荫,“补上太学,世先禄”^⑧,终身不仕。如按《简谱》所言,何景星官至“前□军都督府都督、浙江总兵官,授荣禄大夫”,那么,父以子贵,其父何镐亦应诰封或诰赠与何景星相对应的品阶。但《简谱》中,却只署“授通议大夫”^⑨一职,显然与明代典章制度不相符合。又查清何寿章、何楸(均系何镐后裔)等人撰写的浙江乡试《朱卷》,何镐为“诰赠中大夫、长芦盐运使”^⑩,但其职衔是由其孙(何景昂之子)何继高的官职获赠。三是历史文献鲜有记载。既然何景星地位如此尊显,照理在《明实录》^⑪、《明代职官年表·镇守总兵官

①(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②(清)何经文重修,(清)何焯补:《山阴峡山何氏家谱》(残存卷一、二、十九、二十),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③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21—34页,第3册第415—426页,第91册第204页,第80册第489—492页,第81册第553—556页,第88册第447—458页,第85册第517—526页。

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五十二《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6页。

⑤(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6页。

⑥(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6页。

⑦(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三册《人物列传·何镐》,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⑧(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三册《人物列传·何镐》,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⑨(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⑩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册第447—458页,第85册第517—526页。

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全10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年表》^①等文献中应有所提及,但却未见片言只语。究其原因,前引《何镐传》中还有一句话,即“子三人:长即景昂,次景明、景星,俱太学生”^②,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设,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③。太学生,是指在太学里就读的学生。嘉靖十五年(1536)何镐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均为太学生。在明代作为一名太学生,若非继续考取举人、进士,仅以此身份出仕,则多被用作权轻利薄的低品级官吏,达到高官厚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查明清绍兴府、县志《选举志》“举人”“进士”栏,均未见何景昂、何景明、何景星之名,说明他们未能进一步成就功名。既然如此,名不见经传当在情理之中。因此,《简谱》所载何景星之职,存在着名不副实、夸大其词之嫌。

其实在《简谱》中,类似的刻意夸大、拔高何氏祖先官阶的现象有多处,早期官位卑微的祖上更是如此。这里试举三例加以佐证。其一,明嘉靖年间刑部尚书何鳌。《简谱》称其“授荣禄大夫”^④,但查明李本撰《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沅溪何公鳌墓志铭》,应改为“资政大夫”^⑤。据《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云:“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⑥其品级与何鳌所任刑部尚书和所赠太子少保衔完全吻合。其二,何鳌之子何景麟。《简谱》称其官“广西柳州府知府”^⑦,但据明王畿为何景麟之母所撰《何母沈夫人行状》曰:何鳌长子何景麟,“以荫授官前军都督府经历,先夫人卒”。^⑧据《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载:“知府一人,正四品。”^⑨同书志第五十二《职官五》又载:五军都督府“经历司经历,从五品”。^⑩王畿与何鳌为同乡,同出王阳明师门,且又是儿女姻亲,交契甚深,故对何景麟的官职所记毋庸置疑。其三,何景星长兄何景昂。《简谱》称其为“荫生,前军都督府都督”。^⑪但据明谢丕撰《何景昂传》曰:“嘉靖乙(己)亥,授前军都督都事。”^⑫可见《简谱》对其官职明显拔高。此外,山阴峡山何氏家族,自明代中叶何诏、何鳌父子登科及第,成为“父子尚书”后,亦曾一度有所回落。除前述何镐及其子外,何鳌次子何景宪、三子何景丞,亦为太学生,未授一官半职。为此,明陶

① 张德信编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镇守总兵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074—3182页。

②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三册《人物列传·何镐》,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3页。

④ (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⑤ (明)焦竑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五《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沅溪何公鳌墓志铭》,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耘曼山馆刻本。

⑥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6页。

⑦ (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⑧ (明)王畿撰:《王龙溪全集》卷二十《状志表传·何母沈夫人行状》,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版,第1437页。

⑨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9页。

⑩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五十二《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6页。

⑪ (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⑫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十三册《人物列传·何景昂》,民国二十七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

望龄《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云：何鳌晚年见侄孙何继高“鸡鸣辄起诵”^①，曾发出“儿异日当嗣兴吾宗”^②之感叹。当然，至明万历十一年(1583)，何继高考取进士，峡山何氏又走出低谷，重新崛起。此后，人才辈出，史不绝书。凡此种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简谱》所记的何氏职衔，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此，对都督第的建造者有必要重新进行考证。

要确定都督第的始建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从“都督第”和“海国长城”二匾属性剖析。都督系古代军职名，明代置五军都督府，为最高军政机关。据《明史》志第五十二《职官五》载：“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恩功寄禄，无定员。其属，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各一人。”^③因此，都督第内悬挂的“都督第”匾，规格甚高，必须是“都督僉事”及以上的官宦方能拥有。“海国长城”匾中的“海国”，指沿海地域。匾额将宅主比作一道捍卫沿海地区安全的屏障，则道出了其为掌管一方海防的要员。

第二，从明代官宦第宅規制推断。据《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三十五年申明禁制，一品至三品厅堂各七间，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之。”^④由此可见，当时对百官第宅营建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都督第厅堂面阔五间，据前引《明史》，应为五品以上官宦所建。

第三，从第宅建筑风格特征判断。都督第坐西朝东，前濒公局河，原有三进砖木结构建筑，20世纪80年代尚存两进平屋，阴阳合瓦，单檐硬山顶。第一进面宽三间，明间门楣上镶嵌机修木，雕刻仙山琼阁图，工艺精湛。梁架结构均为穿斗式，其中明间用七檩五柱，前廊设船篷轩。第二进面宽五间，通面宽22.7米，通进深12.4米。正脊两端设鸱吻。梁架结构均为穿斗式，用九檩七柱，带单步前檐廊。前檐柱

①（明）陶望龄撰：《歇庵集》卷之十六《行状·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乔时敏等刻本。

②（明）陶望龄撰：《歇庵集》卷之十六《行状·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乔时敏等刻本。

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五十二《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0页。

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1—1672页。



图一 移建于王阳明墓旁的都督第二进建筑外貌



图二 都督第二进东次间穿斗式梁架结构



图三 都督第二进明间梁枋及斗拱



图四 都督第二进明间一斗三升平身科



图五 都督第二进明间前檐柱上斗拱、雀替

做成抹角方形柱,为同时代民居所罕见。明间梁架做成月梁状。柱顶承托十字科斗拱,拱瓣棱角分明,砍削有力。雀替呈蝉肚形。上额枋、月梁与柱交接处,设有丁头单拱或重拱。脊檩与内额间,置一斗三升隔架科四攒;前下金檩与额枋间,装饰一斗三升平身科四攒;明间后下金檩与额枋间,亦有一斗六升平身科四攒。柱础均呈“碾”形,上半部稍高。方砖漫地,阶沿用条石。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设长方形石板天井。宅前置河埠,砌三面上下踏踩。都督第后来改为何氏公所。清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于该宅创建公立双山两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改名峡山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改名胜利乡中心小学。1995年,鉴于该宅第二进建筑已成危房,遂迁至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村鲜虾山南麓王阳明墓地东侧,实施异地保护,现陈列王阳明史迹。都督第属典型的明代中晚期府邸(图一至图五)。

按照都督第匾额属性、明代典章制度、建筑时代特色,结合峡山何氏仕历等因素综合分析考虑,基本符合建造都督第条件者,似只有何斌臣一人而已。

何斌臣,原名光宇,号和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武进士。才兼文武,足智多谋。万历四十二年(1614),任崖州参将。其间,加固崖州乐安新城,添设南靖远楼、北真武楼、南门月城小楼等城堡,修治大小牛头岭,为保境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历四十六年(1618)

八月,升漳潮副总兵,在抗击倭寇中屡建战功。万历四十八年(1620),重建妈祖庙,并在庙壁立碑记述抗倭事略。天启元年(1621)正月,擢南京后军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仍照管漳潮副总兵事。同年闰二月,以署都督僉事充总兵官,镇守浙江。关于浙江总兵官的职责范围,民国《镇海县志》卷十七《职官表下》说得较具体:“嘉靖间,遭倭变,复设镇守浙直总兵官,以都督充,或左右都督,或都督同知,或都督僉事。自是遂为永制,驻扎定海。其属有参将、游击、守备等官,两浙及苏松诸郡,皆其所辖。”^①可见职权并不输于总督、巡抚。何斌臣镇浙时,身先士卒,克己奉公。严肃军法,赏罚分明。曾对一扰乱军心的士卒进行惩戒,为众将士所畏服。其时,浙江沿海倭警罕见,海上交易渐趋活跃。他又倾力整治海上商贸,规范管理,公平买卖,法办欺诈骗索的奸商,取得显著成效。天启六年(1626)二月,在赴京考绩时,因遭流言蜚语中伤而被解职,返回故里山阴峡山居住。当地军民感念何斌臣功德,曾在梓荫山下设立何公祠,参将王骏冈、张应龙请名臣薛三省撰写碑记,立于祠内。记文评价何斌臣“凡桑土计虑,无不极其绸缪;而于所私营,则不少经意”,“望而知为儒将,然不设为儒容”。^②何斌臣生卒年不详。据明祁彪佳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初五日《日记》显示:“灯下阅《古名臣奏议》关救荒者,作书复何和阳,以其稿示潘完宁。”^③说明是时尚在世。何斌臣其人,《简谱》亦有提及,不过其官职只署“浙江总兵”^④,故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何斌臣军旅生涯二十余春秋,均在东南沿海一带,且功勋赫然,可谓名副其实的“海国长城”,其仕历与都督第内悬挂的“都督第”和“海国长城”匾额毫无二致。

何斌臣不仅是威震敌胆的武将,也是有名的戏曲家和诗人。军务之暇,手不释卷,习以为常。他曾以明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为蓝本,改编成十八出传奇《女状元》。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著录其所作剧品《八翼》《女状元》两种,列入“能品”,并评曰:《八翼》“为陶士行作记,而攒簇江左风流之概。词甚整丽,有鸣珂佩玉之度,当不得以板实少之”。^⑤《女状元》“为女状元增一弟纯嘏,盖以结周女娇凤之配耳!就徐剧略演之,为齣止十八。其中数折,不失文长本色”。^⑥他在吟诗赋歌时,每到惬意兴奋处,即弹弦击剑,以勇猛引为自豪。何斌臣与同时代的张萱、林春熙、王思任、祁彪佳等文学家交好。王思任

① (民国)洪锡范、盛鸿焘修,(民国)王荣商、杨敏曾纂:《镇海县志》卷十七《职官表下·阍帅》,民国二十年上海蔚文印刷局铅印本。

② (民国)洪锡范、盛鸿焘修,(民国)王荣商、杨敏曾纂:《镇海县志》卷三十七《古迹·何公祠》,民国二十年上海蔚文印刷局铅印本。

③ (明)祁彪佳著,张天杰点校:《祁彪佳日记》卷十一《小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47页。

④ (清)何裕堂撰:《山阴峡山何氏简谱》(稿本),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⑤ (明)祁彪佳撰:《远山堂剧品》不分卷,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

⑥ (明)祁彪佳撰:《远山堂剧品》不分卷,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

《寄赠何和阳总戎定海》诗云：“东南半壁拜通侯，龙阵鱼丽簇上游。大炮海天传万国，皂旗云影扼三洲。风边销泪封鲸观，月里蛮歌到鹤楼。更羨麟章时昼锦，玉门部落峡山头。”^① 诗中对何斌臣东南海防建树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折射出其在沿海军民中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祁彪佳致何斌臣书信及与之往返的踪迹，则载入《祁彪佳日记》^② 等书。

何斌臣亦工书法，尤长行草，曾朝斯夕斯，下过一番很深的“临池”功夫。遗存至今的书迹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海南岛陵水县牛头岭《界碑》；广东南澳县古关隘《威镇南天》题刻；福建普陀洛迦山净土庵《真如妙境》匾；宁波镇海招宝山《撑半壁天》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撑半壁天》碑，其意为定海(镇海)军民在抗击倭寇中英勇善战，能撑起半壁之天。书法运笔浑厚，气势磅礴。碑的上下款署“皇明天启乙丑岁(1625)仲春吉旦”“镇淞(浙)都督山阴何斌臣书立”。^③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峡山都督第的建造者宜为何斌臣，建造年代当在明天启年间。

(摄影：任金娜)

① (明)朱隗辑：《明诗平论二集》卷十三《王思任》，明崇祯十七年长洲朱氏刻本。

② (明)祁彪佳著，张天杰点校：《祁彪佳日记》第六卷《林居适笔》、卷十一《小林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547页。

③ 绍兴市柯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姚剑敏女士提供。

第二篇

文博论坛

传承青瓷文化重塑瓷源 形象的探索与实践

上虞区越窑青瓷发展研究中心 王晓红

上虞是成熟青瓷的发源地,也是早期越窑的中心产地,曹娥江两岸的熊熊窑火曾经绵延千年之久,是我国遗存古窑址数量最多的县市之一,历次文物普查发现古窑址400余处,构成了完整而庞大的青瓷烧造体系,见证了上虞源远流长的青瓷文化。2015年4月,上虞禁山越窑遗址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研究的成果为上虞青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上虞致力于将越窑青瓷打造成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产业,打造成彰显上虞城市特色的靓丽名片,以全面提升越窑青瓷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重塑青瓷之源品牌形象,千年古瓷正重新绽放出艳丽的新葩。

一、越窑青瓷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现状

越窑青瓷被称作母亲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传统性、文化性,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越窑青瓷功用丰富,品类繁多,对瓯窑、婺州窑、龙泉窑、耀州窑等众多窑系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外文化交

流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上虞拥有小仙坛青瓷窑址、凤凰山窑址群 2 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窑寺前青瓷窑址、鞍山龙窑遗址 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晾网山窑址、长宇湾窑址等 11 处区级文保单位。上虞博物馆有 2 万余件藏品,越窑青瓷占了将近一半,17 件一级文物中,越窑青瓷占 16 件。上虞现有青瓷非遗传承基地 8 处,青瓷非遗传承人 8 个,“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制完成《上虞越窑青瓷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以及小仙坛青瓷窑址、凤凰山窑址群、窑寺前青瓷窑址等 4 个窑址保护规划;制定出台《关于加快越窑青瓷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越窑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设立青瓷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建立本金为 3500 万元的龙盛青瓷文化发展基金;聚力打造的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开园喜迎八方游客,为全面加强越窑青瓷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二、重塑瓷源形象的探索与实践

一是精心谋划打造瓷源文化小镇。从 2014 年开始,上虞区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发展需求,精心谋划瓷源文化小镇,不以追求青瓷烧制规模为目标,致力于突出文化引领、艺术造势、旅游带动、产业新生、区域复兴的思路,走与龙泉、景德镇差异化发展之路,力争打造成为古今辉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陶瓷主题文化艺术中心和浙江省经典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工业遗存、古窑遗址、寺庙遗迹、废矿遗产和传统村落,不搞大拆大建,基本不需用地指标,走一条生态和谐、文娛结合、商旅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小镇选址于上虞区上浦镇大善小坞村,距城区 15 千米,规划区域交通便利,高铁、国道、运河、高速公路一应俱全,104 国道、上三高速入口就在小镇附近,驾车约 2 小时便可达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距杭州萧山机场、宁波栎社机场、宁波北仑港仅 45 分钟车程。小镇规划面积 3.2 平方千米,功能布局八大板块:门户客厅板块、艺术引领板块、文化展示板块、养生禅修板块、文化商业板块、运动休闲板块、民俗风情板块、农业观光板块。主要支撑项目包括艺术引领区、民俗风情区等 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33 亿元,按国家 AAAAA 级景区标准规划建设。

二是创办中外陶艺家入驻创作交流的陶艺中心。2015 年 11 月,

上虞区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共建的中外陶艺家入驻创作交流的陶艺中心开馆运行。这是中国第一家服务于中外陶瓷艺术家自由创作与交流的公益性学术机构,由绍兴市上虞区龙盛青瓷文化发展基金提供支持,中国著名艺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清华美院陶艺系主任白明担任中心艺术总监,每年邀请中外知名艺术家入驻进行研究创作。三年多来,陶艺中心迎来四大洲 16 个国家的 68 位艺术家入驻,接受捐赠作品 1000 余件,留存文献 200 余篇、图片 60000 余张、学术著作 5 部,接待专家学者到访 100 余次,视频资料庞大,翔实记录了艺术家的创作与随之产生的学术建设、文化交流。2017 年 10 月,因在促进世界陶瓷艺术发展与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陶艺中心全票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IAC)团体会员单位。

三是举行中国(上虞)·越窑青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年 9 月,上虞区政府邀请国内外多家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工艺美术大师及上虞本地的越窑青瓷传承人等 100 余人出席越窑青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传承·发展·创新”为主题,就瓷器的起源、制瓷技艺的传播、越窑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发展青瓷产业等议题进行广泛讨论,旨在通过创新催生新的认识和观念,在传统越窑青瓷基础上打造出当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研讨会是青瓷创新之路的标志性会议。通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提



中国(上虞)·越窑青瓷国际学术研讨会

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保持上虞越窑青瓷的与时俱进、长盛不衰。

四是文旅融合工程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成开园。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隶属瓷源文化小镇的文化展示板块,是绍兴地区首个青瓷主题的文化旅游公园。公园依山而建,风景优美,规划面积 26 公顷,计划投资 1.28 亿元。公园以凤凰山窑址群、禁山窑址等为依托,规划建设了遗址观光区、湖田区、体验娱乐区、四季花海区等景观。公园以瓷源为魂,民俗为根,田园为本,是一处集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休闲游憩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

五是创新研发持续开展秘色瓷评比活动。为提高上虞区越窑青瓷生产企业、个体工坊的研制水平,恢复和生产越窑青瓷秘色瓷,从 2014 年至 2018 年,连续举办 5 届秘色瓷研发评比活动。通过网络投票和组织专家开展评比,对参赛的作品从胎釉、造型、装饰、烧制等方面进行综合量化打分,不少参赛作品烧制已十分成功,釉色上相当接近唐宋秘色瓷水平,获奖的优秀作品还组织参加一年一度的景德镇陶瓷国际博览会,极大地调动了青瓷生产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提升了青瓷文创产

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一期)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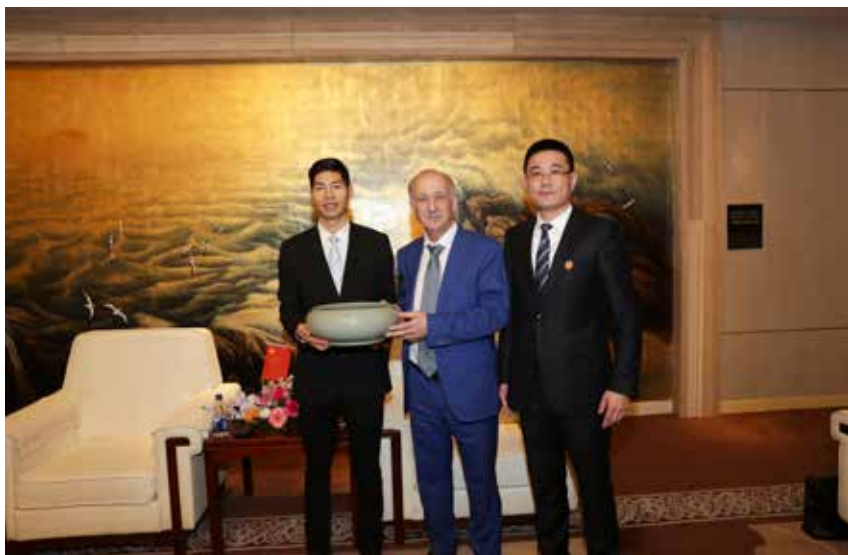
禁山窑址保护棚航拍

品的创作水平。近年来,还先后在窑寺前窑址和禁山窑址一带采集泥土样本进行试烧,部分瓷泥能够烧至 1260℃不变形、不坍塌,与发掘出土的古瓷片的烧制温度基本相近。在釉色研发方面,与景德镇的釉色研发机构合作,试验不同配方,寻求既与传统越窑青瓷颜色相近又耐高温的釉。同时在上浦建立柴烧基地,采用本地瓷泥和自配的釉制作产品进行烧制,传承与复兴传统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已先后开烧 10 余次,每次烧制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六是多层次、多渠道培育引进青瓷人才。2018 年,上虞区政府与景德镇陶瓷大学签订《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景德镇陶瓷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并召开战略合作交流座谈会,瓷源与瓷都在人才培养、学生就业招聘、就学优惠、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合作。上虞区从相关青瓷企业、学校中遴选出 10 位年轻骨干,赴景德镇学院进行为期三个半月的学习。青瓷文化进校园,上虞中学、上虞区职教中心、上浦镇中学、华维中学、实验小学、崧厦镇小、盖北小学等校开设青瓷文化课,上浦镇中学编写的青瓷校编教材在全省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上浦镇中学、华维中学还设立越窑青瓷陈列室。另外,区职教中心投入 150 多万元,设立专门场所,购置设备,选拔优秀学生,每个年段开设一个青瓷班,引进景德镇学院等优秀师资授课,目前已招收学员 83 人。通过内育外聘等方式,着力培育引进青瓷文化人才。

七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合作交流促发展。上虞区目前培育有10家青瓷文化企业,这些青瓷企业在传承发展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生产销售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宣传,通过文创合作开发越窑产品,结合“一带一路”走出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16年9月4日,顾氏越窑青瓷研究所制作的青瓷茶杯、青瓷盘、青瓷笔洗代表上虞青瓷文化元素亮相G20杭州峰会,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上虞青瓷文化的魅力。2017年4月26日,顾氏越窑青瓷研究所受邀参加乌克兰“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活动由中央美院和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发起。制作的越窑青瓷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乌克兰总统夫人。2018年3月6日,顾氏越窑青瓷研究所受邀参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海外贸易中亚峰会,活动由大连市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同举办。制作的越窑青瓷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哈萨克斯坦副总统哈密托夫。“一带一路”倡议给青瓷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合作交流进一步促进青瓷企业的提升和发展。

越窑青瓷文化历久弥新,在当前文旅深度融合的政策机遇期,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越窑青瓷文化,重塑青瓷之源的良好形象,必将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上虞“创新之区品质之城”建设带来新的生机。



上虞青瓷文化企业参加“一带一路”青瓷对外交流活动

从近年出台的政策法规 谈新时代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

绍兴鲁迅纪念馆 杨晔城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顶层设计开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新形势下文博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联系实际,梳理和细研这些重要文件,对于推进新时代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政策 产业 发展

一、以制度建设为基石,迈向文旅融合新时代

2015年3月20日,国务院公布《博物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正式出台。《条例》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作出规定,为促进我国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关于博物馆开展经营性活动,《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博物馆不得从事文物等藏品的商业经营活动。博物馆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办馆宗旨,不得损害观众利益。博物馆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的具

体办法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制定。”明确了博物馆可以开展除文物等藏品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外的、符合博物馆办馆宗旨的营利性活动。第四章《博物馆社会服务》明确“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时指出:“国家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博物馆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人物类博物馆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文旅融合。博物馆自免费开放以来,走进人物类博物馆的观众越来越多,博物馆逐渐成为休闲观光旅游的一处热点。挖掘藏品内涵开发相关衍生产品,包括出版普及类图书、开展研学游活动、实施公共文化项目等,并不局限于开发旅游纪念品、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文物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研究,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文化期待,已是大势所趋。

二是内外兼顾。《条例》进一步要求“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一方面,要求博物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对外展示社区的窗口和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人物类博物馆中的地域文化、乡贤文化、家风文化都是文化产业的载体。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国与国之间“民间外交”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人物类博物馆因有具体的人物思想、相关藏品和研究成果,比一般博物馆更有利于开展国际化人文交流。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通过举办“大师对话”活动,以鲁迅符号链接世界文化符号,开展国际化馆际交流,从2014年开始,先后和法国的雨果、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夏目漱石、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海涅进行了6届跨时空的“对话”,提供了中华文化中国精神走向世界的“绍兴模式”。

三是信息革命。人物类博物馆以老馆居多,面对新的历史机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以智慧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为导向,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书写在作品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信息革命是人物类博物馆接轨时代的有效途径。

四是经营责任。《条例》允许博物馆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相当于给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颁发了“营业执照”,目的在于增强博物馆自身的造血能力,助力博物馆健康永续发展。同样,对于习惯于“吃皇粮”的国有博物馆而言,市场化商业运作对其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先后走过了萌芽期、成长期和发展期,正处于繁荣期向成熟期转变。

萌芽期仅仅作为人物类博物馆的配套存在,囿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现实需求,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市场意识淡薄,主要依靠馆内工作团队完成。成长期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数量递增,主要是拓展馆内三产。以旅游纪念品为例,受当时材质、工艺、设计能力等限制,粗加工、低档次、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整体效益不高。发展期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品牌意识的觉醒,品牌文化的推广和应用。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先是注册了一些同鲁迅有关的商标,通过社会化合作试点相继开发了一些产品上市,受到观众欢迎。2002年,实施鲁迅故里保护工程后,恢复原汁原味、古朴厚重的鲁迅故里历史街区,基本形成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吃鲁迅饭”的街区文化业态。繁荣期的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以“文创热”为标志。与此同时,借助四通八达的网络,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不断出现,“文博热”持续升温。然而哪些才是博物馆真正应该倡导和提供给受众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博物馆守护的还是文物的真实和深重,收藏和学术植根越深厚,才可以为与时俱进的艺术实践提供坚实可信的灵感。这表明博物馆文化产业正由繁荣期向成熟期转变。

二、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谱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2016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拓展利用”里,提出文物工作要“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服务”。同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文化创意产品”这一概述,指出:“依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梦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文化文物单位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的必然要求,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以文化人,具有重要意义。”把深入发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和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紧密联系起来,将其题升至这样的高度前所未有。

文化创意产品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文化资源是文创开发之源。有人就此做过分析,博物馆文创产品经历了四个版本,分别是:直接复制制某件馆藏品的 1.0 版本;将文物的图片直接印到现有的日用品上的 2.0 版本;打破原来的器型,打破原来的质地,抽取文物的纹饰、色彩,融入日用品设计的 3.0 版;目前正处在与互联网相结合的 4.0 版,如事先设置小程序,借用手机扫码,获取产品背后更多的故事内容等。而事实上,由于办馆理念、公共资金支持力度、人才队伍、专业水平以及经济活动中繁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等因素,处在探索阶段的人物类博物馆这四个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东北某名人故居旅游纪念品商店甚至还在出售土鸡蛋当文创,可见仍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加速度持续增长,各地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以浙江为例,2017 年全省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达到 3744.68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7.23%,增速达 15.8%,《关于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万亿级产业的意见》《之江文化产业带建设规划》等相关政策文件的密集制定实施,更是全面激活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动力,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集能,达到万亿级支柱产业并非天方夜谭。绍兴已编制文创大走廊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三年内计划总投资超过 1100 亿元。还启动了文旅融合样板打造工程,提出了“十大支撑”和“十大举措”,开发一批特色文创产品,培育一批文旅企业,用“文学之城”建设推动

融合绍兴文化旅游发展等。处在这样的发展大背景下,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不能仅仅满足于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而要努力实现从产品到产业的转型升级。

结合不同阶段鲁迅文化类文创产品的发展特点,笔者曾做过市场探源,提出了满足公众需求、开发有故事的产品、植入“文化+”的新理念、创新市场营销策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等一些观点。^①文创产品不局限于文化日用品,而且涵盖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食住行等,像源于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也是广义上的文创。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先后开发了系列文创产品,推出了老绍兴臭豆腐店、树人书屋、鲁迅文化主题民宿等品牌业态,目前正在规划中国越菜博物馆,其中名人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从老百姓关心的美食文化入手做大做强名人文化,从文化创意产品到文博创意产业,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三、以研学旅行为抓手,开创公共服务新模式

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研学旅行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和公益性四大基本原则,要求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这也成为博物馆研学游的行动纲领。随后,国家旅游局、教育部先后发布《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等文件,公布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或营地”名单,连同此前公布的全国首批10个“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及首批20家“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名单,把研学游纳入学校综合素质教育的范畴,从有序实施、安全管理到教育实践、示范引领做了全面指导解读,研学游成为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人物类博物馆作为中小学校的校外爱国主义德育教育基地,以举办入队入团仪式、成人仪式,帮助开展一些义务讲解和卫生保洁、文明志愿服务工作为主,受到学校和青少年学生的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深度还是十分有限。绍兴鲁迅纪念馆在深化校外基地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早,先是利用景点实景资源,以百草园公开课、三味书屋公开课为主题邀请名师上名课,解读课本中的鲁迅名篇,组织学生现场听讲;再是

^① 杨晔城:《鲁迅文化类文创产品价值论》,《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3月。

作为“跟着课本游绍兴”活动的主要实施地,设计互动体验环节,让学生寓教于乐、寓学于游。在此基础上,2014年5月,推出原创宣教品牌中小學生“走近鲁迅”主题活动,把学语文与观人文紧密结合起来,作为“跟着课本游绍兴”的延伸和深化,获浙江“全省首届(2015年度)博物馆十佳青少年教育项目”。2016年1月,“绍兴市三味书屋——鲁迅故里”入选全国首批20家“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纪念馆进一步整合馆区演艺、讲解、物业等资源,当年暑期推出三味书屋—鲁迅故里“研学游”品牌,还开发了相关研学游衍生产品。随后落成研学游新教室,全面升级研学游文创产品,增加名人故居辛亥一课,把海外华侨,来绍经商、创业和工作的外国人子弟,来绍访问的国外学生纳入研学游受众的范畴,而且受众从团队扩大到散客……在动态提升中不断提高研学游的鲜活度。纪念馆每年年初推出新版研学游,每年公开出版研学游专辑《走近鲁迅》,还组织举办了全国中小學生“走近鲁迅”征文大赛,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2017年12月,绍兴鲁迅纪念馆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學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50万元预算支持。在第三届全省博物馆免费开放最佳做法推介活动中,又获“最佳社会教育奖”。

绍兴是名士之乡,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名人和名人故居众多,几乎就是全国人物类博物馆的缩影。鲁迅故里研学游以“走近鲁迅”发轫,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本,推而广之,走近治水英雄大禹、书圣王羲之、爱国诗人陆游、大画家徐渭、巾帼英雄秋瑾、人民公仆周恩来……文化产业既有整合发力优势,又有个性拓展空间,研学旅行市场前景广阔。

四、以创造创新为动力,开辟传统文化新空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的文件由于规格高、覆盖面广,一般视为基本国策,文物工作有关“两办”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文物工作已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战略部署,文物保护迎来了新时代。其中对文化产业发展相关内容的解读对人物类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把“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同时还把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融入生产生活、滋养文艺创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列为重点任务。在“加强文化法治环境建设”方面，明确“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意见》出台不久，笔者以全国鲁迅博物馆（纪念馆）资源特性和融合发展为课题，对全国现有的六家国有鲁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了调研，提出强化鲁迅文化遗产的供给侧改革、构建中国鲁迅文化研究联合体、打造鲁迅文化城市长廊、开辟鲁迅文化游专线、做强鲁迅“文创”事业、发挥国有馆在民间的专业优势等一些可行性思路。^①近年来，全国六家国有鲁迅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签署文创开发与运营推广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办展、出版图书、举办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参加博览会，整体展示了鲁迅文化产业的潜质和实力。同时，利用名故委这个平台，发挥人物类博物馆在产业开发上的整体优势，整合品牌效应，联合办展，开发文创产品，依托各馆所在地丰富的城市旅游资源开辟名人文化游专线，贯彻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精神，开启名人文化世界行活动，加大与国外名人馆的交流合作等，许多工作大有可为。总体来说，人物类博物馆要变文化优势为产业优势，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赢发展，努力当好“两创”的探路人先行者。

人物类博物馆中有很多属于革命类，通过挖掘红色资源拓展社教服务内容，创新宣教思路和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党性教育、廉政建设、红色旅游中的重要作用，红色文化产业的拓展空间同样广阔。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提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五年规划。在主要任务里，要求“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明确：“宣传、文化、文物部门管理使用的革命文物类文物保护单位应全部对外开放，其他部门管理使用的应尽可能对外开放。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依托革命文物资源组织开展重大纪念活动，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和载体，整体纳入中央统一规划。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文化创意产品，促进文化消费。打造红

① 杨晔城：《释放鲁迅文化的时代活力——全国鲁迅博物馆（纪念馆）资源特性与融合发展初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3月。

色旅游品牌,推出一批研学旅行和体验旅游精品线路,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加大军队系统革命文物展示利用力度,在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前提下,适时对外组织开展参观、瞻仰、纪念等活动。”在“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里,要求“坚持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着力策划打造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内涵丰富的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完善革命文物改陈布展管理机制和支持政策,深化研究、及时补充体现时代精神的展陈内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基本陈列超过5年的可进行局部改陈布展,基本陈列超过10年的可进行全面改陈布展……坚持展示方式与展陈内容相得益彰,适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动性、体验性。坚持节俭办展、绿色办展,做到因地制宜、够用适用,力戒贪大求洋、富丽堂皇”。同时要求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主题保护展示工程、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六个重点项目。

《意见》为革命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近年来引进“鲁迅精神与廉洁文化专题展览”,与属地街道联合摄制清廉微电影《立人为本——鲁迅先生的家风》,通过整合馆区红色资源,挖掘红色人文内涵,举办“红色记忆·鲁迅与共产党人”“五四潮·中国梦——鲁迅与同时期绍兴乡贤”原创展,面向党员推出“鲁迅与共产党人”研学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签署《红色教育共建协议书》,加强军地合作,在党建工作和文博业务结合上努力走出一条新路。值得一提的是,拓展革命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并非只有公益而无商机,如在基本陈列改陈布展时,可以适当考虑融入文商旅相融合的文创产品,把革命题材与美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样的“收费”,与其说是为心仪的文化产品埋单,不如说是借助社会力量合力推进博物馆事业发展,同样会受到观众欢迎。

其实对于博物馆经营、收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两办”文件已有提及。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在主要任务里,要求“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

予以绩效奖励等”。不仅出台了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的激励措施,而且明确了收益分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利好消息。

五、以改革发展为导向,增强文博产业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让文物活起来、让博物馆热起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只有打破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理顺机制体制,明确发展方向,激发内部活力,博物馆文化产业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019年5月5日,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国家文物局已起草完成《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去年底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征求了意见,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争取今年内印发。明确指出“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鲜明特征。深化博物馆供给侧改革,创新博物馆传播内容、形式和手段,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实现博物馆“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明确传达了博物馆在互联网新时代应具备“以人为本”的思维理念。

对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而言,意味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型。伴随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在博物馆免费开放初期,政府主导是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规范运作、全程督导、政治性强,符合不同时期的宣教工作需要,突出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偏弱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博物馆在新时代“以人为本”的思维理念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坚持不懈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高大上”的人物形象与“真善美”的群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以更加开放、包容、亲民的姿态弘扬名人文化,吸纳更多社会专业机构尤其是高校参与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如果说利用博物馆现有的场馆、藏品资源、专业力量和观众流量是人物类博物馆开发文化产业的“第一空间”，那么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通文物行业联通社会的道路，引导社会各种要素、多方力量的有序参与，构建文物事业开放式发展格局就是人物类博物馆开发文化产业更加广阔的“第二空间”。2019年5月8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闭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以适应文物合理利用改革发展形势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清晰规划了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路线图。可谓是构建数字时代文物事业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操作指南，旨在促进博物馆、文化遗产单位有序开放文物资源信息，促进社会各界合理利用文物资源。人物类博物馆所围绕宣传研究弘扬的“人物大IP”，其“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有望完全释放出来。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发的资料查询在线检测系统成为“网红”就是例证。人物类博物馆无形资产极其丰富，并且人物本身就有广告效应，一定程度上，有效落实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能够解决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与“两办”文件《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收益分配相配套，实现良性循环，推动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

结语：跟着时代发展的步伐，和博物馆发展有关的政策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如2019年1月国家文物局就印发了《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对革命文物旧址的管理、保护、展示、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而现有政策法规中每个阶段的表述也会有所不同，如《博物馆条例》提到“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办”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已把“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列为重点任务，其中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表述。接着，在《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又把深化“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作为重要任务，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更加具体明确，要求博物馆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用联系的观点研判这些文件，再结合自身实际予以落实，相信人物类博物馆文化产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新时代博物馆诠释方式的困境与出路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方慧超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化机构,各个博物馆正在重新定义自身的社会角色。2019年5月18日,全世界的博物馆共同庆祝博物馆日,2019年的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作为文化中枢,博物馆在保持其原始使命——收藏、保存、交流、研究与展览的同时,也要为应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然而,目前博物馆在实现诠释过程中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诠释矛盾”现象。本文介绍并剖析目前国内博物馆在诠释方式上的困境,通过探究,旨在指出其出路,使博物馆更好地履行为公众服务的职能,实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博物馆诠释方式 设备 诠释内容 人才

“诠释”,百度百科解释为“说明;解释;对一种事物的理解方式;或者是用心感受的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也可理解为:对某事的讲解、证明”。然而,在博物馆和遗产界,该词还具有特殊的含义:解释一件物品

和它的意义。事实上博物馆的一切工作都在诠释。任何一个博物馆在展示任何一件物品时,都体现了其诠释属性。作为文化中枢,博物馆的诠释方式多种多样。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博物馆诠释方式则变得更丰富多样。(见附表)

附表 博物馆诠释方式

静态	动态
展出物品	导览讲解
标签与说明文字	讲座
图示	社教活动
模型	影音投影
模拟场景	语言导览
出版刊物	计算机互动设备
导览手册	可用于操作的物品
指示标志	机械互动装置
立体布景	博物馆研学类活动
照片	网站/应用软件
文创产品	演出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需求下,博物馆的诠释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目前博物馆迫切需要继续调整、完善自身定位。近年来,我国每年举办展览2万余个。尽管现今博物馆拥有多样的诠释方式,但在展览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诠释方式无法满足公众需求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

一、诠释设备与科技发展的矛盾

科技对于新时代博物馆的诠释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各种各样的诠释方式,博物馆始终在探索如何满足受众需求。无论博物馆规模如何,诠释设备对于博物馆来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博物馆的计算机系统为例,这些设备已经成为博物馆最常用的工具。计算机对于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学术研究、陈列展览、藏品建档、行政管理以及与受众的沟通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设备,博物馆甚至无法做好基本的诠释工作。

尽管科技化的诠释设备在博物馆实践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近年来为了提升自身的科技化水平,博物馆在展馆建设中也确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博物馆在发挥科技化设备的功能上,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博物馆目前还存在技术运用不当、设备可操作性弱、生命周期短、设备更新维护困难等问题。



浙江博物馆孤山馆诠释设备

1. 选择符合诠释主题的技术

诠释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必须满足展览的主题和内容的需要,博物馆使用诠释方式的目的是为展览提供服务。博物馆不能一味追求先进的技术和昂贵的设备,事实上,脱离展览主题的技术会让展览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切的技术只是展览的辅助物品,不能取代展品的核心地位。博物馆布展过程中,必须分析自身的目标和职能,选择服务和服从陈列需要的诠释方式。

2. 增强设备的可操作性

系统的先进性和实际效果最终需要由人的应用来实现。设备的可操作性与用户体验的满意程度有着很大的联系。近年来,博物馆在展示过程中不再只是做简单的信息表达,而是努力转向交互性更强、信息更开放的展览方式。受众的利用率是设备是否有效的标志。以展厅中的计算机来说,这类设备往往只能一个人进行操控,设备提供预先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内容供受众点击。如果受众在点击页面的过程中感受到复杂性,便会放弃使用。

3. 延长设备的生命周期

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升级原有的设备,但也存在被淘汰的风险。每一个设备的生命周期都是有限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远先进的事物。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于博物馆来说,最新的技术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的新旧程度事实上也是相对的。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设备的受众和经常使用类似设备的受众,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一味选择价格高昂的“高科技”设备只会加快设备的更换,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违背了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要做的是选择稳定性更好、更适合博物馆展览需要的设备。



浙江博物馆孤山馆面临淘汰的诠释设备

4. 坚持做好设备的维护工作

设备经过长时间使用,负载量很大,而电子设备的成本很高,所以日常的维护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设备都有其特定的寿命,而适当的维护会增加其寿命。博物馆应购买耐用、稳定的设备;准备好随时可以替换的部件或设备;拥有能为设备做定期检查的专业维修员工,做好设备的维护工作。

二、诠释内容与受众需求的矛盾

作为文化中枢,博物馆是人民的知识宝库。博物馆为人类保存和展示着人民的记忆、文化和希望。博物馆在进行诠释的过程中,促使受众通过诠释内容来获得知识。近年来,部分博物馆从原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机构转型,许多博物馆认识到传统的展示内容已经难以满足受

众的个性化需求。2019年“两会”，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指出：最近三年，每年入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增量都在一亿左右。到2018年年底，博物馆参观人数已经达到10.08亿人次。然而，展览数量和参观人数的急剧增长并不意味着受众对展览会表示满意。许多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仍存在着内容单一、专业化程度不高、没有特色、形式枯燥、难懂晦涩等问题，进而加深了博物馆与受众之间的隔阂。

1. 提升诠释内容的专业化水平

一切在博物馆中展示的内容都应该是准确的、专业的。博物馆的藏品本身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博物馆在诠释过程中就是将内容准确、专业地展示给受众。在诠释内容的过程中，第一，要具有全局意识，筹备过程中要全面理解展览的主题；第二，选择符合诠释内容的展品；第三，对入选展品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的内容组合会有不同的展示效果；第四，整个布展过程中，要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努力实现专业化水平最大化。

2. 增强诠释内容的鲜明特色

一个博物馆具有其他博物馆不具备的特色时，就会吸引受众自愿前来参观。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但与此同时，受众对于更高质量的观展需求也越来越大。如果一家博物馆没有鲜明的特色，那么对于一个已经参观过类似展览或有更高要求的受众来说，那样的博物馆将不再具有吸引力。为了使博物馆得到可持续发展，第一，开发藏品特色。藏品是博物馆的立身之本，博物馆在不断丰富优质藏品、研究和展示藏品的同时，会给博物馆带来持久的生命力。第二，立足自身的地域特色。每一件文物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对于地方博物馆来说，要充分利用藏品的地域属性。第三，体现时代特色。博物馆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对科技的使用，科技为博物馆的诠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好地发挥了博物馆的职能。

3. 加大受众的参与程度

21世纪一套新的博物馆标准正在出现，其核心就是体验与协作。观众的参与与博物馆的组织构架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博物馆的诠释方式与观众的参与不是单向的，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观众参观展览时的文化体验，会反哺博物馆，对博物馆文化有再造功能。受众会在有意

无意之间生产和影响博物馆文化,而博物馆通过诠释来激发受众的好奇心,这些感官体验更具备活力、开放性和不可预测性。博物馆在吸取采纳观众意见的同时,能获得更多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三、博物馆人才与诠释需求的矛盾

人才是博物馆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博物馆履行教育使命的实践者。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和理论根底,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是博物馆诠释过程中主要的实践者和执行者。特别是青年人才,他们富有朝气、热情、亲和力和创造力,善于发现诠释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博物馆更好地发挥职能,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青年人才善于将传统文化与新兴事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同于传统刻板的展览思维模式,他们更擅长用独特的视角、前沿的诠释方式来策划展览。

据不完全统计,文物与博物馆行业从业者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全日制大学学历或以上学位,其中毕业于文物、考古或博物馆专业的很少。许多中小博物馆的员工专业化水平不高,技术涵盖范围不全,而且一些博物馆自身缺乏人才意识,导致博物馆的发展止步不前。

1. 确立博物馆诠释人才发展战略

制定正确的人才发展战略是博物馆基本的管理工作。诠释工作的前提是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每一家博物馆都应该有一份明确的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在规划战略时,要参考其他博物馆优秀的经验,制定符合博物馆发展方向和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标准。战略的内容应该明确指出发展目标及具体实施的步骤,让博物馆在具体实施战略规划时有章可循,从而改变诠释人才匮乏的现象,为博物馆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2. 建立更加完善的奖励机制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第九条规定:“对为博物馆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博物馆对于人才的奖励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利益,而是对其个人价值的一种认可。当博物馆承认员工在工作中的成就,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时,将极大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调动其积极性。但是在制定奖励机制的过程中,要考虑其真实情况和现实的可行性。决策者事先要经

过调查,明白博物馆员工真正的需要。奖励机制通过考察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经验、科研水平等来运行,通过评定其价值,做到论功行赏。论功行赏不但可以让员工知道自身行为的对与错,还能激励员工重复和加强那些有利于博物馆发展的行为。

3. 引进和培养先进青年人才

博物馆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作为文化中枢,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博物馆学具有很强的交叉性,涉及人文、社会、自然、技术等学科领域。博物馆在发展中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经验,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青年人才是博物馆的新鲜血液,博物馆在诠释的过程中需要大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在人员招聘时,应根据博物馆人才发展战略,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

青年人才虽然具备创新精神,但缺乏博物馆工作的相关经验。因此,博物馆要对新入馆的人员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对博物馆工作、对自身能力及岗位需求有更好的认识,使他们能以良好的状态,更快地适应博物馆工作,推动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博物馆与社会教育服务功能刍议

——以绍兴博物馆为例

绍兴博物馆 何志方

【摘要】博物馆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博物馆与大众直接沟通的窗口。博物馆陈列展览之后,社会教育服务功能就成为博物馆宣传的主要任务之一。

【关键词】博物馆 社会教育 服务功能

博物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博物馆以陈列展览为主题,组织和引导群众,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用。

在 21 世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日渐明显,博物馆也成为学生寒暑假的“第二课堂”。博物馆宣传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趋多样化。组织青少年来博物馆,对广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使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地域特色文化产生浓郁的兴趣,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图片

与学校的历史知识相结合,在参观学习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这对学生、学校和博物馆本身都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

在学校与博物馆宣传教育方面,欧美国家的博物馆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各州博物馆都设有单独的宣教部,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设立学习活动室,开展丰富多彩的陈列活动,为学生提供幻灯片、文物标本、模型等。在我国,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博物馆做得相对较好。

自2013年以来,绍兴博物馆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品牌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1. 开展“从绍博出发”历史文化系列体验活动

基于博物馆面向青少年教育的使命,2013年以来,绍兴博物馆做了有益的探索,推出“从绍博出发”历史文化系列体验活动,并将此打造成绍兴博物馆“第二课堂”活动品牌。

“从绍博出发”历史文化系列体验活动通过参观展览、实地走访、现场教学、互动体验、课堂研究等多样教学方式,开展富有博物馆特色、根植于地域文化的体验式教学。至今已举办“探寻兰亭书法圣地”(第1期)、“探秘嵊州小黄山遗址”(第2期)、“重访崇仁古建筑”(第3期)、



现场教学



“从绍博出发——探秘嵊州小黄山遗址”历史文化体验活动

“探秘越国遗址”（第4期），让青少年从馆舍走向大千世界，实地考察考古现场和文保基地，以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馆藏文物的出土地，以及历史人物的身前身后事。

2. 开展“玩转陶艺·探秘陶史”青少年教育活动

在陶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原始先民用什么来烧制食物和储藏食物？原始先民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得了灵感，发明了陶器？



参观展览



头脑风暴



DIY 陶艺体验

“玩转陶艺·探秘陶史”青少年教育活动，立足于绍兴博物馆陈列展览，着眼于越地陶瓷专题，帮助青少年了解越地陶瓷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知晓陶瓷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和重要意义，从而吸引青少年主动走进博物馆。

3. 开展“我是小师爷”暑期夏令营活动

“我是小师爷”暑期夏令营活动，集绍兴本土文化普及与互动体验为一体，通过“参观+课程+DIY+游戏+实地走访”四个加模式，实施具有绍兴博物馆资源特色和教学个性的教学项目。

夏令营活动内容有小小讲解员培训、考古知识小讲堂、寻找“文物好朋友”、探秘越王城遗址、“小师爷”PK赛等，使青少年全方位参与到博物馆的学习、生活中。

“我是小师爷”暑期夏令营活动，就是要给青少年一次与博物馆亲密接触的机会，在这里学到知识、得到快乐。

4. 开展“时节上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

中国的传统节日，记录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多彩的社会文化内容。让广大青少年深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学习中国传统节日习俗，

绍兴博物馆特推出“时节上的博物馆”系列体验活动,推行“课程学习+DIY 体验”的教学形式,开展富有传统节日文化特色的教学活动。

活动贯穿全年,开设有“时节上的博物馆·春节”主题活动(DIY 年画体验)、“时节上的博物馆·清明节”主题活动(DIY 清明团子亲子乐)、“时节上的博物馆·乞巧节”主题活动(DIY 巧手绘扇面)、“时节上的博物馆·中秋节”主题活动(DIY 月饼亲子乐)。



“时节上的博物馆·春节”
——DIY 年画体验



“时节上的博物馆·清明节”
——DIY 清明团子亲子乐



“时节上的博物馆·乞巧节”
——DIY 巧手绘扇面



“时节上的博物馆·中秋节”
——DIY 月饼亲子乐

通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青少年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发掘学生学习文博知识的主动性,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从目前国内外博物馆功能作用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联系会更加密切,民众会更加关注与了解博物馆。

三

青少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与主宰者,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培养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培养在学校教育的

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课堂之外的博物馆。笔者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见证物,是展示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窗口。博物馆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是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课堂。博物馆通过运用珍贵、厚重的历史文物,让文物在博物馆活起来,为社会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今后博物馆宣教工作的重点方向。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博物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校外潜力,为青少年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的宣教作用。

四

自发性与开放性是博物馆宣教工作的功能,也具有青少年文化启迪之功效。分析教育哲学“美国派”代表人物伊斯雷尔·谢弗勒曾经指出:“在教学中,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而是引导他们走进许许多多前人留给我们的大厦中。这些大厦是我们努力生活于其中的地方,也是我们赖以改善的地方。”诚如其所言,历史文化遗产的复兴,需要引领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对于博物馆来说,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博物馆社会宣教工作上,如果没有换来理想的效果,必然会影响到博物馆其他业务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博物馆为了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在内容形式丰富多样的同时,必须在资金投入、内部运作方面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2. 滕守尧:《回归生态的艺术教育》,南京出版社 2008 年版。
3. [美]史密斯著,滕守尧译:《艺术感觉与美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 [美]南希·艾因瑞恩胡弗著,金眉译:《美国艺术博物馆》,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开展口述历史项目 传承本地优秀文化

——以绍兴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为例

绍兴图书馆 茹笑辈

【摘要】文章以绍兴图书馆“绍兴记忆口述史”项目为例,通过对项目开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的研究,阐述了地市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展口述历史,记录本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传承本地优秀文化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图书馆 口述历史 传承 传统文化

口述历史,即口头历史,就是将储存在当事人或知情人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用口头表达的方式,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整理形成文字或录音、录像等新的资料。

近几年,随着美国等国口述历史资源的不断发展,口述历史资源开发波及中国,推动了全国各地文献资源的纵深发展。通过采集制作口述历史这一形式,既挽救性地保护了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又拓展了地方文化资源,完善了文献资源特色体系。同时,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收藏范围也从纸质文献扩展到音视频资料,这一转变让馆藏资源更丰富更全面,保护的范围更多元更立

体,也更利于后人查阅与研究。下面以绍兴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为例,探讨地市级图书馆如何通过口述历史项目传承本地优秀文化,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一、项目开展的可行性

1. 绍兴具有丰富的口述题材与资源

绍兴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 2500 多年的建城历史,自古以来都是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内历史名人众多,王阳明、徐渭、蔡元培、鲁迅等大家都曾在绍兴生活居住过,与绍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与名人相关的文化古迹也特别多,比较著名的有兰亭、大禹陵、鲁迅故里、蔡元培故居等。

得益于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绍兴也是著名的水乡风光城市,被誉为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丰富的人文资源孕育了多样的地方曲艺,五大剧种五大曲种都诞生于此,同时亦是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发源地。截至目前,绍兴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4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72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43 项,有 14 人(已故 3 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丰富的名人文化和文化古迹为口述历史提供了天然丰富的资源,可以说绍兴古城就是一座天然的历史文化宝库,其中可作为口述历史的题材与资源极其丰富,需要保存的内容极其广泛,亟待我们去挖掘与传承。

2. 绍兴图书馆具有先天优势

绍兴图书馆领导十分重视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带领相关人员外地考察学习,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配置项目经费,并于 2015 年底建成绍兴音像资料馆,用于音像资料的收集保存和视音频的拍摄与播放。经过几年的努力,配置了成套完整的采编播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完善的场地、充裕的资金以及专业的设备和人员为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创造了全方位的技术保障。

同时,绍兴图书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绍兴电视图书馆、绍兴音像资料平台等,并与绍兴日报社、电台等市级媒体进行业务合作,开设绍兴记忆专栏,用于发布宣传口述历史节目的信息。一方面让

绍兴人民知道口述历史是什么,开展口述历史有什么价值;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也为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创造了多维度的宣传平台。

由于口述历史属于历史学范畴,因此对待口述内容需要持严谨负责的态度。由于是口述回忆,而且口述人年纪相对较大,会出现记忆不清、时间混乱等错误,所以需要对口述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内容进行查找验证。绍兴图书馆作为全市最大的公藏单位,在资料查阅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同时图书馆在多年的文献征集过程中,团结了本地一批专家学者,像绍兴文史专家陈惟于、裘士雄、钱茂竹等老同志,他们不仅自身乐于参与口述历史项目,且多次献言献计,指导项目工作开展,这些都为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创造了深层次的研究水准。

二、项目开展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近年来绍兴本地参与过新中国成立建设、见证过共和国兴衰的老人以及拥有传统技艺的老艺人、老匠人纷纷故去,很多绍兴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细节也随着他们长埋地下,他们的所见所闻没有记录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开展实施绍兴记忆口述历史项目迫在眉睫。现实工作中,有些前期拟定采访的口述人对接时还口齿清晰,再次去联系准备采访却被告知已不能口述或者不久前故去了,心中遗憾万千,只能由那些发生过的历史细节永远地消失了,而这些事件可能现今的年轻人根本就没听说过或者根本就不了解。比如青藤书屋中青藤的由来、大禹陵遭到破坏修复的全过程等细节,下一代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其他如绍兴本地的传统曲艺平湖调、滩簧等,以及传统手工艺如箍桶,由于时代的变迁,新兴事物的产生,有些也将近于消亡。只有通过老艺人、老匠人的口述,才能让年轻人知道原来我们绍兴还有这么好听的曲艺形式,还有如此高超的技艺手段。

其次,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看好莱坞大片、刷抖音等,对本地优秀传统文化根本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如果一个年轻人对本地传统文化都不了解,不去发扬不去传承,长此以往,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消亡或被西方外来文化所替代,那么中华文化的根脉就不复存在了,何谈中华文化复兴? 中华民族何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种种,各地市

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展口述历史项目,记录本地区传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了。

三、市级图书馆如何开展口述历史项目

绍兴图书馆“绍兴记忆口述史”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来,经过前期项目选题、背景布置,中期拟定采访对象及提纲开展访谈,后期拍摄制作、平台发布宣传五个步骤。每个步骤循序渐进、层层递进,任何环节都没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经过三年的努力,相继推出了“绍兴名胜古迹修复系列”(进行中)、“绍兴老兵系列”(完成)、“绍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历史名城35周年系列”(完成)、“绍兴骄傲——外地绍兴籍名人系列”(进行中)、“越城区建区36周年系列”(进行中)等项目,后期计划开展“绍兴戏曲曲艺老艺人系列”“绍兴老技艺系列”“绍兴知青系列”等工程量较大的口述历史项目。到目前为止,绍兴图书馆累计采访口述者几十位,其中包括绍兴地区党政退休老干部、地方文史老专家、抗战老兵、外地绍兴籍名人子女等。不仅在绍兴本地进行项目采集,还远赴外地采访绍兴籍文化名人子女。现阶段已采集口述录音资料2000多分钟,录像资料2000多分钟,制作成片三十余部,并在绍兴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号,绍兴电视图书馆,绍兴音像资料平台等进行宣传推送,后期计划将形成的文字资料和视音频资料进行保存,结集成书和光盘出版发行。

口述历史的保护与开展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开展这一项目以来,多次邀请本地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先后在绍兴电视台、《绍兴日报》等媒体进行集中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读者宣传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让读者充分了解口述历史的概念和过程。

四、几点思考

1. 立足本地,从本地资源着手,深入挖掘

作为地市级单位,在口述资源、人员配置、设备配备等方面肯定不如省级单位,因此地市级开展口述历史项目,一定要立足本地、扎根本地,深入挖掘本地资源,本地区的人文历史相较于别地必然有着先天的优势,这样也更有利于本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截至2017年7月16日,



口述历史拍摄场景布置图



口述历史成片片头格式

已有 133 座城市(此处琼山市已并入海口市,两者算一座)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的文化遗迹得到了重点保护,浙江省陆续有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等 8 个地级市和 2 个县级市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能够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其独有的历史与文化,这些完全可以深入挖掘做成口述历史史料。而且现代社会新媒体快速发展,对视频拍摄要求不高,很多地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配有专职视频拍摄人员进行讲座视频的录制工作,完全可以胜任口述历史的视频拍摄,对于后期制作没有条件的也可以在文字整理工作的基础上采用外包的形式,用于后期编辑成书出版,刻录光盘进行保存归档。

2. 加强相互间合作,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口述历史项目是一项全社会的工程,靠几个人或者几个机构很难完成,而且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往往是迫切性、抢救性的。加强机构之间的联动是做好口述历史项目的先决条件,可以借助档案馆、城建馆、非遗馆以及各级协会的力量,互帮互助实现共赢。比如“绍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历史名城 35 周年系列”口述历史项目就是在绍兴政协文史委领

导下,几家单位合作完成的,进行中的“越城区建区 36 周年系列”是与越城区档案馆合作完成的。在此基础上,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更好地保护我们家园的历史传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与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丰富图书馆活动形式

虽然开展口述历史项目是为了丰富各地馆的馆藏,但是保存这些历史史料却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居住在绍兴的人们更加热爱家乡,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历史。比如可以举行一场讲述绍兴箍桶技艺的讲座,在讲座中插入老一辈箍桶师傅对于制作传承箍桶历史的口述视频,结合将近消亡的绍兴曲艺滩簧《新箍桶记》表演,最后引导大家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这一形式既丰富了讲座的形式,将口述历史与曲艺、传统技艺相结合,又让绍兴人民回味了从前的生活,两者相得益彰。口述历史项目还可以走进校园,与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将真实的口述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将抗战老兵、新中国建设者的故事进行传播,加强中小學生、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观看口述历史成片

4. 嫁接总分馆建设及城市书房、地方特色馆,扩大口述历史的影响力

现在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在建设分馆及城市书房、地方特色馆,抓住这一契机,在规划市区城市书房建设、地方特色馆建设中嵌入口述历史

相关内容,将各个城市书房、地方特色馆打造成不同特色的口述历史纪念馆。这既是城市书房、地方特色馆的一个特色,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当然无形中也宣传推广了口述历史项目,可谓一举多得。

五、结语

口述历史项目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责任。只有我们携手并肩,把每个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做好,那么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才会丰富和完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才能走得更坚实。

古建筑消防安全现状和对策分析

诸暨市博物馆 李立波

龙游县文物保护研究所 翁倩琳

【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源远流长,绵延五千余年,古建筑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与瑰宝。然而千百年时光流转,古建筑历经沧桑,又缺乏保护,无数辉煌的古建筑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当前,火灾是威胁古建筑的首要因素。本文从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出发,分析古建筑消防安全现状,进一步探讨古建筑保护消防安全新对策。

【关键词】古建筑 火灾 消防安全 现状 对策

古建筑是古代建筑的简称,凝聚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是历史发展的缩影,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古建筑受材料、时代发展等因素所限,自身各项防护能力尤其是消防安全性能极其低下,火灾成为古建筑安全的首要威胁。近年来,古建筑遭遇火灾导致损毁的事件屡屡发生,从2014年云南香格里拉县有着1300年历史的独克宗古城葬身火海,到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失火导致南美的历史记忆几乎付之一炬,再到201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塔楼和玫瑰花窗,都是一场场浩荡的文化之殇。古建筑是珍贵的不可

再生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是当前古建筑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古建筑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1. 古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是客观上的消防安全不利因素

中国古建筑几乎都是土木或者砖木结构,火灾载荷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差距大,耐火的级别低。古建筑所使用的木材,经历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吹日晒,存在不同程度的风化、虫蛀,质地疏松又相当干燥,非常易燃,一丝明火就可能发生燃烧。此外,古建筑的木质构件多,每一个构件的表面积都很大,木材多以拼接的方式相连,接缝较多,通风条件又好,所以古建筑一旦着火,火势迅猛,蔓延极快。有的古建筑建在高山之巅,风大且疾,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以最快的速度蔓延,甚至形成立体燃烧。

2. 古建筑年代久远,设计上大多没有考虑到防火间距

在形制上,我国的古建筑多由各式各样的单体建筑组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古建筑或者古建筑群,在布局上也是相当连贯和紧凑,层层叠叠,只要其中某处出现起火的情况,加上材质本身的原因,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火情,就会“火烧连营”,相连或者紧靠的木结构建筑很快就会形成大面积的燃烧,进一步恶化火灾情况,带来巨大损失。如历史上,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发生的火灾,火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导致火情蔓延火势极大,结果“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三大殿被迫重建。

3. 古建筑选址对消防安全的负面影响

古建筑在我国分布广泛,地理环境更是天差地别,部分古建筑位于崇山峻岭或幽深峡谷甚至是深山密林之中,远离城镇,消防设施难以覆盖,消防安全人员也难以抵达。部分文物古建筑在建设的时候不重视消防水源,或者是虽然贴近水源,但是由于地形崎岖和古建筑自身设计复杂,消防设施和人员只能“望火兴叹”。上述情况大大增加了救火难度,也降低了火灾施救效果。

4. 人为因素加剧了古建筑的火灾隐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攀升。我国各地对于古建筑的开发、利用也随之上了一个台阶。在这一

过程中,出于旅游开发、展览陈列等目的,古建筑内部署和安装了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由于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只开发不保护,忽略了消防安全方面的管理,对古建筑过度利用,违规建设饭店以及旅馆等,缺少对火灾源头的管理,存在火灾隐患,稍有不慎就酿成大祸。2009年至2014年初,全国文物古建筑发生火灾1300余起,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居首位,占总数的近40%,电气原因占总数的20%,其他原因依次为放火、玩火、吸烟、雷击。文物古建筑火灾的发生,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导致。如2014年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的火灾,就是由于仓房社区池廊硕8号“如意客栈”经营者在卧室内使用电器不当,引燃可燃物引发的重大火灾事故。

二、古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对策

1. 科学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提升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标准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科学规划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布局。首先,在当前社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大背景下,古建筑的开发、利用必须和保护并举,防止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对古建筑的管理和保护,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消防危险源;其次,严格把控古建筑周边环境的变量,即在开发周边用地时控制其性质、规模,防止出现由于周围建筑、设施的阻碍导致无法排除古建筑消防险情的情况;最后,古建筑内部避免出现生产、娱乐以及餐饮等人员集中的情况,如果出于经济效益确实需要设置场所,应进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部署齐全的消防设施,做到管理严格,响应迅速。

2. 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消防设备,提升消防安全水平

古建筑的消防安全设计,既要考虑到保持古建筑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内涵,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相对脆弱的体质特性。以国内建筑普遍采用的消防喷淋设备为例,各类配套的喷头和管线不仅严重影响古建筑的外观,而且安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古建筑造成破坏。所以,除了布置传统的消防设施如喷淋灭火系统、消火栓、灭火器、消防水池外,还应进行消防安全的技术革新,减少对古建筑的负面影响。

(1) 对古建筑构件进行阻燃材料的处理

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尝试用明矾、桐油等材料进行古建筑的防火

处理,但一直存在着污染和耐用性差等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防火材料不断更新,现在已经研发出无污染、稳定性好的透明防火涂料,如“PC60-1 饰面型防火涂料”“水基型阻燃处理剂”等。在无法改变古建筑防火设计的情况下,利用此技术对古建筑的楼板、横梁等构件进行防火阻燃处理,喷涂符合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要求的阻燃涂料,提高整体耐火等级,降低木材表面的燃烧性能,可以从源头上控制火灾的发生。

(2) 引入智慧消防系统,完善消防安全预警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消防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建筑消防安全需求,以现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智慧消防系统应运而生。智慧消防系统,是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GSM(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现代高新技术集于一体的智能消防无线报警网络服务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信息互联互通的社会多方联动;能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全覆盖的古建筑监控,具有对古建筑零损伤、全自动巡检、性能可靠易于维护等优点,大大提升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水平。

3. 加强宣传工作,提升防火救火能力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得古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被人们所熟知,古建筑也成为旅游的热点所在。从消防安全角度来说,人员的大量流动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了消防安全隐患出现的几率和火灾危险性,文物主管部门、消防单位等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和推广工作。对内,学习消防安全课程,进行消防技能培训、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等,提高古建筑管理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和应对火灾等紧急情况的处置能力;对外,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互联网平台以及实体宣传窗口,进行古建筑消防安全专项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引导,一方面阻止游客群体乱丢烟头、不合理使用电器、使用明火等行为,另一方面有效提升公众的消防安全认知,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结语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是古人千年前的感慨,这

句诗也恰好反映了古建筑脆弱的一面。古建筑一旦失火,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和损失,即便是可以修缮甚至重建,也无法还原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印记。我国消防安全工作的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古建筑的消防安全也应如此,将防患未然放在首位,杜绝火灾、减少损失。保护好、利用好古建筑,既是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只有形成这一共识,遍布中华大地的各类古建筑才能长存,继续向人们讲述一个个历史的传奇。

参考文献:

1. 李洋:《砖木或木结构古建筑的消防设计探讨》,《安徽建筑》2006年第4期,第24—25页。
2. 赵发军:《文物古建筑(区域)消防安全状况与管理对策分析》,《水上消防》2016年第4期,第23—26页。
3. 仝艳时、曲毅:《建筑防火构造分析》,《科技创新导报》2009年,第27—37页。
4. 吴俊奇、张婧、曾雪华:《新时期我国古建筑消防安全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给水排水》2007年第4期,第85—90页。

绍兴名人故居文化的创新运用和前景

绍兴博物馆 史 霖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城市文化“客厅”的博物馆及名人故居文化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为各地“争夺”的重要文化资源。绍兴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士众多,毛泽东主席盛赞绍兴为“鉴湖越台名士乡”。名人故居作为历代名人的特殊载体也进一步融入公众文化生活。如何让名人故居的文化信息得到有效整合,绍兴名人馆的建设和开放为名人故居文化的有效整合提供了契机。本文以绍兴名人馆展陈的历代名人及相关名人故居文化为例,试从名人故居文化目前的发展状况为载体,探讨绍兴名人故居文化的创新运用和前景。

一、绍兴名人故居概况

1. 绍兴名人概况

绍兴名人馆展陈历代名人 150 位。从所处时代来看,绍兴名人从远古时期到民国时期,如华夏立国始祖大禹、春秋霸主越王句践、东晋书圣王羲之、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画家徐渭、近现代文学家鲁迅、教育家

蔡元培等。从职业身份看,绍兴名人涉及领域广泛,从状元、尚书、外交家、诗人、画家、电影评论家到医学家、收藏家和革命家。无论是古代政治、文学领域的圣贤,还是近现代军事、经济领域的大家,绍兴人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并非所有名人均为绍兴本地人,如马臻籍贯陕西,范仲淹籍贯江苏,汤绍恩籍贯四川,但他们都有在绍兴生活的经历或功绩,这为绍兴名人文化增添了多样性。

2. 绍兴名人故居建筑保存概况

上绍兴名人馆展板的150位历代名人中,目前保留故居或者祖居的名人有54位。其中,故居或者祖居列入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有53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保单位6处,市县区级文保单位16处,列入普查登录文物6处,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18处。从分布范围来看,越城区21处,诸暨市8处,柯桥区7处,上虞区9处,余姚市1处,嵊州市2处,杭州萧山区4处,新昌县1处。绍兴名人馆展示的相关名人故居数量占名人总数的30%,可见名人故居的保存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二、名人故居文化整合的必要性

近年来,城镇化发展日新月异,名人故居呈献给大众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历史遗留的建筑形态,其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乃至建筑价值被不断地解析和重构,形成了独特的名人故居文化。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纪念馆、博物馆的研究展示合理整合、有效利用名人故居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社会进步和谐发展的表现。

三、名人故居文化保护利用措施建议

1. 加强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力度

针对目前还处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级别以下的名人故居,我们建议提升保护级别,落实保护措施。争取更多资金投入,尽早制订保护计划,编制保护方案,实施抢修工程,防止进一步损坏,为后续开放、利用创造基础条件。对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的名人故居,及时更新安全设备,注重日常修缮,确保其日常开放的安全。对产权私有的名

人故居,结合实际情况推行产权置换,为后续保护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2. 扩大名人故居文化资源整合与加强景区辐射

根据名人故居的知名度、地理位置,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开发利用方式。依据地理位置情况,将知名度暂时不够大的名人故居与知名景点结合,形成串联线路,依托历史街区、风景名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资源带动故居旅游业,让游客全面了解绍兴名人故居文化的风采。通过一处或者几处名人故居的修缮开放,逐步形成“热点”,带动周边地区名人资源、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例如,徐锡麟故居是绍兴东浦古镇一处较早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多年来,该故居的开放推动了东浦古镇的旅游开发。现在,东浦古镇结合黄酒小镇建设,深挖古镇的文化内涵,把徐锡麟故居周边地区建设成黄酒文化体验式的旅游区,相关产业也已经引进,成为一个较好的激活和利用案例。

3. 建设可视化绍兴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数据库及导览系统

为了适应文化旅游的新需求,绍兴名人馆应当建设绍兴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数据库及导览系统,充分整合现有的文物、规划、建设、旅游、交通等部门的大数据。通过绍兴名人和名人故居的数据提炼、重组,使之服务于文化、旅游、教育、科研等相关事业。同时可以利用VR虚拟现实体验馆的理念,将各大故居的现实状况虚拟化,向观众呈现当年名人居住时的风貌。观众在这虚拟现实中看到的情景,再与现在名人故居的相关情况进行比对,展示名人故居的过去和现在,给游客留下一个更加形象、更加直观的印象。名人故居在建立大型数字资源数据库及导览系统的同时,寻求与全国知名导航地图连接。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型导航地图已经实现了语音讲解功能。绍兴的名人故居参观路线可以和导航地图的相关功能相结合,让游客在导航中轻松进入景区,实现讲解与导航的完美结合。这对游客来说,将是更好的旅游体验。

结语

绍兴名人故居资源丰富,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而且随着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深入推进,也会使绍兴名人故居文化的创新运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篇

史海钩沉

军事与开发：“兴越灭吴”背景下越地的经济文化发展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范蠡商学院 钱入深

【摘要】“吴越争霸”时期, 越国谋划实施了带有战时经济特点的“兴越灭吴”策略, 在国家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思量再三, 在政治、军事、农业及人口等方面实行新式变革。这一时期, 影响军事的相关产业得到优先发展, 支柱产业在地域空间上得到优化布置, 围绕军事在短时间内“聚合”出强大的综合国力, 实现了灭吴称霸的夙愿。作为历史成因和文化肇源考量, “吴越争霸”和范蠡等人成为越地后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溯本求源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吴越争霸 兴越灭吴 范蠡 越地 历史开发

“吴越争霸”是春秋时期吴越相互征伐的一段历史, 虽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惊鸿一瞥, 但是, 在范蠡等人的谋划下, 越国实施的带有战时经济特点的“兴越灭吴”策略, 对“迫江薄海”的越地和“水行山处”的越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言, 绍兴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得天独厚”, 而是“人定胜天”。越地这片土地之所以能够由早期荒蛮的“鸟田象耕”, 逐渐成为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 是历朝历代开发的结

果。那么，“吴越争霸”期间越国的军事与开发过程，出于越地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成因和文化肇源考量，值得探究。

一、“战时经济”下的军事争霸与区域开发

军事和祭祀是历代王朝和君主最重视的两件大事，政治变革和经济复兴发展都是以强化军事和巩固封建王朝为目标导向的，春秋争霸中“兴越灭吴”的历史进程也是如此。“吴越争霸”时越、吴、楚和晋等国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断增强。越国采取的即时政策和策略，伴随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境内产业布局广泛而系统，采矿、冶炼、种植、养殖和造船等与战争相关的产业得到实质而有效的开发，直接推动越国境内陆陵荒野的开发和通江达海水陆交通的修筑。到越国灭吴时，疆域及开发已达浙江大部。“吴越争霸”中越国以军事为导向的“战时经济”策略，实现了“灭吴称霸”的目标，这一时期成为越地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的先驱、越地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奠基阶段，后世经济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和兴起得益于此。

（一）军事导向的越国“战时经济”

“吴越争霸”是春秋战国大国争霸背景下中小国家生存发展的历史缩影。地处东南地域的吴越两国与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相比差距较大，两国背后潜藏着晋楚等大国争霸的暗流。军事导向的争霸进程中，吴越两国加强了与晋楚两国以及中原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肇于越部族活动，及至越国和两汉的发展，以及魏晋士族南迁后的人口增长，越地这片土地由早期荒蛮的“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①的“乌田象耕”，逐渐成为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在政治、军事、农业及人口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短时间内提升了综合国力，围绕军事形成“合力”。“战时经济”是越国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从军事和外交思量，对影响军事的产业采取了优先发展，对支柱产业进行地域空间上的优化布置。

军事导向的“耕战”是越国的基本国策。计倪是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句践认为计倪为人“明于时交，察于道理”，曾问他“兴越灭吴”的办法，计倪说：“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

^① 王充：《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

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① 计倪认为要使国力有盈余,农业生产是第一位的。当策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在范蠡和文种的主事下,越国采取了多种具体措施强化军事和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经济”和“人口政策”是支柱。虽然,至西汉时期越地农业生产仍然落后于中原的代田法和铁犁牛耕技术,但是,春秋后期的越地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句践继位后,将都城从秦望山南的嵯岷大城迁往平阳,再迁至绍兴。迁都既是越国的霸业之图,也是越国的农业生产实现历史意义升级的转折点。“粮食种植业的重点从山区转向平原,从旱粱转向水稻是绍兴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转折,这两大转折是在春秋时期的越国完成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② 从山区产量少的旱粱到平原产量多的水稻,越国农业生产的重大转折是越国能够灭吴实现称霸的重要原因。越国强大的农业生产可以从《国语》《吴越春秋》文字记载中略窥一二。《国语》记载越灭吴时疆域范围已达浙江大部。当时的越国疆域覆盖宁绍平原、浦阳江谷地、嘉绍平原以及金衢盆地等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所以越国农业生产面积和产量不容小觑,不应只聚焦于越国核心地区会稽山和四明山北的宁绍平原一带。另外,句践十四年越国“拣择精粟而蒸”归还吴国万石种子的例子也证实了越国农业生产能力。还有在越国农业生产中最负盛名的“富中大塘”,它的面积和产量应当相当可观,富中大塘的性质在《越绝书》中被称为“义田”,在《吴都赋》中富中之氓被认为是货殖交易的首选对象。这种“义田”可能是一种鼓励农耕的新型农业形式,水田之外,也包括鼓励开垦并占有荒地和商品经济,以“不收于国”“庙礼之”甚至“嫁娶”方式来鼓励“四方之士”,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吸引外来移民。

“人口政策”是越国增强国力的重要措施。越国采取的人口政策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针对性很强。首先鼓励生育数量,生两个孩子,国家有补贴,生三个孩子,国家配乳母。孤寡病贫家的孩子国家来养。生男孩,奖励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则奖励两壶酒一只小猪。^③ 按照狗与猪谁贵重来评判,越国应该是鼓励生男孩。其次是注重生育质量。女孩到十七不嫁,男孩二十不娶,父母就要被治罪,同时禁止老少夫妻配的现象。另外也鼓励外来移民。陈桥驿先生称,越灭吴时,人口

① 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卓贵德、赵水阳、周永亮:《绍兴农业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已达 30 万,疆域已达 5 万平方公里。^①越国灭吴后,人口达到 100 万人以上。^②虽然秦朝统一后将越国人外迁,以及东汉后的战争与割据,但是,至隋唐时,该地已经成为人杰地灵、物产丰饶的宝地。

(二)冶炼技术驱动下的军事与国力

史书、考古甚至神话故事直接印证“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冶炼技术已经十分发达,而且又增进了与楚国等先进文化学习和交流,越国军事实力和农业生产能力大幅上升。

句践时期越国采矿与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大量踪迹可寻可证。史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越国在锡山采锡、在六山等地采铜,并利用炭渣冶炼的炭在炼塘冶炼铜锡,制造兵器。历史上有“吴戈越剑”的说法,众所周知的代表越国青铜兵器水平的“越王鸠浅自作用剑”(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出土),出土时能轻易削书破指,据称复旦大学科学检测该剑为铜锡组成且含有少量微量金属元素,因此千年后仍然不会生锈并且锋利无比,有学者甚至指出是经过硫化处理。《战国策·赵策三》中赵奢将吴越铸剑描述为“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透过文字让人体会到吴越铸剑削铁如泥的锋利,这说明越国冶炼技术高超所言不虚。历史典籍中也有描写越国冶炼情况的篇章,例如越国冶炼并献于吴王的“马槌”,这些献礼指的就是“灭吴九术”中致使吴王丧志“遗之美好与巧匠”的声色犬马之术。“六山者,句践铸铜,铸铜不炼,埋之东阪,其上马槌。句践遣使者取于南社,徙种六山,饰治为马槌,献之吴。”^③直接描述当时因炼铜不成而转移地点的故事。从文字中隐约可以猜测当时铸剑时可能缺少某种微量金属元素,导致冶炼不成功。

现代考古出土文物和现存古地名反映了越国的冶炼技术和产业分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绍兴西施山遗址持续出土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铁器,绍兴市博物馆先后征集并展出 200 余件物品,其中铜器种类繁多,工艺精美,且带有典型的吴越文化特点。“下层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以青铜鼎、盘、匜,黑衣陶罐、豆,印纹陶钵为代表,青铜兵器、农具制作精良,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上层属于战国中晚期,以铁器的使用和推广为标志。”^④遗憾的是大部分出土文物散落民间,而且尚未有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面世。1982 年在绍兴坡

① 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民族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② 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④ 刘侃:《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东方博物》2009 年第 2 期。

塘狮子山 306 号墓出土了铜鼎、铜罐和铜豆等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铜质房屋模型甚为精美且有特殊地区文化研究意义,引起了学者对越国与楚国、徐国与越国关系的注意。同一历史时期,越国战争对手吴国的青铜器冶炼也十分发达,“从吴国丹徒宜侯墓、母子墩墓等这些重要的遗址、墓葬、窖藏等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主要器型涉及生产、生活、战争、祭祀、娱乐等方面”^①。时至今日,绍兴仍然存有大量与越国冶炼相关的古地名,例如“上灶、中灶、下灶、日铸岭、良戈舍、炼塘、称山和铸铺岙”等,主要分布在平水和上虞道墟东关一带。越国与后世封建王朝一样,先进的冶炼首先应用于祭祀礼器、兵器和农业生产。

另外,《拾遗记》等书籍更是以充满“匠心”的凄美神话将越国冶炼传世。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说:“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断水,三名转魄,四名悬翦,五名惊魄,六名灭魄,七名却邪,八名真刚。”《越绝书·卷十一》则是专门写宝剑的:“昔者,越王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吴王阖庐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阖庐无道,子女死,杀生以送之。湛卢之剑,去之如水,行秦过楚,楚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将首魁漂而存焉。秦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击楚,曰:‘与我湛卢之剑,还。’”^② 描述的是句践请欧冶子铸得“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五把宝剑,在携李之战后为求和将剑送与吴王阖闾,后吴王阖闾无道,湛卢之剑居然神奇地去了楚国,秦王为得到它竟然兴师击楚,曰:“与我湛卢之剑,还。”为得宝剑出兵还不止此一件,楚王召集干将与欧冶子造了三把剑,最后竟然引得“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这样的战事。与之相关的“欧冶子殉炉”“莫邪殉炉”“专诸用鱼肠剑刺吴王僚”等传说,从侧面说明吴越两国兵器十分出名,也反映其铸造冶炼技术十分先进。

(三) 泽被后世的越国水利工程

自古至今,越地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与水的关系,而越文化鲜明的特征是“水文化”。滨海多水的自然地理条件惠泽越地先民以水泽之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水灾,这使得越地“治水”有了历史连续性特征,越地“治水”的先例可以寻至大禹。在历史发展中,“大禹精神”及其要义“疏而不堵”与“人定胜天”逐渐内化为越地特殊的地域文化。

① 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句践时期的越国,与早期受卷转虫海侵而困于山区的于越部族相比,处境已大为改观。越国的水利工程在数量、规模和智慧方面实属地域历史新突破。如果在地图上标记出越国“富中大塘”“塘城”“吴塘”“苦竹塘”等圩田水利工程,以及杭坞、固陵、朱余等滨海基地,就可以得到一条面向钱塘江呈东西向的“弯月”形曲线,这条曲线形象地勾勒出越地先民同海侵海浸斗争和开发陆陵山地耕战的场景。除了圩田工程、军事港口和产业基地之外,越国的水利工程规模惊人。有学者委托专业人士对位于绍兴秦望的范蠡养鱼池“下池”残存水坝工程进行推算,估算土方为72万方,重达180万吨。按方志所载“修之三年”计算,不计夯筑,光是搬运土方,大约需要300人干1000个工作日,工程之浩大可见一斑。^①在“人定胜天”精神引导下,越国及后世御咸蓄淡对抗海水侵蚀,发展渔业养殖,利用天然水系与人工水利工程造就了军事上的堡垒与港口、经济上的漕运与农渔生产,也建构了文化上的生态美学,并泽被后世。

东汉永和五年(140),马臻在越国水利工程和自然水系基础之上纳会稽、山阴两县三十六源之水筑鉴湖,形成集自然与人文两者于一身并璀璨于世的“稽山鉴水”,将越地经济文化升至历史新高。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在《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中写道:“试览镜湖物,中流见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诗中描述,一个谷雨但晴朗的日子,伴着“清澈见底”的镜湖和“毫无机心”的鸥鸟,他和友人在“顺风晴日”行舟,离开“越王台”向着文人寄思冥想的“禹穴”,诗酒兴文于古镜湖之上,心情快哉让人羡慕。此情此景是众多唐朝诗人慕名游览越地山水和人文历史的一个缩影,现代学者辑录歌咏鉴湖的唐宋诗词作者有一百余人,只陆游一人作品就逾千首。^②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水陆交通情况,要想从浙水西北到达剡地至天台段,水陆要道自萧山西陵渡鉴湖,再越过绍兴城,沿曹娥江,顺着剡溪方能到达。

春秋时期修建的山阴故水道,越国时期兴修的吴塘等水利工程,东汉马臻兴建的鉴湖,西晋贺循主持开凿的西兴运河,隋炀帝即位后凿通的京杭大运河,以及在山阴故水道等基础上形成的浙东古运河,这些始自越国、后世不断延续并完善的水利工程,是维系经济联系、巩固

① 俞志慧、钱入深:《传说中位于坡塘的范蠡养鱼池找到了》,《绍兴晚报》2017年3月13日。

② 邹志方、李越明、鲁新潮:《唐代诗人咏鉴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封建政权的重要水道,使绍兴、宁波和杭州成为青青稽山、鉴水长流的富庶地区,越地自此开始依靠自然上的鲜活存在与沉淀世人心中的文化价值在后世山水人文上拔得头筹。鉴湖、若耶溪等水文化名迹,被历代名士所吟唱和寻访,甚至成为道教投龙活动的神仙水府洞天。

二、范蠡对越国经济发展采取的举措和贡献

吴越两国互相征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在历史文本中看似是由家族复仇引发的恩怨,其实不然,争夺经济生存资源才是历史使然。句践、文种、夫差、伍子胥和孙子等吴越之俦,对这个问题认识最清楚的是范蠡与伍子胥,但是两人的结局却迥然不同。那么,越国这位历史形象涉及面最广也最具张力的谋臣在越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做出怎样的贡献?

(一)范蠡主事的不止军事外交

历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范蠡的文韬武略称赞有加。^①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②对范蠡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韩愈在《范蠡招大夫种议》中写范蠡“竟能焚姑苏,虏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诸侯之盟者,范蠡、文种有其力也”。^③黄震甚至称范蠡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唯一“功名始终”者。苏轼在《论范蠡伍子胥大夫种》中写范蠡“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韩愈和苏轼虽然对范蠡“忠君”微有说辞,但是前提是范蠡的“不可替代”和句践对其“依赖”,早期范蠡遇事要“谏”,到后期句践遇事都要“问之”,范蠡辞别时,句践则是不知如何是好并且“泣下沾衣”,直言自己和越国将无所依赖。

范蠡不仅在越国军事外交攻守中起到关键作用,他对越国经济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其一,范蠡有能力统领越国内政外交。范蠡的智慧哲学思想和渊博的知识结构证明他本身有能力处理越国内政外交事务。^④“会稽之困”后,句践欲让范蠡统领越国内政外交所有事务时,范蠡却夸文种善于“抚民安内”,自己更擅长于兵甲外交之事,说明句践信任他,“兴越灭吴”后范蠡出走,集内政外交于一身的文种被赐死,道出了范蠡不愿统领内政外交的原因。其二,范蠡用越国经济问题思考吴越军事关系。范蠡说:“敦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

① 孟祥才:《有关范蠡身后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童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钱入深:《论范蠡的哲学智慧:疏而不堵》,《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鼃鼃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渚。”^①说明范蠡对吴越两国经济特征和经济属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吴越两国滨海而居，海水浸侵时有发生，农业生产条件艰苦，而且有晋楚大国环伺，生存资源紧张，并且越国与吴国互相吞并的实力旗鼓相当，伍子胥也指出吴越之间的吞并是必然的，因为“三江环之，民无所移”，因此，范蠡认为越国“蚤朝晏罢”与吴国争霸的根本原因是争夺紧缺的地域生存资源，越国需要用军事手段拓展边疆从而获得经济资源，而越国经济能够获得持续发展既是军事争霸的基础也是战争的最终目的。

（二）范蠡的经济思想及其在越国的实践

范蠡的经济思想相传是文子所授，文子属于道家人物，虽然他的知识结构成于何时、何地存在争议和空白，但是他仍有许多经济思想辑录于刘宋裴骈《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马总《意林》等著述中^②，对越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其一，范蠡富有经济思想。范蠡的经济思想是基于用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天道观”看待经济行为。农业经济方面，他参天地用自然规律看待农业发展，提出“经济循环论”“农末俱利”“平粟理论”等观点。范蠡出身楚国自谋其食的农民家庭，知晓农业是人也是越国生存发展的基础，但他同样认识到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农末俱利”思想，平粟政策被李悝等后人所继承。^③他曾对句践说：“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④而且发展农业应该因地制宜，《文子》记载：“古之渎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商品经济方面，他提出“逐什一之利”、“完务勿息币”^⑤、“待乏论”、“供求理论”^⑥、“时机论”^⑦等。其二，范蠡经济思想在越国的实践。范蠡建议句践迁都“据四达之地”“处平易之都”是对越国地理经济特点思考的实践，因为范蠡深知越国地理经济特点限制了越人的活动范围，范蠡筑句践小城后筑山阴大城，围绕大城，越国形成了格局更大的产业经济布局。句践向孔子描述的越人“水行山处”特点，便是越人从山区迁往平原后行迹扩大化的表现。越国在短时间内将宁绍平原变成了军事与经济基地，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形成了强大的沿海防务军事基地、种植基地、养殖基地、冶炼基地等。范蠡在会稽山目鱼池养鱼的实践在

① 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王文清：《计然其人姓名及其思想考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孟祥才：《论范蠡》，《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⑤ 宋行标、朱顺佐：《论范蠡的经商思想》，《范蠡研究文集》，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傅学良：《范蠡的商业经营思想》，《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⑦ 吕世忠：《试论范蠡的经济思想》，《东岳论丛》1998年第4期。

《陶朱公养鱼经》中有详细记载,而且该养殖方法沿用至今,当前绍兴东关的五金加工、黄酒产业、兰花产业依然带有越国历史的烙印。

(三) 迁都筑城与区域大开发

范蠡筑城迁都平原不仅是越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转折,也是越地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转折,以越王都城为核心的区域开发自此开始。

其一,范蠡城市选址推动越国农业经济形态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句践七年,越王句践离开吴国返回越国,与范蠡有一段择地建城的讨论。句践本意踪迹前人,复国建城会稽山麓。范蠡则表示反对,意欲设置覆吴之都,将都城设立与兴越覆吴之愿直接联结在一起,“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①越国迁城于平易之都,不仅是人从山区走向平原,农业生产方式也由山区的旱梁作物生产走向水田稻作物生产,辅之越国大量吸引外越人口,越国农业粮食产量和人口大幅增长,新都不仅是易守难攻的“一圆三方”之城,更是开疆拓土的产业“大花园”。其二,宁绍平原地域大开发自此开始。越人走出山区后,新都成为宁绍平原的核心城市。《越绝书》描绘了一张越国开发图,记载了小城附近的美人宫、乐野,从西面浦阳江谷地至宁绍平原东部曹娥江方向有犬山、安城里、独山、吴塘、富中大塘、炼塘、称山等,从北面濒临钱塘江至南面金衢盆地方向有石塘、杭坞、防坞、麻林山、葛山、苦竹塘等,而且交通方便,既有海洋和南向北的自然水系可水行,也有山阴古陆道等陆路可行,在宁绍平原交通网上优化布置了越国的冶炼、农业、养殖、种植、造船和砍伐等产业及基地,春秋后期宁绍平原开始了由国家组织的有规划、高效率、有历史影响的开发,对后世影响深远。

结语

越地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是能够极大吸引文人骚客并给予他们舒畅心情的文化圣地与青山绿水福地。“青山绿水”中辄思出中国式自然生态哲学情怀,“羁旅行役”中幽思怀古治国平天下。但是,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言所坚信的“绍兴的自然环境绝非得天独厚,而是人定胜天”^②,无论“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抑或“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人文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浙东山水能够人杰地灵,是有发展过程

① 赵晔:《吴越春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邱志荣:《鉴水长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的。“吴越争霸”时期越国是越地开发的主体和先驱,范蠡作为越国迁都平原的力谏者、都城的建造者和越国“兴越灭吴”的主导者,是区域开发的有力推动者。这一时期越地与中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大量恢宏至道的史事和富有情感色彩的历史人物被后世典籍记载或文学辑录,成为史籍、诗歌、戏剧和楹联等经典文化作品流传下来。城市与人口持续繁荣,农工商在宁绍平原初步形成产业布局,越国境内陆陵荒野的开发和通江达海水陆交通的修筑形成了交通网,为越地后世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基。作为历史成因和文化肇源考量,“兴越灭吴”和范蠡推动了地区经济开发,繁荣了区域文化交流,是该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溯本求源的重要补充。

耕耘播种在越文化研究的田野上

——我的越文化研究 40 年小结

绍兴文理学院 余德余

【摘要】对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越中曲派、山阴(绍兴县)州山吴氏家族和张岱、杨维桢与《水浒传》关系及域外文化名人与绍兴等进行研究,无疑是越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除张岱研究外,尚少有人涉足。我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刻,但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窃以敝帚自珍。

【关键词】《越中曲派研究》 张岱研究 杨维桢与《水浒传》关系研究 《山阴(绍兴县)州山吴氏家族研究》 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

1979年,我从诸暨县高湖中学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后改为绍兴师专、绍兴文理学院)任教,担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当时实行分段制,我分到的为宋元明清近代。因为元明清文学的重点是戏曲小说,且是大部头的,一部《牡丹亭》或是《红楼梦》就足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了,学校图书馆资料不全,我的文学功底也不行,权衡再三,在从事教学之余,我把科研方向确定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较大影响又与越文化密切相关的有关课题上。经过不断地查阅、搜集积累资料,逐渐理清了适合自己——既能提高深化古代文学教学,又能促成科研成

果两结合的科研思路,如关于“越中曲派”、张岱、《水浒传》作者与杨维桢、绍兴文人结社等的研究。

当时浙江省的几所地区高校每年都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我参加了浙江“水浒研究会”,每次活动都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同时也多次参加全国师专的元明清文学学术研讨会,从中拓展学术视野,提高科研能力。在40年的教学科研和退休后的生涯中,终于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果。

一、《越中曲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最先提出“越中曲派”的是明末徐渭的学生王骥德,他在《曲律》中说:“吾越故有词派。……近则谢泰兴海门之《四喜》,陈山人鸣野之《息柯余韵》,皆入逸品。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纪。以余所善,史叔考撰《合纱》《樱桃》……凡十二种;王淡翁撰《双合》……凡六种。二君皆自能度品登场,体调流丽,优人便之,一出而搬演几遍国中。姚江有叶美度进士者,……撰《玉麟》《双卿》诸杂剧共十余种;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解摛揆,如《神女》《金合》……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自余独本单行如钱海屋辈,不下一二十人。一时风尚,概可见已。”^①这里提到的“词派”就是曲派,不仅标举曲派名称,直指曲家姓名、剧作名称、数量,而且还涉及戏曲的艺术风格,包含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戏曲流派的内容。其后,叶长海先生在《王骥德〈曲律〉研究》中认为,“笔者个人认为,当时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创作流派:越中派。”“越中派理论最精,不仅为后来的剧作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极大丰富了祖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宝库。”^②受到叶先生的启迪,1995年,我利用在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名下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认真阅读了越中曲家的作品和戏曲理论著作,并将王骥德不及论列的较迟的越中曲家如王思任、张岱、孟称舜、祁彪佳、王应遴、谢国、徐沁等,也视为该派成员。前后历时五年,完成了《越中曲派研究》。

《越中曲派研究》共九章三十节,27.6万字。第一章为越中曲派形成的文化背景,中间七章分别为:第二章越中曲派的奠基人与领袖——

①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② 叶长海:《王骥德〈曲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徐渭、第三章越中曲派中坚戏曲理论集大成者——王骥德、第四章嘉靖万历时期的戏曲创作与戏曲批评、第五章越中曲派劲旅——祁彪佳的戏曲理论、第六章明天启崇祯及清初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第七章越中曲派殿军——孟称舜的戏曲创作及理论、第八章越中曲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第九章为越中曲派的深远影响。

《越中曲派研究》出版后，赢得了专家学者的赞誉。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说：“浙江之有地域戏曲史造端于余著。昔伯良氏倡之于前，余君应之于后，洋洋乎越声，其可与龙山之酒比美必矣。”南京大学吴新雷先生说：“在过去的中国戏曲史著作中，对于明代的地域性曲派，只提昆山派、临川派和吴江派，而且把绍兴一带的吕天成、王骥德等人都划到吴江派中，模糊了史的发展线索。近十年来，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的余德余同志精心研究戏曲史料，从王骥德的理论著作《曲律》中探究根源，指出越中地区以绍兴府所辖山阴、会稽、上虞、诸暨、余姚等县为中心，戏曲作家和理论家人才辈出，他们并没有盲从吴江派，而是提出了吸收临川与吴江两派优点的‘双美说’，形成了越中派。余德余同志在《越中曲派研究》中探究了越中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具体论述了越中派曲家37人，剧作187种（现存57种），论著6部，并评析了越中派的理论影响，颇多新见创见。本书的最大成就是既能对越中曲派的群体进行整体的考察，又能对其中每个成员的创作道路和艺术追求作出具体的论析，从而显出这一群体的活力。”该著2001年荣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2002年荣获绍兴市第三届“蔡元培社会科学奖”。

二、关于张岱研究

改革开放后，国内对张岱作整体研究较早的是夏咸淳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其次是胡益民，相继撰写了《张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实两书内容相同，只是在排列上做了调整。另外还有张则桐的《张岱探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张海新的《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版）。我对“张岱研究”始于对他的《快园道古》（残本）的整理，与高学安合作校点了《快园道古》（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后对他更加关注。

张岱是徐渭“越中曲派”“自然本真论”的推崇者和继承者,我撰写了《张岱戏曲理论摭谈》(《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张岱的“水浒”观——兼议明末清初部分封建士子的文化心态》(《绍兴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全文刊印)、《张岱交游录》(《绍兴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张岱的史学成就》(《绍兴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1994年第1期全文刊印)。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我撰写了《张岱年谱简编》(分别刊载于《绍兴师专学报》1994年第1、2、3期)、《张岱的实学思想》(《绍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998年,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市社联等部门编撰《绍兴文化丛书·绍兴名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我撰写了《半生荣华半沦落,文中乌获兼斗杓——张岱传》和《身浊气雄业愈精,老铁峻嶒绝余媚——杨维桢传》。其后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策划出版《绍兴名士家世丛书》,我有幸撰写了《张岱家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2003年,浙江省社科院策划出版《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我撰写了《都市文人——张岱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有感于先前整理的《快园道古》是个残本,我撰写了《从张岱〈快园道古〉的编撰看其辑佚》(《古籍研究》2001年第1期),此后投入精力搜集资料,完成《快园道古》(增补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后又撰写了《甘洒热血存春秋——张岱〈自为墓志铭〉现象窥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2012年,英国BBC电视台台长麦克伍德到绍兴拍摄《中国的故事》,我应邀在府山西麓一茶馆为他们讲述张岱的故事。2014年,柯桥区史志办筹划编纂《绍兴名人志》,我应邀撰写《张岱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其后又撰写了《张岱与阳明心学》(《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明末纨绔子弟张岱传奇人生的启示教育作用》(《越文化研究》第113期)。

三、《山阴(绍兴县)州山吴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明清时期的绍兴,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如山阴县水澄巷刘氏、梅墅祁氏、峡山何氏、状元坊张氏、州山吴氏;会稽县陶堰陶氏、樊江商氏;

余姚县烛湖孙氏、王氏、吕氏；上虞县徐氏、倪氏等。这些世家望族的兴盛与族中子弟的科名获取密切相关，科名是衡量家族兴衰的标志。关于绍兴家族研究，有朱顺佐、张能耿编著的《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未作深入细致的整体研究。有感于此，我选择了山阴州山吴氏家族。这个家族的发迹与绍兴其他望族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通过从军获得武功和荫袭，从而快速发迹。吴氏家族诞生了吴兑、吴兴祚两任兵部尚书，一为明万历初年的宣府巡抚、宣大山西总督和蓟辽保定总督、巡抚，兵部尚书；一为清康熙十五年间的福建按察使、巡抚，二十一年的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因为当时频繁用兵，吴氏家族凭借裙带关系从军、建立武功的人甚多。

家族研究必须占有充足的资料，我对《山阴州山吴氏族谱》的道光和民国刻本都做了认真、细致、反复的阅读，做了详细的笔记，同时又查阅了相关人物的著作及地方志等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认真构思结撰。全书分为五章二十五节：第一章，山阴州山吴氏家族的渊源及其发展流徙；第二章，山阴州山吴氏家族涌现的重要人物，重点叙述了明兵部尚书、蓟辽保定总督吴兑，清兵部尚书、两广总督吴兴祚，众多的忠义之士，以及《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的编撰者吴楚材，近现代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吴善庆等；第三章，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与亲朋的交游，讲述吴兑与高拱、张居正、方逢时、徐渭的交往，吴兴祚与吴梅村、龚鼎孳、陈维崧、屈大均、万树等文士及幕府乡友的交往，吴孟明父子与钱谦益的交往，吴璜与蒋士铨、程晋芳的交往等；第四章，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上行流动的基本途径，有业儒仕进，从军荫袭，入幕、关榷、经商，从事财政、文艺、科技和手工技艺等；第五章，吴氏家族崛起后对绍兴地方的回馈和影响。该书出版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的扉页做了简要介绍，绍兴文理学院文学博士邢蕊杰《明清绍兴家族个案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余德余教授著〈山阴（绍兴县）州山吴氏家族研究〉》评论说：该著“进行了多角度、系统化实证分析，将既卓著当时又泽布后世的山阴（绍兴县）州山望族吴氏的政事、文行、武功等，呈现在读者面前，文献扎实，论析详细，是对尚显薄弱的绍兴家族史个案研究领域的有力开拓，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明清浙东地方家族文化提供了典型样本，有益史文。……可以说，这部书是近年来绍兴家族史研究中的

重要成果之一,从家族角度拓展了绍兴地方史的研究空间”(《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18—120页)。

四、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与杨维桢关系”的研究

1981年,浙江各地师范专科学校为深入交流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杭州师范学院马成生老师倡议下成立了“浙江水浒研究会”,每年暑期定期轮流举办讨论会。

关于《水浒传》署名作者“施耐庵”究竟是谁,七十多年来一直有激烈的争论,少部分学者认为是江苏兴化人施彦端,大部分学者如著名《水浒传》研究专家张国光、刘操南、刘世德、黄霖、马成生等,多次撰文驳斥予以否定。

为参加学术讨论会,我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其中感悟最深的是《身处乱世、沉抑下僚的封建士子的痛苦求索——关于〈水浒传〉思维模式的思考》(《北方论丛》198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全文刊印)的撰写。王子平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写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总爱在文学创作中把自己的历史命运与妇女的命运作着有趣的类比。”《水浒传》著者施耐庵也是如此,他通过一大批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的志士仁人、忠良义侠的不甘沉沦,一心冀图拯世救民、替天行道、立功扬名的种种努力,由于君昏臣奸,最后却落得个悲惨结局的下场,表现了身处乱世、沉抑下僚的封建士子由不甘沉沦,到奋发有为,再归于破灭的痛苦挣扎和对于功名事业不能善终的感慨。我在撰写《身浊气雄业愈精,老铁峻嶒绝余媚——杨维桢传》时,对杨维桢所处的时代和生平经历有所了解,又认真反复阅读他的诗文集,并开始注意他的文言小说。经过多年思考,将杨维桢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宗教观、妇女观、文艺思想与《水浒传》作多方面的考察比较分析,认为其与《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为吻合,《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极有可能是杨维桢的笔名。近年来,我先后撰写了《杨维桢与〈水浒传〉》(弘虫著《寻找施耐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版。《绍兴晚报》2016年5月13日“新知周刊”以“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余德余大胆提出:施耐庵何

许人也？可能是诸暨人杨维桢”为标题，整版摘录了此文的论述）、《杨维桢与〈水浒传〉三题》（弘虫编著《杨维桢与水浒》，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钱塘施耐庵”与“泉塘”杨维桢辨证》（《中国越学》2019年第10期）。

五、关于域外文化名人与绍兴的研究

不记得是谁说过“文化是交流的，人才是流动的”。在绍兴的历史上，既有本籍人士通过举荐、科举或入幕等形式从政外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也有外籍人士或做官或旅游或探亲进入绍兴。如古越时期来此会见“万国诸侯”，卒葬会稽的大禹；扶助越国句践发愤图强，复兴越国称霸诸侯的范蠡、文种；彻底改变越地人口结构和风俗，强化中原文化对越地影响的秦始皇嬴政；深入会稽实地考察，将越国历史向前推移至大禹时期的司马迁；发动民众兴建鉴湖，惠民千余年而遭报复含冤而死的会稽太守马臻；辛勤执政，创立王氏书艺遗泽千余年的王羲之；三入越州访友旅游，开创浙东唐诗之路的李白和孟浩然等一大批诗人，继之而来越地旅游的有柳永、秦观、姜夔、吴文英、袁弘道、李寄等；致力于地方治安，打击豪强，抗灾救民的元稹、范仲淹、赵抃、曾巩、王十朋、朱熹、辛弃疾、陈子龙等一批官员；不满清人统治，从事反清斗争而来绍兴联系，建立山阴祁氏寓园据点的魏耕、朱彝尊、屈大均等；身冒矢石、打击倭寇、保护百姓生命安全的吴成器；从事书院教学、培养地方人才的全祖望、蒋士铨等。正是他们的努力，绍兴的历史上才留下了无比丰富、可歌可泣的华章，《越绝书》《吴越春秋》《嘉泰会稽志》和明清时期的《绍兴府志》、各县县志的“名宦”“寓贤”都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有感于此，一是让今人了解他们在越地文化史上的贡献，二是为完善越地文化史，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精神，我精选了38位域外名人的事迹，编著成《宦游集——域外名人与绍兴》。其后又陆续撰写了《郑珍与绍兴文士的交往》、《周亮工与绍兴文人的交往》、《陈去病与绍兴》（《越文化研究》第85期）、《柳亚子与绍兴的情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徐承烈与〈越中杂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等。

六、关于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的研究

关于“绍兴文人结社”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注意了。教学之余,我常去鲁迅图书馆,摘录了不少资料,做了卡片,后来撰写了《绍兴文人结社》的论文,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绍兴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2期、第3期,1991年第1期,大约4万字。由于当时查阅资料有很多规定,既费效率又很低,要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困难很大,于是只得暂时搁置转向其他课题研究。但我从未放弃对绍兴文人结社这一课题的探索,时刻关心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研究的有关成果,从中学习借鉴、思索启迪,引导深入这一课题的可行性研究。在不断搜索资料、学习思考的过程中,利用原来研究的资料,再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逐渐清晰了。

(一)将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熔铸在一起研究。《绍兴文人结社》一文只是说“绍兴文人结社之风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42人在兰亭的修禊活动,……不失为文人结社的滥觞”,并未对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两个概念作出辨析,也未对绍兴地区后来的文人雅集活动予以注意。后来看了曾莹《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两书对“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概念的表述,受到了启发。

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来自同一源头,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有相通之处,文人结社肯定会有雅集。但从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目的来看,两者又有区别。相对而言,雅集的概念更为宽泛,诗社则是从雅集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与雅集的随意性不同,诗社对于结盟十分强调,组织形式更为严密,人员构成也相对固定,活动内容均有社规章程可依。雅集出现较早,而结社的出现较迟。绍兴文人雅集始于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42人于会稽郡山阴县兰亭的修禊活动,其后又经历了唐宋时期的文人唱和;绍兴文人结社始于宋末元初的“吟社”“汐社”“越中诗社”和“山阴诗社”,明清时期八股科举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文人结社与文人雅集的兴盛。绍兴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时而并行,时而交叉发展,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在我国的地方文化史上是一种少有的现象。我在前文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唐宋时期外域

文人来越地的唱和,也有越地文人参与外地的唱和与结社活动,还有现代绍兴文人在北京、上海结社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的内容。无论文人雅集还是文人结社,都属于文人社团史的范畴。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根据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发展情况,将文人结社概括为魏晋南北朝的萌芽期、隋唐的形成期、宋元的发展期、明代的繁荣期、清代的衰落期、近代重新兴起六个阶段。绍兴地区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的发展,我将其归结为东晋时期文人社团的滥觞期、唐宋时期文人社团的发展期、宋末元代的成熟期、明清时期的高峰期、近现代的转型期五个发展阶段。

(二)增加对文人雅集与结社在各个阶段的政治文化背景的研究。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活动的开展往往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我将文人社团的滥觞期、发展期、成熟期、高峰期、转型期五个发展阶段各设为一章,每章都有专节对形成的背景展开较为详尽的描述。如在第二章绍兴文人结社的滥觞期阶段,我着重探讨了西晋末年永嘉南渡,中原人士大量南迁,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向东南地区转移,文化重心亦随之倾斜。越地当时远离战乱,吸纳了大量南迁的人员,其中包括琅琊王氏、陈郡阳夏谢氏、北地泥阳傅氏、高阳许氏、太原王氏、江夏李氏、谯国戴氏、高平金乡郗氏、颍州鄢陵庾氏等世家大族。在此机遇下,会稽郡在南朝时迅速成为物阜民丰的都市,与当时的建康南北对峙。域内在政治文化上形成了一个追求个体精神自由、风流优雅风尚的文人集团,他们吸纳了少数土著士人参加,从而产生了兰亭雅集的文化壮举。唐宋时期,越州州治已经成为“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的著名都市。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社会动荡,而浙东地区相对稳定,越州比较富庶的经济和千岩万壑的山水环境,经过王羲之、谢安、谢灵运等人的文化张扬,使得“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藪”,文人骚客纷纷奔赴浙东地区,或宦游,或探访,寻求心灵慰藉。于是有李白、孟浩然、杜甫等诗人的探游,有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幕府鲍防等众诗人的浙东联唱,也有越州刺史李绅、元稹和旅越隐居的方干参与酬唱。两宋时期,蒋堂于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员外郎知越州,与僚属“曲水阁”唱和;秦观于元丰二年(1079)至越州探亲,与时任越州知州程师孟、杭州知州赵抃诗词唱和;辛弃疾在绍兴知府任上与姜

夔、张铤、刘过等人唱和；姜夔、吴文英与绍兴府官员和文士唱和；陆游于张铤北园与杨万里、尤袤等集会。宋元易代之际，元僧杨琏真伽盗掘南宋皇陵，激起了文士的反抗，他们结“吟社”“汐社”“越中诗社”，以诗词为武器，抒发故国之思。明清时期，绍兴已经失去了行政区域的优势，但由于前几代频繁移民，长期积淀，绍兴所属八邑出现了一批世家望族。随着明清八股科举制度的完善，这些世家中出现大批科举人才和文士，因而推动了文人雅集和结社活动趋向高潮。

（三）绍兴作为一个郡州府级的行政区域，文人雅集和文人结社持续发展 1600 余年，考察起来，大约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即东晋南朝至唐宋时期。绍兴是于越部族的发祥地，越国的首都，秦灭六国后成为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成为会稽郡郡治所在地，隋、唐、宋建制改为越州或绍兴府，但仍是浙东道治所，具有辖领浙东六州或六府的优越地位，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或宦或游或隐居。这些文士公余在越地组织诗歌联唱，如唐大历年间（766—779）鲍防、严维的浙东联唱、元和年间（806—820）李绅与薛苹的唱和、长庆年间（821—824）元稹与白居易的酬唱、方干与当地州县官员的唱和，两宋年间（960—1279）宦游于越的官员与越地文士之间的唱和。此时的文人雅集与诗歌唱和仍是以外籍文士为主，本地文士只是配角、被邀请的对象。通过唱和交流，提升了本籍文士的文学创作水平，也为外籍文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丰富的题材。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宋末至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绍兴所属八邑出现了一批世家望族，他们通过八股科举考试，涌现了一大批官员和文士，将文人结社、文人雅集推向高潮，出现了由本籍文士为主，吸纳外籍文士参与唱和的现象。不仅如此，绍兴文士还走出绍兴，参与外地的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并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杨维桢、王阳明、徐渭、陶望龄、吕胤昌、张汝霖、王思任、祁彪佳、黄宗羲、商盘、李慈铭等。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近现代，这一时期绍兴籍文士走出绍兴，走向北京、上海等，通过创办学校，出版刊物、书籍等方式结社雅集，或组织革命团体，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文学建设。

（四）深入探讨文人雅集与文人结社对当时时代文学创作和绍兴文化史的影响。自古以来，绍兴优越的山水人文环境吸引着外籍的文人

墨客，给当时宦游于越地的文士提供了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他们写作的大量诗词文不仅充实了他们个人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助推了当时时代文学的发展，并对后来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晋书·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他们徜徉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山阴兰亭雅集诗借助自然山水表现玄思理致，艺术水平虽然不是太高，却为以后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奠定了基础。王羲之为兰亭修禊诗写的《兰亭集序》也成为东晋优秀的散文，为后世所推重，其曲水流觞的修禊形式也为后世所继承。后或宦或游越地的唐宋文士更是络绎不绝，如李白三次来到越中，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千古名篇；李绅在越州刺史任上创作《新楼诗》二十首；元稹在越州刺史任上作《以州宅夸于乐天》，诗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后人遂在州宅原址上兴建“蓬莱阁”；辛弃疾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任上曾写下《汉宫春·会稽蓬莱阁观雨》千古绝唱，又在其相向之地创建秋风亭，亭成，又写下了《汉宫春·会稽秋风亭怀古》，引得姜夔、张镃、丘密、李兼善纷纷和作。

唐大历年间鲍防、严维于越州的联唱，对诗歌联句体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文体发展史上对文人词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南宋词人缔结“吟社”唱和的《乐府补题》之作，对清初诗（词）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大激发了清初词人蓬起写作咏物词、隐逸词的兴趣。王沂孙最工咏物词，为清中叶以后的常州词派所推崇。杨维桢凭借参与顾瑛“玉山雅集”的平台，为铁崖诗派成员的创作活动与发展兴盛提供了场所，也使杨维桢成为“元末最主要的诗文家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也是个色彩最突出的诗人之一”。明清两代，热衷参与雅集和结社的文士更多，他们中虽然未能出现一流的文学大家，却也涌现了各具特色的诗词文作家、戏曲家、教育家、思想家。如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王阳明、周汝登、刘宗周，诗文、戏曲、书画皆有成就的徐渭，诗人、戏曲家吕胤昌，文学家陶望龄，诗文皆擅、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王思任，散文家、史学家、戏曲鉴赏家张岱、毛奇龄，诗词、戏曲家吕师濂、吕洪烈、金娘、吴棠祯、姜垚、金镇、罗坤等，诗人刘正谊、金以成、商盘、周长发、

刘文蔚、童二树、陶元藻等。近代则有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等，现代更有鲁迅、蔡元培等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他们为中国现代的文化、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活动所创作的诗词作品大多得到保存并流传。东晋兰亭雅集至北宋熙宁五年(1072)七百年间雅集(或集会)活动所酬唱的诗作，为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保存下来。其后雅集或集会的诗文作品，《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高似孙编的《剡录》等也有收集。参与集会酬唱的唐宋作家的专集，后人整理的《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等也有收录。宋末至元明清雅集与结社的作品，大多由作者的诗文专集保存下来，明清编纂的《绍兴府志》和各县县志也有记述。此外还有山水专志，如《兰亭志》《云门山志》《龙山诗巢志》等，大量的氏族谱中也有记载。近现代的作者都有专集流传。他们的作品不仅彰显了当时时代的文学成就，更是绍兴地方的巨大文献库。为此，我将其编著成《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研究》，申报国家后期资助课题。

此外，我还编选了《绍兴历代游记选注》(绍兴县历史文化普及读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将当时绍兴境内的风景名胜分为府山、塔山、沈园、会稽山、禹陵、东湖、兰亭、鉴湖等18个景点，分别精选了历代名人的游记予以推介。我在《浙江文化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内容简介中说：“浙江区域文化包括史前上古越文化、有文字记载的于越部族和越国文化、秦汉以后的浙江文化三个部分，从区域而言，浙江文化史也是一部越文化史。”宁波万里学院将《浙江文化简史》作为大学生文化课的专门教材。

我坚信天道酬勤的道理，所以无论是在教学岗位上，抑或是在退休以后，只要在身体胜任的情况下，就一直坚持看书写作。看书，视野拓展了，资料积累多了，灵感活跃了；写作，今天写点，明天写点，集腋成裘，慢慢就形成了一定规模。因为是关于地域文化的论文，大多发表于《绍兴师专学报》或《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我的专著质量不高，但是在选题上，皆是当今少有人涉足的课题，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因此也以敝帚自珍自慰。

我的家乡是浙江建德市大同镇，1974年在其附近的李家村发掘出

了古人类的一颗牙齿,考古学界认为大约十万年前,在浙西山区建德一带已有人类活动,称之为“建德人”,这是迄今发现的越人最早的祖先。至今,在大同镇至寿昌镇周围五六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人们口头上还保留着古越语的遗存,那里的人们称船为“须虑”,称盐为“余(读衣)”。作为越族的后人,对于越文化研究,我们责无旁贷。

附件:

民盟市委诸领导:

我非常赞赏民盟市委和机关精心组织的在市文化馆举办的两次大型活动,但我对盟市委近几年废除了一年一次的全盟大会,停止了由倪自力同志主持的退休盟员每月一个下午集中学习的举措,持有不同意见,为此建议:

一、恢复一年一度的全盟大会,报告盟市委一年工作的计划,总结上年工作,表彰先进。使全体盟员了解一年工作重心,以便配合落实;表彰先进,通过典型介绍,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提升盟组织的凝聚力和自信力。

二、恢复退休盟员每月一个下午集中学习的惯例。退休盟员盟龄最长,对盟组织感情最深。发扬退休盟员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应是盟组织的职责。我们曾经坚持二十余年的学习活动,以前我曾建议认真总结,形成文字,上报盟上级组织,彰显我市盟组织领导有方,为市盟争光,惜未能展开。

三、应在提升民盟组织凝聚力,增强盟员自信心上下功夫。盟员在工作和参与社会活动中敢于亮出盟员身份,让市委市政府和绍兴人民了解盟组织和盟员的风采。过去《绍兴晚报》曾多次报道退休盟员蒋老师资助贫困生,周老师老有所学,剪辑报刊上有关信息,装订成册的事迹,但都没有亮出他们盟员的身份,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今后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我之所以上报《耕耘播种在越文化研究的田野上——我的越文化研究40年小结》,目的是向盟组织汇报我从1979年调入绍兴师专至今40年的教学科研情况。在市盟、校盟各届领导的关爱下,作为盟员,结合自己专业,为报答市盟、校盟和绍兴人民的培育而作出的一点努力。希望得到盟市委领导的重视,并能加上按语上报盟的上级组织,这不仅

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为彰显盟市委、校盟栽培之功争光。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我的用心实为市盟、校盟争光。我已步入老年,无所奢望,望领导体察。

有关著作如《越中曲派研究》2001年捐赠浙江图书馆收藏,其余大部分也在2017年响应盟省委号召,捐给浙江图书馆收藏,为此获得与陈国芬副主委赴杭参加省盟庆贺中国民盟成立70周年的机会,浙江图书馆也曾做过专题介绍。

以上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维护国家“风宪”的历史遗存

——西湾“进士第”牌坊及其主人陈穀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 孙伟良



残存的西湾牌坊

春风和煦，熙来攘往的高铁绍兴北站以南数百米瓦砾之中，我凝望着残存孤立的明代“进士第”牌坊，思绪潮涌……

2013年7月1日，宁杭甬高铁正式运行，绍兴北站人潮涌动。在此之前的2010年，为建设高铁站，周边村落，包括越城区灵芝镇大庆寺村西湾自然村正式腾空拆迁，遂有我的西湾之行。踏访的目的，是因为村子里有一座明代石牌坊。

西湾的行政归属几经波折。20世纪90年代初，尚为绍兴县齐贤区

嘉会镇大庆寺村的一个自然村。1992年5月,据浙民基字[1992]356号批复,绍兴县举行撤区扩镇并乡工



《绍兴晚报》报道的牌坊

作,新的齐贤镇由原齐贤镇、嘉会镇、陶里乡、狭獾湖乡合并而成,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齐贤镇志》收录“大庆寺村‘进士第’牌坊”,条目文字略显粗糙。2003年1月,行政区划又有调整,据浙政函[2003]12号批复,同意绍兴县齐贤镇的七里江、立岱、嘉会、大庆寺等15个村划归越城区灵芝镇管辖。于是大庆寺西湾“进士第”牌坊,列入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绍兴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文化视野》,“该牌坊是目前绍兴市区仅有的几处明代石牌坊之一,对研究明代牌坊建筑以及西湾村历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对于牌坊的历史背景及其主人,均未涉及。在本文中笔者将调查考证所得公之于世,以期引起各方的重视。

西湾以陈氏为大姓。村中“进士第”石牌坊为四柱三间牌楼式,通面阔8.51米,其中明间面阔3.95米,东西间各为2.28米。顶部残缺,系1956年特大台风所毁。额枋雕刻狮子戏绣球、凤朝牡丹、蛟龙出海、鲤鱼跃龙门等图案,明间额枋中间刻楷书“进士第”三字,上款有三排小字,模糊难辨,下款“为赐进士广西道监察御史陈穀”“弘治二年穀旦吉立”等字隐约可见。西湾村未拆之前的2010年6月8日、10日、13日,笔者分别与文史爱好者傅儒根、朱新学,以及绍兴电视台记者徐兵、《绍兴晚报》记者钱峰进行踏访,其时牌坊邻近处尚存坐北朝南临河古台门两处:稍东十余米台门门额悬高70厘米、宽210厘米“内台风纪”匾额一方,又东十余米台门悬高65厘米、宽170厘米“进士第”匾额一方。牌坊所在住户门牌,为“大庆村西湾16号”。弘治二年为公元1489年,可知此“进士第”牌坊已经存在了五百多年。

据《成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载:陈穀,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字推士,成化七年(1471)浙江乡试第26名举人,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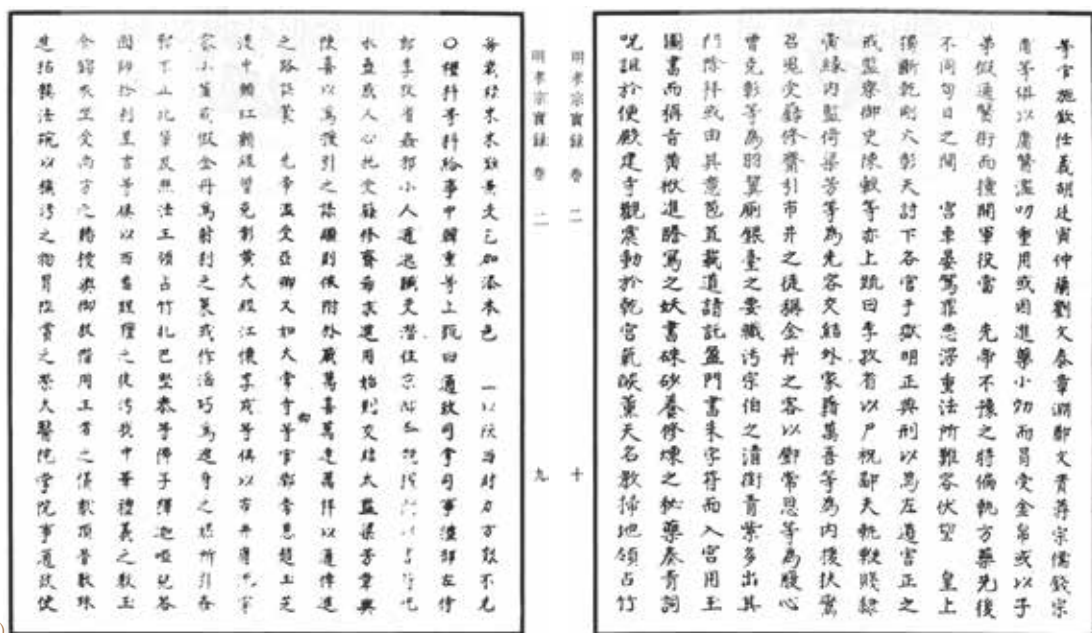


《大明会典》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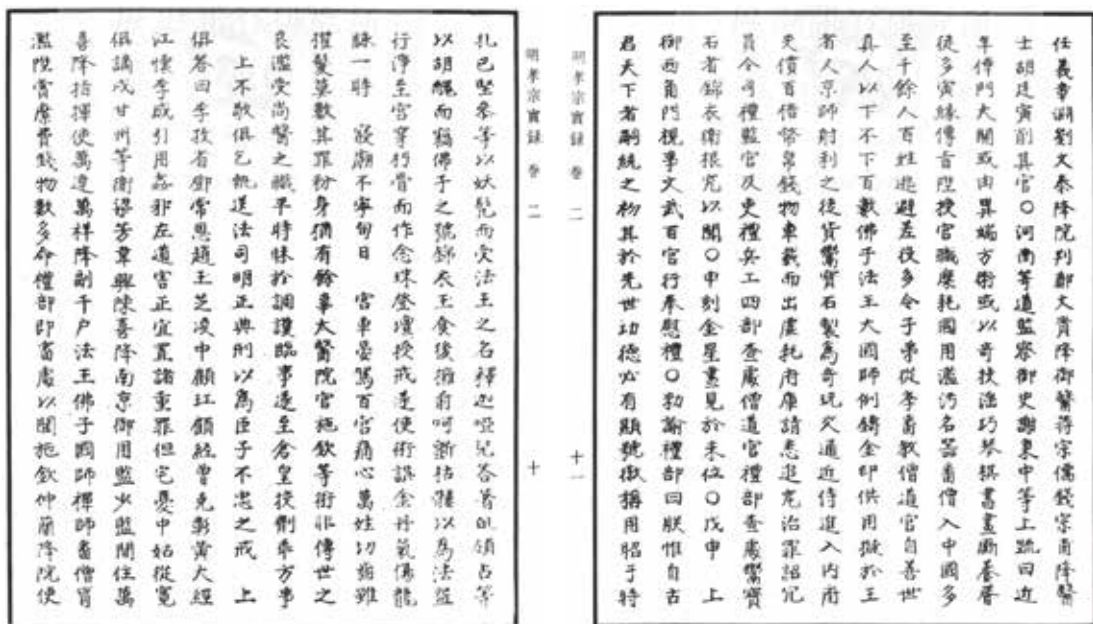
十一年会试第46名，旋为殿试三甲第173名，赐同进士出身。时年陈穀三十七岁，授庐陵县丞，后擢监察御史。

秦汉以来，国家主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明朝初年，国家政体组织形式大体沿用元制，中央设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分掌全国行政、军事与监察。《明史》记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御史台，十五年更置都察院（又名风宪衙门），主要职责是“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这是对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官吏的弹劾权；“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这是对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者的弹劾权。都察院属官，宣德十年（1435）定为十三道监察御史，凡一百一十人。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四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五道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三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监察御史系正七品，品秩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直接对皇帝负责。从牌坊下款的小字显示，陈穀是广西道监察御史，说得通俗点，笔者认为相当于今国家监察委员会成员，抑或负责广西的中纪委巡视组成员。

几经翻阅《明史》《明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明通鉴》，陈穀的事迹初露端倪。原来朝廷为陈穀建造“进士第”牌坊，在这褒奖的背后有着一段政治斗争往事。



《明实录》书影（一）



《明实录》书影(二)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二十二日,宪宗去世。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樞即位,史称明孝宗,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孝宗从其父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大批恃宠骄纵的宦官和奸佞。为了刷新政治,孝宗把清除这些人作为首务。即位第六天,他就将飞扬跋扈的宦官梁芳贬居南京,将奸佞李孜省谪戍陕西。当然,先是有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上书弹劾,控告李孜省及其同党邓常恩、赵玉芝勾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多不法情状,孝宗才下强硬措施的。《明孝宗实录》录存有礼科给事中韩重、监察御史陈毅的奏疏,现将陈毅的奏疏抄录如下:

监察御史陈毅等亦上疏曰:“李孜省以尸祝鄙夫,执鞭贱隶,夤缘内监,倚梁芳等为先容,交结外家,藉万喜等为内援。扶奩召鬼,受篆修斋,引市井之徒,称金丹之客。以邓常恩等为腹心,曾克彰等为羽翼,厕银台之要职,污宗伯之清銜。青紫多出其门,除拜或由其意,苞苴载道,请托盈门。书朱字符而入宫,用玉图书而称旨,黄袱进眷写之妖书,朱砂养修炼之秘药,奏青词咒诅于便殿,建寺观震动于乾宫,气焰熏天,名教扫地。领占竹扎巴坚参等,以妖髡而受法王之名,释迦哑儿答著乩领占等,以胡丑而窃佛子之号,锦衣玉食,后拥前呵。斫骷髏以为法盃,行净至官,穿朽骨而作念珠,登坛授戒。遂使术误金丹,气伤龙脉,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官车



《明代监察制度研究》书影

晏驾。百官痛心，万姓切齿，虽擢发莫数其罪，粉身犹有余辜。太医院官施钦等，术非传世之良，滥受尚医之职，平时昧于调护，临事遂至仓皇，授剂乖方，事上不敬。俱乞执送法司，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

明孝宗接下去的处理是，妖人李孜省杀头、巫术僧人继晓发还原籍为平民，太常卿兼道士赵玉芝、邓常恩贬官发配戍边，番族僧人与国师领占竹等革除官职，奸佞小人梁芝、陈喜等发往孝陵（南京朱元璋陵墓）侍候香火。成化年间还出现了大批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孝宗下令清汰传奉官，罢黜右通政任杰等两千余人，并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陈穀是有功之臣。为了表彰陈穀，朝廷于弘治二年（1489）赐建“进士第”牌坊，并赐“内台风纪”匾额一块，时年陈穀五十一岁。牌坊是封建社会旌表科甲及第、彰显功德地位的标志，相当于当今的纪念碑。古代的牌坊，象征着皇帝的恩宠，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荣耀。元代在地方所设称“行御史台”，俗称外台；在京城御史台别称中台，亦叫内台。“内台”在明代是都察院的别称。“内台风纪”匾，是朝廷肯定陈穀的工作，发给他的嘉奖令，其意为陈穀是都察院监察御史的楷模。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1923—2015）在《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中写道：“陈姓是从城北阳嘉龙附近的西湾村迁移到城内的。我幼时每年清明节都去西湾扫墓，并在附近的宝盆庙上香。西湾族人称我们为‘庆昌房’。”可以肯定的是，明代的陈穀与陈桥驿先生属于同族，至少陈穀是陈先生的族祖。遗憾的是，恩师陈桥驿先生已驾鹤西去，我不能再请益先生，求教内中之缘由，这将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戊戌春分之日，春风和煦，我再度踏访西湾“进士第”牌坊。高铁运行已数年，拆迁之后的西湾民房几乎荡然无存，偶遇村民陈六四料理蔬菜地，略作采访。陈六四属鼠，现年七十一岁，因其出生时祖父六十四岁，故取名“六四”。陈六四口述：西湾有六十余户陈姓，头代称作“十五太公”，生九子，为九房，唯四房较兴旺，居西湾，其余房头或他迁，或绝房，从懂事起，未知有家谱存在。陈六四原住“内台风纪”台门内，旧时台门口左右竖立四块、各一对旗杆石。而今，原水乡村落西湾唯“进士第”牌坊兀然矗立于瓦砾上。我徘徊良久，思绪万千……

“王城”考

——由王城的史料、民俗以及民间故事等推论
其是越国陪都

绍兴市文旅集团 张钧德

历史上王城作为地名不止一个，春秋时就有两个“王城”，且来头都不小——一个是周朝的陪都，一个是大荔戎国的都城。也就是说，有资格称为王城的，必须与国都沾上边。

周朝的王城指成周雒邑，周成王时所建，今在其遗址建洛阳王城公园。《春秋·昭公二十二年》云：“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杨伯峻注：“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东汉张衡《东京赋》曰：“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

大荔戎国的王城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左传·僖公十五年》云：“晋阴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杨伯峻注：“王城当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周贞定王八年（前461），秦厉共公秘密调集军队进攻大荔，一举攻克王城并灭了大荔国，该地从此成为秦国“朝邑”的一个县。

但是春秋后期还有一个王城却鲜为人知！它深处会稽山腹地，亦即今天绍兴的王坛镇王城村。

二

《吴越春秋》卷八有这样一段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渚，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众栖于会稽之山，请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结吴宫，幸来归国，追以百里之封。将遵前君之意，复于会稽之上，而宜释吴之地。’范蠡曰：‘昔公刘去邠而德彰于夏，宣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吴国划了一块方圆百里的地给越国——东至今上虞的炭渚，西到今萧山的周宗，南及会稽山麓，北止杭州湾海滨……越王句践说：“孤王不能继承先君的制度，不能修身养德而保全自己，反而使民众逃亡，使军队被攻破，自己躲在会稽山上，祈求别人保全生命，乞求别人开恩帮助，蒙受奇耻大辱，被囚禁在吴国的石室之中。现在侥幸回到了祖国，吴王还给我百里之地的封地。我将遵循先君的意志，再回到会稽山上，所以应该放弃吴国赏的地盘。”范蠡说：“从前公刘离开了邠国而他的品德在夏朝更加显扬，古公宣父把土地让给了羌人而名声从岐山脚下传播开来。现在大王想要确定与建立国都而抛弃敌国的区域。但不住在平坦开阔交通方便的闹市、占据四通八达的地方，将来怎么建立称霸称王的事业呢？”越王说：“寡人的计划还未最终确定。不过想要筑起城郭，规划街巷这事。想委托范相国多多操心。”历史有记载是越王句践接受了范蠡的建议并委托范蠡营建现在的绍兴城，没有确切地记载越王句践是继续在会稽山筑城还是放弃了这个初衷。但从会稽山腹地保留下来的“王城”这个地名分析，我们推定越王句践委托范蠡在“四达之地”建今日之绍兴城时，自己悄悄地在“会稽之上”秘密筑城——这就是今天的王城村。

三

说到地名，除了王城，还有一个王过岭也值得一说——这个岭是王者所经过的，来历肯定不凡！

王过岭的一头是王城村，另一头是平阳村。清初毛奇龄在《重修平

阳寺大殿募疏序》中说：平阳“越王句践尝都之”。今人如陈桥驿之《绍兴史话》、方杰之《越国文化》、傅振照之《绍兴史纲》皆宗此说，因此此说已几成定论。

平阳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箕形盆地。绍兴城未建成时，平阳是越国都城，后来迁都绍兴城，平阳从此成了废都。但在时间的坐标上，先有平阳，后有绍兴。而王城与绍兴城的关系仿佛是“寄生胎”。寄生胎就是本来可以是双胞胎的，但因为位置不正，其中一个孪生胚胎没有得到正常发育，成了依附在另一个正常胎儿体……反正它与绍兴是共生体却没有得到同步发展！

由于王城有这个基础，所以一直是会稽山腹地之重镇。民国时店铺有一百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是乡政府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公路交通的日益发达，村子才逐渐凋敝。如今的王城老街，行人稀少，街面破落，但很多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依旧顽强地坚守着。

四

王城村中还有个天官庙及关于天官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梗概是：村里有个姓蔡的人在京城做大官，当地人称他为“蔡天官”。蔡天官有一双腾云鞋，因此，他能日日上朝，夜夜归家。

有一次，天官回家和夫人在房里轻轻说话，不料其母从房外走过听见，这引起了她的猜疑，心想我儿在京城做官，媳妇房中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难道她不守妇道？为此，天官娘留心起来，每晚都去媳妇房门口偷听，每晚确有男人声音，天官娘一怒之下一脚踹开媳妇房门，进去一看，原来坐着的男人是自己的儿子……天官向母亲讲明原委，天官娘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嘱咐儿子和媳妇早些休息，自己也回房睡了。但天官娘心疼儿子，想儿子日日上朝，夜夜回家，多少辛苦，媳妇年纪轻轻，膝下又没有孙子，如果儿子能够有时间和媳妇在一起，让他们亲亲热热，那该多好呀，她在心里盘算着。有一天，天还没有大亮，天官娘就偷偷地进入媳妇房中，把那双腾云鞋拿走放在自己房中的马桶角落头。腾云鞋是灵气宝物，一旦放在污秽之处，灵气便消失了。等到天官一觉醒来，找腾云鞋，没找到便去问母亲。天官娘起先不承认，在天官的再

三恳求下，终于说出了原委，拿出腾云鞋，天官急着穿上，但那腾云鞋再也不会腾飞了……

京城路途遥远，非一朝一夕能赶到。皇上见天官多日不上朝，便向其他大臣问原因，平时与天官不和的官员借此机会搬弄是非，惹得龙颜大怒，派出人员调查，调查的官员也与天官有过节，便趁机陷害。他们来到天官家乡一晃，便回朝编造了一道奏章给皇上，说：“天官私造王城，暗筑青黄祭天之坛，金浇山，铜浇岭，富有无比，养马于马溪之边，按兵在寨营之口，身有腾云鞋，心怀篡谋意。”于是皇上将天官处斩。说也古怪，天官被杀后，老天黑暗三天三夜，这时皇帝心慌意乱。朝上有一官员硬谏，说天官平日清廉，忠心耿耿，请皇上再次查察。皇上也自知一时糊涂，准奏。调查以后，真相大白，原来王城是天官老家的村名，不是王之城，青坛、黄坛也是王城附近的村庄，不是什么登基之坛，金家山、童家岭都是借音虚构，马溪也是地名，不是什么养马的地方，寨营口也不是按兵场所，完全是诬陷。朝廷用赤金铸成人头厚葬天官。其墓在王城的坂山里。

这则故事可以这样解读：这个“天官”是越王句践的臣下，当时的京城是平阳，两地相距大概二十公里，若从王过岭走还有近路可抄，脚力好点的人确实可以早出晚归。也就是说，范蠡在营造绍兴城的时候，该天官在王城负责营造另一座城以备不测，后来越国崛起灭了吴国，王城也就不需要了。至于天官姓蔡，那是后来王城附近蔡为大姓强势加上去的。

五

王城村村北有一座白虎山，也叫伏虎林，由于林中树木专用于做船，又名船树岭。现在是柯桥区唯一的“生态风景林”，被列为绍兴市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伏虎林有一则民俗也很有意思，当地族规严禁砍伐，因而树木长得茂盛。但地处滨海的斗门人可以来采伐，最后一次采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什么缘故让王城人自愿无偿做他们的育林护林人？只有一个理由——斗门是越国造船基地之一，王城是越国伐木基地之一。越国灭亡后，这个规矩不但没有破，反而延续了二千多年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四篇

人文绍兴

剡地与戴逵、戴颙相关遗迹介绍

嵊州市文广旅游局 王鑫君

戴逵(约 326—396),字安道,谯郡铨县(今安徽濉溪)人。东晋初期,随父綏、兄逵居京都建康(今南京市)。戴逵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尤精雕塑,后人尊为“雕圣”。戴逵擅长佛教雕塑,将西域传来的佛教造像式样,结合本土艺术特点,首用“夹纻”漆艺雕塑佛像。在建康所作的“五世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瓦棺寺“三绝”。绘画长于人物、佛像、山水,所画作品被誉为“百工所范”^①。对音乐造诣颇深并精通演奏。对经学也颇有研究,著有《五经大义》《戴逵集》等,惜多散佚。

戴逵入剡在东晋永和八年(352)至十年(354)间,时太宰武陵王司马晞使人召其鼓琴,戴逵不从,怒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②兄戴逵携琴代往,戴逵遂避居会稽剡县。来剡后,戴逵多次拒绝朝廷征聘,悠游山水,淡泊自甘,过着隐逸生活。王子猷雪夜泛舟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③,成为典故。戴逵居剡 40 多年,七十而卒于剡。

戴颙(约 377—441)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一生居剡,秉承父志,拒绝朝廷征聘,以创作、著述为乐。戴颙精于雕塑佛像,首创“藻绘”艺

①(南齐)谢赫著,王伯敏标点注释:《古画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5 页。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85 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杨牧之、胡友鸣选译:《世说新语》,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7 页。

术；亦擅书画，工人物山水，与陆探微齐名；并精通音乐，他和长兄勃皆受琴于父，父死后，以“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琴，兄制五部，颙制十五部，颙又制长琴一部，并传于世”^①。著有《中庸传》《月令章句》《逍遥论》和《戴氏琴谱》等。戴颙卒葬于剡县城北门外。

戴逵、戴颙人称“二戴”，在剡地留有多处遗迹。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大部分已湮没无闻。现将剡地“二戴”遗迹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 戴公宅(戴逵精舍)及戴望村

南宋高似孙《剡录》卷四载：“戴公宅在剡桃源乡。宋景文公诗：舟来戴公宅，客过孝王家。乡有戴村，村多戴姓者。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屋宇。在剡为逵造宅，甚精整。戴始往，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②

宋时，剡城有二十四坊，其中桃源坊在城北，因旧有桃源观而名；全县有二十七乡，桃源乡在城西三十里（今甘霖镇）。据地方文史专家金向银先生（笔名索直）考证，《剡录》所提戴公宅（戴逵精舍）并非在桃源乡，而是在桃源坊。戴村即今城北剡山戴望村。^③据《嵊县志》记载，明代嵊城有四个城门，北称“望越门”。故各取一字取名今之“戴望村”。

戴逵携子戴勃、戴颙隐此，以琴书自娱。戴公宅（戴逵精舍）在唐前已不存，其旧址上建招隐寺。有唐张祜《题招隐寺》诗为证：“千年戴颙宅，佛庙此崇修。古寺人名在，清泉鹿迹幽。竹光寒闭院，山影夜藏楼。未得高僧旨，烟霞空暂游。”^④明嵊人周汝登《戴安道宅》诗点明宅址在星子峰前，诗曰：“星子峰前草满坡，醉余乘兴复经过。山通曲径村烟古，水落寒潭树影多。歌鼓城中喧落日，鸥凫江上弄轻波。戴公宅畔寻遗事，惟有枯松挂薜萝。”^⑤意指剡山招隐寺为戴逵旧居。宋时，招隐寺改建为依吟阁，明清时为闲闲庵，今为戴望村村委所在地。

2. 戴逵别业(逵溪滴水岩)及逵溪、逵溪村

《嵊县志》载：“孝节乡有别业遗址，其地称逵溪。”

逵溪村位于嵊州市西北6千米处，坐落在飞凤山西北麓的丘陵上。有古道经石木湾、大洋、钳口岭通嵊城，现有公路通崇仁镇。逵溪村村后有片云岩，有瀑布，自成一屿，俗称滴水岩，传晋代名士戴逵别业就建在滴水岩下。明万历年间，会稽释古愚来到剡地，结庐逵溪，在滴水岩戴逵别业旁建雨花庵，又僧圣因、圣由两人于岩东置田200余亩，建大

①（南朝梁）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6页。

②（宋）高似孙著：《剡录》，嵊州市图书馆戊戌重印。

③ 索直：《戴逵后裔迁归嵊州记》，嵊州新闻网2011年4月29日。

④《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⑤《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逵溪

悲殿一座。清代，僧人宁远(释净地)前来剡溪寻访戴逵遗踪，当他于戴逵别业旧址前驻足时，心中顿生感慨，遂赋诗一首：“扶云独上雨花山，几度回眸怯步艰。竹隐鸣禽声细细，岩悬瀑布响潺潺。天花夜落千株静，蝶梦春回一榻闲。他日卜邻容我否，傍崖缚屋两三间。”^①

村前有溪，洗屐、砥流、招隐三桥自上而下横卧其上，传为戴逵洗屐处，故溪流与村庄均以逵溪命名。

3. 逵溪洗屐、砥流、招隐三桥

洗屐桥、砥流桥、招隐桥均位于崇仁镇逵溪村，1988年6月公布为嵊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嵊县志》记载：“洗屐、招隐两桥皆戴逵遗迹。”

^①《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191页。



砥流桥



招隐桥

逵溪之雨花山滴水岩筑有戴逵别业,后人为纪念戴公,将所在村庄和溪流均以逵溪命名,还于逵溪之上砌筑三石桥,分别以“招隐”“洗屐”“砥流”命名,以示对戴逵的怀念。

洗屐、砥流、招隐三桥均系南北走向单孔石拱桥,自上游而下,以500米、200米的间距,架于逵溪之上。桥面长8—10米,宽2.60—3.37



滴水岩

米。上游两桥侧面镌有“洗屐桥”“砥流桥”桥名,砥流桥桥面用条石呈回字形铺砌,“招隐桥”无铭文。现存三桥均为清代建筑,曾是县城通往崇仁古道的重要节点。

4. 金庭戴公山

南宋高似孙《剡录》卷四载:戴公山在忠节乡,今属金庭观,可二百亩。山中多茂林丛竹,又有清流激湍、林崖苍石互相映带,山之巔有龙湫。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晋安帝纪》云:“(逵)多与高门风流者游。”戴逵来剡后,与名士高僧结交,至东山访谢安,为其操琴;赴石城山栖霞寺,听支遁讲经。王羲之邀他和许询住金庭,故有戴公山。

5. 戴逵后人聚集地及戴氏家谱

自戴逵入剡,生子勃、颢,颢卒葬于剡。戴颢无子,女适张邵儿子。戴勃生一子,名朔,居剡,赠朝奉大夫。据地方文史专家金向银先生考证,至六世,戴逵后裔离剡,其子孙散居全国各地。

通源里大坑《谯郡戴氏宗谱》载:戴惠生为北宋至和、靖康间人,为戴逵三十四世孙,从台州孟岸迁回戴逵旧居剡山。这是戴氏去剡后的第一次回迁。戴惠生归剡时,戴逵剡山精舍早已不存。从戴惠生迁归剡山至南宋嘉定八年(1215)高似孙著《剡录》,已历百年,戴氏人口繁衍,成

为村落，名戴村。戴村即今戴望村。戴村戴氏以惠生为一世祖，后一派迁分水县森口渡（今桐庐市北乡）。明代晚期，森口渡戴绍全一派寓居诸暨枫桥，时嵊县戴村已无戴氏，其旧地为他姓所居。清康熙晚期绍全公后人迁归嵊县时，以嵊县东八九十都牛宅洋（今黄泽三王附近）和嵊县西三十七都里大坑为宅，并皆以戴逵为始祖，惠生公为第一世。

戴氏迁归嵊县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始修宗谱，今存嵊庠生周烈撰《重修宗谱序》曰：“绍全府君由分水而居诸暨之沙梗，至子若孙，视剡山水秀丽，田土丰盈，乃复剡居焉。”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嵊邑《戴氏分水迁剡支谱》，谱系人文记载俱全，今存里大坑。此后，戴氏又于道光五年（1825）、咸丰元年（1851）、光绪二十三年（1897）、民国二十六年（1937）重修嵊县《谯郡戴氏宗谱》。今里大坑存民国宗谱一部，全二册。

牛宅洋戴氏，至清光绪年间，或外出不归，或无子而终，至民国二十六年重修《戴氏宗谱》时，已无一人入谱，村名今已失传。里大坑戴氏则人丁兴旺，虽有外迁至甘霖镇戴家（求杓湾）、东山、石璜镇新沃等地者，至今仍为嵊邑戴氏聚居地。

6. 戴颙墓

戴颙，戴逵次子，字仲若，世居剡下，隐遁有高名。颙年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戴颙一生精通音乐，以创作、著述为乐，并



戴颙墓

精于佛像雕塑,亦擅书画。南朝宋元嘉十八年(441),戴颙去世,时年六十四岁。南宋高似孙《剡录》卷四载:“戴颙墓,县北一里。王僧虔《吴郡记》曰:颙死葬剡山,有后人所立石表。”

戴颙墓位于北直街今艺术村东南角(一说为北直街嵊州市初级中学校舍西北角),有文字记载已1400多年,1958年被毁。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作有《剡溪杂咏·戴颙墓》诗,予以凭吊纪念:“旷野冢累累,子孙犹不知。千年戴颙墓,三字道旁碑。”^①

《剡录》《重修浙江通志稿》《嵊县志》等史料记载:到宋绍兴二年(1132),县令范仲将曾作享堂于墓下。嘉泰三年(1203),四明人楼钥为书本传,立碑于道左。嘉定八年(1215),县令史安之重建墓亭,以便祭扫,并于亭左右绘剡中先贤像。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县丞汪庭作雪溪精舍于墓左,置田八十亩以供祀事。明弘治十三年(1500),知县徐恂重建墓亭。直至民国年间,尚有人来此祭拜,或作诗以志其事。

另,戴逵居剡40多年,七十而卒于剡,墓亦在剡地(《民国嵊县志》卷十八《人物志》)。南宋宝祐年间进士舒岳祥《山甫游嵊拜戴安道墓而归新年过我凤栖作此赠别》诗可证:“尚谒死安道,宁忘生阆凤。千岩几尊酒,百岁一枝筇。且可耽甜黑,何须醉软红。谢公离卧处,明月在岩松。”^②惜戴安道墓已随历史湮灭,今不可考矣。

7. 戴仲若携酒听鹂处(听鹂亭)

《嵊县志》《嵊县古文物志略》(冯农编)等史料记载,戴仲若携酒听鹂处(听鹂亭)在县城北门外一里处,超化寺前。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知县陈纯士号召合邑士民在其处立碑。据传,戴颙每年春季都要携琴及斗酒双柑到这



听鹂亭

① 吴宏富编著:《南宋大贤王十朋刻中诗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页。

② 《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里听鹂操琴,后人以为韵事。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载:“戴颙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汝知之乎?’”清代道光年间戴仲若携酒听鹂处已残破,清同治年间越中文人马赓良《偕沈懋卿周晓征寻戴仲若听鹂处》诗可证:“凉飈动秋兴,幽讨剡城隅。古迹空山在,荒碑夕照孤。寒云连竹柏,野水长菰蒲。无复黄鹂啾,啾啾宿鸟呼。”^①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邑人在原立碑处重造石碑石亭,曰听鹂亭,石碑仍书原字,亭两旁柱上有楹联,题“莺花三月暮,柑酒六朝春”。民国时,尚有文人结诗社、邀诗友,担菊携酒至听鹂亭饮酒赋诗。1958年,听鹂亭被毁。

8. 二戴书院

《道光嵊县志》载:“二戴书院,在县北一里,故戴逵及其子颙读书所。元元贞二年,浙东佥事完颜真、尹余洪建。至正五年,令冷瓚重修。二十年,毁于兵。二十四年,守帅周绍祖重建。后复毁。明成化十年,知县许岳英重建。春秋祀焉。今废。”

二戴书院旧为戴逵、戴颙父子读书处,元元贞二年(1296)建,祀二戴,集诸生肄业其间。后几度兴废。清同治年间,知县严思忠因市山弄有明度庵,庵以事讼判充公,故建议将校址从县城北门迁于此,至光绪初年,知县陈国香始捐资落成。清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应聘担任剡山、二戴书院山长,订立《书院学约》,并对教学方法、课程等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新的教学模式来代替旧书院制度。光绪二十九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二戴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后,又先后改称为县立高等小学校、县立二戴中心小学,辛亥志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的周志由等曾任校长。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机轰炸嵊城,二戴小学校舍全毁。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成立二戴小学复校委员会和校友会,终因经费无着,未能如愿。

二戴书院(二戴小学)历经元、明、清、民国,共存世646年,曾三次被毁、两次移址,毕业学生不计其数,著名的有民族号手任光等。

9. 戴溪、戴家溪、戴湾、戴逵滩、访戴坊、访戴驿、舫雪楼、戴溪亭、访戴亭、子猷桥

剡溪又名戴溪、戴家溪、戴湾、戴逵滩。戴溪之名出自南朝宋刘义

^①《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剡溪

庆《世说新语·任诞》有关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唐李端谓之戴家溪,诗曰:“戴家溪北住,雪后去相寻。”唐方干谓之戴湾,诗曰:“戴湾冲濑片帆通,高枕微吟到剡中。”宋代状元、绍兴人齐唐谓之戴逵滩,诗曰:“春树深藏嵎浦曲,夜猿孤响戴逵滩。”^①南宋高似孙《剡录》、《嵎县志》、清光绪张桂臣《越中名胜百咏》等均有相关记载。

《剡录》载:县城有访戴坊,为二十四坊之一。访戴驿,旧在县左之访戴坊,嘉定八年,县令史安之重建于东门之外。舫雪楼,嘉定八年,县令史安之新创,出东门,在访戴驿之南,下俯清溪,前列叠嶂,楼之下匾曰“剡川一曲”。

至迟宋时,嵎城建有戴溪亭。南宋高似孙《剡录》载:“戴溪亭,出南门,枕碧溪有戴溪亭,佳山清湍,芊林古渡,蔚茂平远,尽入临眺。”《同治嵎县志》卷一《地理志》载:“戴溪亭,在县南二百一十步,绍兴初知县姜仲开建。”绍兴十五年(1145)冬,王十朋首赴临安补太学,途经剡溪,慕名前往戴溪亭,拜祭隐居会稽剡县终身不仕的戴逵,赋《戴溪亭》诗:“高士逃名隐此溪,凭栏遐想独徘徊。不知吾祖乘舟后,得得谁从雪里来。”^②嵎城还曾建有访戴亭。《同治嵎县志》卷一《地理志》载:“访戴亭,在艇湖山下。”由此可见,戴溪亭与访戴亭为两个不同的建筑,但均与戴逵有关。

王子猷剡溪访戴回舟处,在今嵎城艇湖山下,从会稽沿曹娥江入剡溪可直达,旧时有子猷桥等古迹。宋代张旌赋诗《子猷桥》:“千山雪霁玉嵯峨,百里冲寒特地过。纵使兴阑回棹去,绝胜俗客到门多。”^③明代嵎县人胡淮《子猷桥》诗云:“百尺长虹卧碧波,依依两岸枕青莎。绝怜

①(宋)高似孙著:《剡录》卷二《山水志》,嵎州市图书馆戊戌重印。

②吴宏富编著:《南宋大贤王十朋刻中诗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③《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一夜扁舟兴，赢得芳名万古多。”^①《道光嵊县志》载：“子猷桥，在艇湖山麓，晋王子猷返棹于此，旧有桥。明成化十年，知县许岳英重修。隆庆间，县丞立碑识之。万历十八年，西隅义民喻裁重建。”

访戴坊、访戴驿、舫雪楼、戴溪亭、子猷桥等古迹，今已不存。

10. 艇湖塔

艇湖古时有湖直通剡溪，清《浙志便览》言：“旧曰剡溪由西北环城出艇湖，后因洪流南徙，始东门外引河北入古溪，堤以右。”艇湖是历代文人的游憩之所，他们泛舟湖上，登山望远，留下了许多佳话。晋时王子猷雪夜访戴，更使艇湖声名远播。旧时有子猷桥等古迹，今圯没。唯艇湖山顶尚存一塔叫艇湖塔，与谢慕山上的天章塔遥遥相望。

艇湖塔，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嵊县志》载：“艇湖塔，在艇湖山。嘉靖二十四年知县谭潜建，崇祯丁卯圯，知县方叔壮重建。”艇湖山是高仅百米的小山岗，塔就建于山顶一较开阔处。站在艇湖山上，东南方向是剡溪，西南是嵊州市区。

艇湖塔平面呈六边形，高七层，为楼阁式砖塔，用青砖构筑；塔南有石香炉，腹刻“崇祯玖年拾贰月盟……”等铭文。在塔顶还发现刻有“崇祯九年”的铭文砖。2002年对艇湖塔进行了全面修缮，修复了塔身的



艇湖塔

^①《历代咏剡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161页。

多处裂缝,恢复了塔刹。艇湖塔底边长 3.5 米,底层南面开门;以上每层设壶门二或三个,每面上下层对置或间层错开,门道由多个高低券构成。每层用青砖叠涩出檐,砖檐用异形棱砖和菱角牙子砖相间错缝叠砌,每层面阔、层高和壁厚皆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塔内中空,每层原似有楼板和楼梯。塔刹伸出塔顶的部分为 5.8 米,塔总高 31.42 米,塔刹由铁铸多重相轮构成。配置照射灯光,成为嵊州市区的标志性建筑。

11. 访戴桥

位于双塔大桥与高速公路桥(东二桥)之间,横跨剡溪。概算总投资 2358 万元,桥梁全长约 237.6 米,设计标准宽度为 6 米,主跨径 55 米,共 5 跨,桥型结构为变截面连续箱梁桥,上部为古廊桥式建筑。2017 年 7 月建成通行。

访戴桥为慢行桥,在旧时访戴驿附近。访戴桥为广大市民提供慢节奏绿色出行的同时,也为大家休闲畅叙提供了一个好去处,体现了廊桥通行、休憩相结合的功能。

论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的当代价值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邵剑耀

【摘要】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完全人格教育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是造就个体健全人格的基础和前提。蔡元培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当代社会落实素质教育、加强道德教育、开展世界观教育、实施艺术教育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 “五育”并举 完全人格

绍兴地处浙江中北部，这里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似乎每走一步，都可以找寻到一处古迹、典故。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古城，历代人才辈出，自古以来，不论哪一方面的杰出人才，绍兴人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就诞生于此。

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教育独立议》）民国时期，他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

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其完全人格教育思想出发,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丰富了教育理论,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五育”并举思想的主要内容

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思想是融汇古今、融汇中西的多维度思想体系,“五育”具体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一)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思想是从国外传入的,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在国内萌生。当时国内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重文轻武,缺乏“尚武”精神,加上军阀割据,国外列强不断侵略、破坏我国主权。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在中国有提倡的必要,应将军事教育引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培养国民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精神,寓兵于民,对内打倒军阀统治,对外抗击外国侵略,增强国民爱国意识,共同捍卫国家主权。

蔡元培主张的军国民教育,除了“强兵”“救国”外,他更关注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他强调体育在学生完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认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方面,通过体育锻炼,“发达学生的身体”,增强体质,促进学生健康的生理生长;另一方面,在体育教育中灌输军事意识、“尚武”精神,增强民族责任感,同时培养学生受挫能力,促进其健康的心理发展。体育与德、智、美等诸育关系密切,相互渗透。在体育教育中,要结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学生潜能发挥,坚持锻炼,促进其身心诸方面全面协调地发展。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加快了近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在体育课程建设、体育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旨在“富国”。“实利”即实际利益。蔡元培受到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密切关注人民生计问题,将教育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希望通过教育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蔡元培所指的实利主义教育,包括智力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蔡元培十分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主张实施分流教育,即在小

学教育之后,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分流,一部分继续升学接受中学教育,一部分接受职业教育。其目的是使学生个性得到全面发展,“造就国家有用之材”,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改善“人民失业、国家贫困”的现状。蔡元培将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带入中国,引发中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后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五育”的核心,是培养完全人格的根本,对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道德教育是消除“私斗、侵略”“强凌弱、智欺愚”等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即自由、平等、博爱,与中国传统道德中封建等级性质完全不同,但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否认了中国传统道德。他认为,应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道德中符合时代的内容,将其与自由、平等、博爱三者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如蔡元培的修身思想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修己为本,修德为要,以中庸、实践、自省为道。

(四) 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所独创的,被视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旨在培养人形成正确的信仰、追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前者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后者是超越于我们经验之外的“实体世界”,即精神世界。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对于现象世界,应“无厌弃而亦无执著”;对于实体世界,应“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人学会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既立足于现象世界,又超越于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达到精神上的解放。

在世界观教育中,蔡元培强调自由原则,这一点在北京大学改革中最能体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大众’之学府也。”蔡元培认为大学是探讨各家学术之地,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大学办学应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不仅各派学术可以在大学里自由地研究和讲授,只要是在某一方面有独特造诣的各类学术人才,均可到大学任教。

（五）美感教育

蔡元培认为,美感介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是沟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桥梁,他第一次提出将美感教育纳入我国教育方针之中。美育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同时也是实现世界观教育的重要途径。美育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帮助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美育,学生能够认识美、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从而为这个世界创造美,促进其对生活、对世界的热爱。蔡元培认为,学校里的所有课程都与美育有关,要将美感教育渗入到各科教学中。1993年以后,我国才提出在高中教育阶段开设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看作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延伸和实践。

二、“五育”并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注重“五育”相互联系,落实素质教育

蔡元培“五育”并举方针重在五者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以人体为喻,把五育分别比作人的筋骨、胃肠、呼吸循环机器、神经系统、心理等,突出五育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素质教育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人诸方面素质为目标,注重培养人健全个性的教育,这与蔡元培所提倡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具有相似之处。我国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的总体要求是通过教育,能够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包含了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还包含了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美好愿望。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建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中虽没有明确指出劳动教育,但他在担任大学学院院长期间,提出了教育劳动化的方针,完善了“五育”并举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回顾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促进素质教育更好地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重新审视道德教育,增强民族意识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生活的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我们正处于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影响的后现代时期。当今中国正处于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西方文化渗入,以及亚文化群体的存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观念正侵入人们的头脑,不断冲击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然而,在年轻一代正需要学校德育的时候,学校道德教育却陷入了目标模糊、主体缺位、内容缺失、方法单一等现实困境,再加上“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等功利性教育目标占据学校指导思想首位,学校德育工作常常被忽视。蔡元培指出,应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将德育渗透在各科教学之中,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促进学生健康道德观念的形成。蔡元培还指出:“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必要对全体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国家和政府应顺应时代潮流,结合当下背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公民道德体系,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以弘扬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三)坚持世界观教育,推动教育国际化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蔡元培第一个提出世界观教育。他的世界观教育属于教育的最终目的,旨在解放人的精神,同时它也涉及人对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和根本看法。蔡元培在提出该教育思想时就说过,我们不仅要追溯中国古代传统,也要吸收印度、欧洲等外国哲学,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要正确认识世界,就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正确处理国际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张力是当今教育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本质上是在教育领域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内在统一,增强受教育者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人群的文化理解,培养具有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公民。当今,我们要坚持和发展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思想,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四)转变艺术教育理念,陶冶学生高尚情操

蔡元培毕生关注美育,积极提倡并亲自实践,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下社会,不少人打着“美育”的口号,大力创办艺术培训机构,但是机构师资质量不高、教材缺乏逻辑、设施设备不足却盲目扩大招生,以发展艺术教育事业为名,牟取暴利。不少家长以考级证书、文凭为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顾孩子兴趣,盲目报班。蔡元培的美育宗旨

是陶冶人的性情以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他认为艺术教育不应是机械的、模仿的,应有个性的内容,主张艺术的创造性。同时他也强调艺术教育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汲取外国优秀艺术成果的同时发展民族文化,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需要为前提,发展他们的艺术性。此外,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提道:“不管哪一类人,我们都应该让其时时刻刻拥有接触美术的机会。”其中蕴含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论

蔡元培开创性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不仅成为民国初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也促进了我国近现代道德教育、智力教育、职业教育、艺术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发展。其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全人格教育理论和自由、包容的办学理念,对我国当代社会落实素质教育、加强道德教育、开展世界观教育、实施艺术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绍兴堕民的日常生活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 谢一彪

【摘要】堕民为宋以来江沪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以浙江绍兴和宁波最为典型。堕民依据明清法律的规定，有特殊的别于平民的日常生活规范，不得逾越。男堕民戴狗头帽，老嫚着横布裙，梳“老嫚头”，乃是“青衣侑酒”之意。主顾乃堕民的衣食父母，供给堕民“嗟来之食”。堕民只能住低屋小房，虽有钱也不能建“高楼华屋”。堕民出行要礼让平民，不得乘坐车马。堕民奴颜婢膝地讨好主人，其声音被贬为“堕民腔”，且用暗语进行内部交流。平民以戏弄堕民为乐，歧视堕民视为天经地义。

【关键词】堕民 服饰 饮食 住处 出行 语言 歧视

堕民与平民生活有何质的区别？良贱不同区别源于何种原因？^①堕民有异于平民的日常生活，男的戴狗头帽，女的着横布裙，梳“老嫚头”。女堕民奔波于平民之家，盛回主顾的残羹剩饭，吃的是“嗟来之食”。住的是低屋小房，“檐低三尺”。不得乘坐车马，只能步行。语言发音有异，其特殊腔调被贬为“堕民腔”，且使用暗语进行交谈。堕民被认为是“天生的贱胎”，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成为套在堕民头上的紧箍咒，压得堕民

① 关于堕民的日常生活，经君健在《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提到依据《别贱录》，堕民有异于平民的衣食住行规范，不得逾越。俞婉君在《绍兴堕民》中，对绍兴堕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堕民腔”作了直观的描述，但并未说明其原因。王静也在《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的田野调查》中，对慈城乃至宁波的堕民衣食住行、语言作了简单的描述，对其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是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

喘不过气来,正是《大明会典》等国家法律,将良贱之间的鸿沟划得泾渭分明。

堕民的服饰

堕民作为贱民,其服饰打扮、居室、出行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逾越,平民也与之划清界限。明清的良贱律,对于堕民的服饰有着严格的规定。贱民不得衣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堕民属于贱民,也适用于良贱律的服饰限制。“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堕民服饰的典型特征为“帽以狗头状,裙布以横布,不长衫”^①。绍兴男堕民戴狗头帽,不穿长衫,严寒的冬天仅身着棉袍,也不穿袜子,称为“赤脚堕民”。诸暨“轿佬”“服色用玄,有喜庆戴短梁红线帽,雨具只穿钉鞋,不准穿靴”。^②绍兴女堕民穿青衣蓝裙、黑色背心,不卷袖,横布做成黑色折裱裙,忌用红线。老嫚自述,做“喜娘”时的标准职业装,“身上头穿件宽荡荡格尼姑衣,外头套件黑背心,旡没衫袖的。下身穿件黑色格折裱裙,脚上穿双圆口布底鞋。”^③堕民服饰的规定,乃是依据《堕民猥编》。《堕民猥编》根据明太祖颁布的《别贱录》有关堕民服饰居业的定制而作。

堕民发型也与四民不同。绍兴男堕民前半头发须剃光,后面一根发辫常盘结于颈间,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头样。“男子率与常人无异,但不过多数的头发,都很长垂在颈上,而且剪得很整齐,额上的头发,都剃得很高,这大概是因为唱戏的都大半如此装束,所以在堕民中便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了。”^④而老嫚发式最为奇特,“妇女蓄长约八寸之大束头发,挽成高髻,插如意簪,此种发型俗称‘老嫚头’”^⑤。该发型在造型时外添一些假发,挽成四五寸的高髻,用黑色丝线包扎后再加铁丝制成的发套套住高髻,最后再插上如意簪加固,也称“朝前髻”。“老嫚头”像一支鳗缠绕在头上,俗语云:“老嫚,老嫚,头上一支鳗,老嫚,老嫚,头上生着一支鳗。”

堕民的特殊服饰,为以前执役的装扮,乃“青衣侑酒”之意,以示歧视。“老嫚及鼓手,值差时,衣裙例为玄黑,恐怕还是青衣的遗意。”^⑥绿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卑贱之色,是为“间色”。春秋时期,“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⑦。绿巾裹头成为地位卑贱的标志。《白



老嫚的“朝前髻”(复制品,周春香制作)

- ① (明)徐渭:《徐文长集》卷之十八《风俗论》,明刻本。
- ② 诸暨日报社编:《诸暨风俗志》,《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10页。
- ③ 赵锐勇:《别了,中国的吉普赛人——来自堕民后裔的报告》,《野草》1988年第1期。
- ④ 阿刘:《浙江的情民生活》,《社会杂志》1931年第6期。
- ⑤ 任桂全主编:《绍兴市志》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0页。
- ⑥ 秦人:《杭甬段沿线的特殊民族》,《京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年第1914期。
- ⑦ (清)翟灏:《通俗编》(下),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页。

蛇传》白素贞身边有一青蛇，化为人形时着青衣，名为“小青”，固为与青蛇相对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地位为婢女。朝廷命官，低微品秩的官员公服也为青衣，故白居易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哀叹。周作人如是说：

她们外出的时候，有一套制服，与家居不同，这便是青衣行酒的青衣，须穿黑色衣裙，外加黑色背心，头上梳着一种特别的“朝前髻”。——这其实也不特别，本来盖是女人常梳的发髻，不过后来改变了，而她们却没有变，一直照旧梳着罢了。这个证据是从女人居丧时头发里得来的。男子的头发从前留起，忽而剃去一半，随后又都剪掉了，所以无可稽考，女人头发却是一直留着，梳成发髻，丧服制度又顶是守旧，即使平常小有改变，这时也一定要照旧式的，女子倘如遇到三年之丧，那时有个时期也要梳成这种朝前髻，不过头上须缠着白色头绳而已。因此可以想见这朝前髻，另外加上青衣，乃是古时执役的女人的服装，这大概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一直是如此。^①

堕民的饮食

堕民吃的是“嗟来之食”。绍兴老嫗操持完婚事之后，可以“吃不了兜着走”。“乡下结婚，不问贫富照例要雇喜娘照料，浙东是由堕民的女人任其事，她们除报酬以外，还有一种权利，便是将新房和客人一部分剩余肴馔拿回家去。她们用一只红漆的水桶将馐馐都倒在里边，每天家里有人来拿去，这叫做拼拢坵羹，名称不很好，但据说重煮一回来吃其味甚佳云。”^② 堕民将婚宴上剩余的糕点、水果、菜肴全部带走。如果盛不下，还可以从新郎家借一只水桶，用后归还就是。平民筹办丧事，参与帮忙的女堕民也大饱口福，也是“吃不了兜着走”。萧山的泥鳅、黄鳝、没鳞的黄颡、呆头呆脑的肉土步，还有乌龟王八等“杂鱼”，被认为是下贱之物，上不得正规酒席，唯有犒蛇讨饭、下九流的堕民才吃。

堕民从事平民所不屑从事的“下役”，收入很低，难以养家糊口。出身三埭街乐户世家的周春香回忆家里十分贫困，每天只能吃三餐“六谷糊”（玉米粉搅动成薄糊），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还算是好日子，有时每天只能一餐度日。周春香来到人世的记忆就是饥饿难忍，吃着“六谷糊”长大。有次母亲吩咐大哥出去买一斤“六谷粉”，准备一家人的午饭。

① 周作人：《堕贫闲话》，《周作人文类编》第6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② 周作人：《暖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从未开口叫过爹娘的小春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六谷糊勿要吃!”父亲周梅生一听喜不自禁,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欣喜地将小春香一把从童车上抱起,亲个不停。“我们有好日子过了,哑子开口龙虎斗,伢阿囡开口第一句话说是‘六谷糊勿要吃’,从此伢份人家‘六谷糊’就勿用再吃哉,会过上好日子,今后伢有饭吃哉。”周春香家住在临街房子,每天都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来来往往地吆喝,邻居家的孩子吵要零食,其父母总是予以满足。口馋的小春香忍不住问父亲要钱买零食,但周家温饱尚成问题,哪有闲钱给孩子买零食。虽说父亲从不拒绝,也会给钱,但他会耐心地予以教导,并与小春香约法三章:“一、要想吃点心时,就去向他要钱,买与不买由小春香自己决定;二、他人在吃点心时,不许站在边上看人家吃;三、人家给小春香点心吃,必须征得父亲同意才能吃,否则,绝对不允许拿来吃。”^①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周春香从小就养成省吃俭用的良好习惯。堕民经常是吃了上顿而没有下顿。

堕民的住处

堕民只能居住低屋小房,门口有其贱民身份的标志,“扁其门曰丐”^②,“以横布区其门户曰乞户”^③。据传为明太祖所规定,以贬低堕民身份。堕民住处,无论是草盖或瓦覆,都比四民低矮,一般“檐低三尺”^④。绍兴民居为台门建筑,但没有精雕细刻的“堕民台门”。浙东最大的堕民聚居区绍兴三埭街,堕民低矮的房屋,成了其贱民身份的象征。“三埭街出来的”,是一句骂人没出息的话。漓渚堕民居于九板桥村,其住屋大

都位于大路的
两旁,均为不足两米高的平房,由毛石墙叠成,没有田地和生产工具。绍兴许多堕民栖居庙堂。上虞



檐低三尺的学士街堕民旧居(陈顺泰供图)

- ① 访问周春香,2016年7月14日。
② (明)徐渭:《徐文长集》卷之十八《风俗论》,明刻本。
③ (清)萧爽:《永宪录》卷二(下)《除籍令》,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页。
④ 任桂全:《绍兴市志》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2页。

道墟墮民也有自成一统的居住区,全是歪斜破烂不堪的竹篱茅舍,干净屋子难得一见,走过墮民巷,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腐败的气味,因为收购来的破烂都堆在屋前院子里,未加整理,时间长了霉烂发臭。嵊州长乐“小姓”“寄居于各村之祠堂”。^① 萧山衙前墮民世代自相聚居,住宅多为低矮破旧的平房,由毛石墙砌成。每家都有一个狭窄的天井,房屋大都临河而建。

墮民分布于城镇和乡村,聚居一处,不与平民杂居。“凡宁绍两属,自城镇迄于乡野,无不有墮民居处者,顾其所居之地,辄自相为群,平民中虽贱至舆抬,勿与比邻。”^② 墮民自相群居,互相帮衬,形成一个个聚居区。为了便于服务四民,墮民聚居区往往建于平民社区附近。三埭街为最大的墮民聚居区,三埭街成了贱民的别称,平民无论如何贫困,也不愿搬入三埭街居住,因为“三埭街出来的”,乃是特指墮民,也是一句骂人的口头禅。“今日的绍兴城区四民与墮民毗邻而居,但墮民的住区则自成一统,没有人肯搬到墮民住的地带去住,也没有人肯让墮民做他的邻居。‘大街’是一处带有被污蔑讥讽、被损害人的地区,近街有桥一座,平民把它称作‘划桥’——划分了汉墮之间界线的桥,因为有这样轻蔑的含意,善良的墮民都把它称作‘新桥’。”^③ 平民纵使穷困潦倒,无家可归,宁愿“倒庙角”,身栖破庙,也不愿入住三埭街,与墮民为伍。民国时期部分墮民经济条件改善,墮民居住“低屋小房”的禁忌被打破。据《上虞县志校续》载:“抑且高楼华屋俨若世家矣。”^④ 墮民作为贱民阶层,属于弱势群体,“高楼华屋”不过是少有的例外。

墮民的出行

良贱出行,明清律法也有专门的规定。“凡官民服饰、冠带、房舍、鞍马,贵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⑤ 墮民作为贱民,不得乘坐车马,只能步行。路遇平民,墮民必须让路。绍兴乃是水乡,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船。如果有墮民同行,即便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平民也不允许墮民入舱。平民平时出门,不是坐轿就是乘坐黄包车。墮民出行却严禁乘坐车马,不得坐轿子,即使财力允许,也禁止坐轿,只能步行出门。墮民外出时,总是低着头,迈着碎步,靠右急速而行。如果双方相向而行,墮民得给平民让路。但绍兴“见老嫚有喜,逢尼姑不

① 长乐镇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乐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② 冯巽占:《畚民墮民九姓渔户考》,《地学杂志》1914年第11期。

③ 郑公盾:《浙东墮民采访记》,《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

④ (清)储家藻修,徐致靖纂:《上虞县志校续》卷四十一《风俗》,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刻本。

⑤ (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卷六十二《礼部二十》,明万历内府刊本。

祥”^①。绍兴四民碰见堕民不认为晦气,反认为是佳兆。因为老嫚早上空手出门,晚上满载而归。

绍兴女堕民出门,必定挽着一只竹编方底圆口带盖的篮子,俗称“老嫚篮”,又称“元宝篮”,也称“簞斗篮”。“簞斗篮,嫚媵送妈妈携者,常人偶用。”^②“老嫚篮”制作相当考究,标准配置为一把刀,由一块又脏又破的布包着,还有几根棉纱线,这是“老嫚”的“生财家伙”。“老嫚”经常前往主顾家,为主顾剃头和修面,用棉纱线为女主人“绞脸”。“老嫚篮”也常常用来存放“太太小姐赏赐的”年糕、粽子或大米。这种特制的竹篮,油过桐油,滴水不漏,便于盛放主顾家赏物以及酒席剩菜以至汤水,故有“老嫚篮——滴水不漏”的歇后语。

堕民在路上与平民碰面相见,不能像四民一样行拱手礼。平民见到堕民,虽是相识,也不为礼。浙地俗语云:“走路朝边走,逢人先低头。”周作人前去上坟时,差点“看见堕贫叫阿叔”。“俗谚又云:人生路不熟,看见堕贫叫阿叔。这种经验确是许多人都有过的。有一次往木栅山送长辈的葬,船抵埠后有好些山路,我同几个本家少年不愿坐山轿,便自走去,走了好久看看情形不对,山窝里又无处问路,好容易才遇到对面来的一个人,正挑着换破布的担子,由同行叔辈中年长的出头去请教,才知道再下去要到破塘了,谢谢他的指点赶紧回转,才及时走到坟



绍兴三埭街学士街陈国兴家保存完好的“老嫚篮”(汪晓华摄)



咸宁桥(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供图)

① (清)金明全:《绍兴风俗志·补遗》,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存杭州图书馆古籍部。

② 范寅:《越谚》卷中《器用》,清光绪八年刻本。

头。”^①周作人上山时迷路，碰到挑“兑糖担”的堕民，询问去路。堕民予以指点，才到达目的地，未酿成“看见堕民叫阿叔”的笑话。堕民乃是贱民，见面不必有礼。

平民不屑与堕民同坐。绍兴堕民“见人不拱手，不同坐”^②。齐贤镇韩弄是个堕民村，住着金姓和陈姓堕民，堕民被禁止与平民一起看戏。“堕民社会地位低下，还表现在他们不能当台看戏，否则就有挨打的危险，如韩弄的堕民被八社公禁：不能越过咸宁桥看戏。”^③该桥俗称“殿桥”，乃是柯桥双渚和迎驾桥一带村民往来的主要通道，见证了堕民被欺辱的历史。绍兴俗语“坐廊下头的”，乃特指堕民不得上桌吃饭，也是绍兴一句歧视性的骂人话。诸暨的“轿老”为四民婚宴服务时，轿老单独一桌吃饭，不准坐堂前，只能坐在廊下。平民歧视堕民，不屑与之伍。

堕民的语言

堕民分布在浙东地区，生活了几百年，融入了地方民众之中，所持均为汉语。范寅在《越谚》中，称堕民“不可教训，不知语言”。^④堕民聚居区三埭街，“最可异的这个特别区面积不大，与四周民居鳞次栉比，并不隔绝，而说话时竟夹杂着一些显著不同的音腔，使人一听就可分别，不晓得当初起始是怎样训练成功的。”^⑤堕民的语言发音与地方方言有明显差异，其特殊腔调，被四民贬称为“堕民腔”“老嫚腔”。“其音无齐口呼，如呼‘手’曰‘休’；呼‘丑’曰‘秋’；呼‘绍’曰‘萧’；呼‘子’曰‘纪’；呼‘少’曰‘笑’。画地而处，不与民往来，故方言亦不同也。”^⑥辛亥革命以后，社会提倡平等，堕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特别是绍兴旧城改造，这批特殊人群的聚居地消失，加速与本地人的融合，也包括语言上的融合，所谓的“堕民腔”已不复存在。

堕民乃下贱之人，向来不得入士、农、工、商之列，故四民称呼堕民，可以直呼其名。平民对堕民不需礼遇，不值得尊称，视为下等人。连平民小孩也直呼“某堕民”“某老嫚”。但堕民对四民不论大小，家境贫富，地位高低，不敢直呼其名，均使用尊称。堕民称呼四民男孩为“官人”“大官”，婚后为“少爷”，娶媳妇后为“老太爷”或“老相公”；称四民女孩为“姑娘”，婚后为“少奶奶”，娶媳妇后为“奶奶”或“太太”，娶孙媳妇后

① 周作人：《堕民的生活》，《周作人文类编》第6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②（清）徐元梅修，朱文翰等纂：《山阴县志》卷十一《风俗》，嘉庆八年修，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排印本。

③ 叶华严口述，曹省之记录：《堕民村——韩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绍兴县齐贤镇汇编本》，2008年版，第360页。

④（清）范寅：《越谚》卷下《论堕贫》，清光绪八年刻本。

⑤ 秦人：《杭甬段沿线的特殊民族》，《京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年第1914期。

⑥ 诸暨日报社编：《诸暨社会现象》，《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3页。

为“老奶奶”或“老太太”。老嫚需要有“好口彩”从事其职业,特别是经常出入大户人家的女堕民口齿伶俐,说话乖巧,带着奴颜婢膝的相,所说阿谀奉承的话,能使人转怒为喜,转悲为欢。老嫚伶牙俐齿,开口就是吉词颂言,且老于世故,逢人美言奉承,俗称“多嘴老嫚”。“堕民相”被喻为装作寒酸或奴性十足;“老嫚嘴”则是花言巧语或多嘴多舌。新昌平民平时互相对骂,动辄以“轿夫儿子”“轿夫婆嘴”羞辱对方。“堕民的梅花,老嫚的莲花。”形容男堕民擅长吹奏唢呐的技艺,老嫚舌吐莲花的口才,说得“死尸会走,白鲞会游”。老嫚的语言天赋,在平民的婚丧嫁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堕民还有特殊的内部通行暗语。上虞堕民暗语称为“七头”。堕民见面后,用“七头”对话,你是“老沙”?对方一点头,双方的话匣子就此打开。平水下道地自然村为堕民聚居区,堕民的十个数字暗语:一为“起”;二为“杜”;三为“所”;四为“差”;五为“判”;六为“流”;七为“清”;八为“棚”;九为“弯张”;十为“叉头”。^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三埭街堕民常用暗语^②

绍兴话	堕民暗语	绍兴话	堕民暗语
人	圆伞	老人	老圆伞
男人	男贵伞	女人	女圆伞、雌头
父亲	八叉	母亲	目莲
儿子	脚骨郎	女儿	家姑
兄弟	连手	小孩	尖圆伞
丈夫	盖天子	妻子	阿挑
不良之人	玫瑰圆伞	为人轻浮	孟良轻
头	木朗	脸	水莲子
手	爬沙	脚	下爬沙
眼睛	秋波	头发	青丝
嘴	臭口、樱桃	胡须	捋把
理发	削青	癞子	西里哈

^①《堕民习俗》,《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绍兴县平水镇汇编本》,2008年版,第165页。

^②2017年3月16日陈顺泰和周春香提供。

绍兴话	堕民暗语	绍兴话	堕民暗语
老人	百年皆	男性	弯笋
女性	加贝	走	鸡毛掸、三十六
奶	乳油	痛	擂鼓三
生病	天下太	长	龙头拐
笑	呵挖	哭	啼鸣
好	香油	差	丕道
偷	马捡	阻止说话	莫声
吃饭	对翻山	酒	阿酱、三酉
菜	阿肴	碗	柯作
筷	打嘴棒	茶	掀浪
水	转折	香烟	品佬
茶叶	蒙山	毛巾	龙须
坐	窝蹲	房屋	顶天
门	双扇	扇子	摇风
雨伞	开花纸	说话	绷弦事
话多	弦事波罗	棉被	关张
衣服	披丝	裤	叉子
帽	顶峰	鞋	踢土
睡觉	拖伢		
小便	摆流	大便	摆大流
多	波罗	少	眯花
钱	刘海	金器	两六四、嚼勿断
米	卡斗、八木	袋	撩绞
鸡	钻笆	鸭	琵琶
鱼	河旗	蟹	横爬

绍兴话	堕民暗语	绍兴话	堕民暗语
虾	弯转	肉	天堂
笋	钻山	四脚动物	四脚佬
菜	画眉笋	蛋	窝叉
蛇	流(游)子	蜡烛	耀红
电灯	呆不愣	刀	快口
赌博	抡把	篮	采和
老嫚	阿宕	鼓手	六卿(刘庆)
结婚	攀花	演戏	敲花佬
和尚	摩罗	道士	斜头
师傅(父)	削光	船	瓢
摇船(划船)	挨瓢	兵	丘八、猪油葱
死亡	锄还	棺材	壳佬
票子	没过当	领养小孩	爬山过
读书写字	识得河南	下雨	爬上爬
一	单边	二	杜二
三	琐事	四	扯四
五	起手	六	极叠呱
七	先字	八	眉毛
九	大弯	十	交字

堕民之所以使用暗语交谈,既是为了让四民听不懂,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也是堕民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特殊方式。堕民外出参加平民婚礼,互相照应,异常团结。有时也探听一些隐私情况。如询问新娘子漂亮不漂亮?则说:“新娘子牛头马如何?”如果是询问嫁妆多不多?则说:“奥割头怎么样?”男的吹拉弹唱的时候,就用一些自编的唱词,通知做“老嫚”的妻子,抓紧时间,收拾些剩菜,让他们先带回家。“鱼

丸冰冰冷,饼子(肉丸)石石硬,扣肉一张皮,萝卜辣喜喜,露汤露水奈咯已,并东伢姆妈斗桶里。”^①意即这家喜酒不太好,鱼丸子没有烧热,肉饼还没有解冻,扣肉太瘦没有油头,萝卜也没有烧熟,将剩菜倒入老慢事先带去的水桶里,带回家去烧烧大杂烩也好。堕民虽是贱民,也是一个正常人,也有七情六欲,碰到难堪的事情,内心异常苦闷,又不便表露出来,以免影响生意,减少收入,迫不得已使用他人不懂的暗语以发泄心里的不满和愤怒。所以,堕民的暗语坏话多,好话少,其原因也在于此。

平民对堕民的歧视

堕民与平民发生纠纷,按良贱律处理。《大明律》有“良贱相殴”条曰:“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人殴伤他人奴婢者,减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杀者,绞。”凡奴婢与平民相殴,无论谁对谁错,奴婢的惩罚远大于平民。“若奴婢自相殴伤杀者,各依凡斗伤杀法。相侵财物者,不用此律。若殴缙麻、小功亲之奴婢,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奴婢罪二等;大功减三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过失杀者,各勿论。”^②奴婢殴打平民,罪加一等,平民殴打奴婢,则罪减一等。《大清律》就良贱关系做了同样的规定。明律和清律关于良贱相殴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堕民,堕民殴打平民,加重一等严惩;平民殴打堕民,减轻一等处罚。贱民互相殴击,则以一般的规定惩罚。堕民若遭到平民欺辱,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忍气吞声。明代的沈德符也提道:“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③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云:“四民诸生皆得役而詈之,撻之不敢较,较则为良贱相殴。”且为之打抱不平:“愚尝为叹息之,谓人生不幸为惰民子弟,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④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成了堕民无法挣脱的枷锁。

堕民被禁入仕途,剥夺了政治权利。明代堕民“籍曰丐户,即有产,不得充粮里正长,亦禁其学”^⑤。堕民不得当官充吏,也严禁入学,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宦之途。即便积镪巨富,也不得纳费为官。明朝万历年间,京师有位名医“甄姓者,绍兴人也,善医痘疹,居京师,余幼时亦曾服其药,后起家殷厚,纳通州吏,再纳京卫经历,将授职矣,忽为同乡掾吏所讦,谓其先本大贫,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辩其非,云大贫者,

① 王步金口述,陈利娟、丁雨金、张运来记录:《堕民与老嫗》,《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汇编本》,2008年版,第169页。

② (明)刘惟谦撰:《大明律》卷二十《刑律三·良贱相殴》,日本景明洪武本。

③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丐户》,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④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⑤ (明)徐渭:《徐文长集》卷之十八《风俗论》,明刻本。

乃宋朝杨延昭部将焦光赞家丁，得罪远徙流传至今，世充贱隶，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乡终合力挤之，迄不敢就选，而行医则如故。”^①清代堕民仍没有应试、捐纳和出仕的资格。

尊卑被认为天经地义，皇帝百官乃人上人，平民百姓则是人下人，而堕民更贱，比乞丐还贱，乃“天生的贱胎”。浙江流传很多平民公然侮辱堕民，而堕民明知遭其侮辱，却无可奈何的故事。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徐渭戏弄堕民。“有人同徐文才赌赛，如他能够往三埭街连呼‘堕贫’三声，当请他吃酒。徐文长便到三埭街的旧货店指着一个瓷瓶叫道：‘那个大瓶卖多少钱？那个大瓶，那个大瓶。’店里的人无可如何，他终于得胜而去了。”^②堕民又称“堕贫”，与“大瓶”谐音。另有一则广为传诵的徐渭戏堕民的《天下太平》故事。“又有乡村演戏，请徐文长写戏台的匾，文曰：‘天下太平。’但是他们的报酬少给了一点，所以等到把匾挂上之后，大家一看，见第三个字缺少了一笔，变成‘天下大平’了。村民大窘，又去求他，他随后走来，把笔掷上去，在大字下点了一下，大家这才安心了。”^③因“堕贫”与“大平”谐音。平民以侮辱堕民取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沾沾自喜。

平民之间还有“戏堕民”习俗，平民聚集一起，以巧妙的言辞暗示对方是堕民或与堕民有特殊关系。歌云：“娘舅头上红毡帽，姑妈身穿绿旗袍，表哥手拿摇鼓冬，堂妹脚走白果桥。”“红毡帽”为堕民做吹鼓手时戴的帽子，“绿旗袍”特指青蛙，“钓青蛙”是堕民从事的特殊职业，“摇鼓冬”为堕民鸡毛换糖的器具，“白果桥”特指堕民聚居地，均用来象征堕民。范寅在《越谚》中云：“其境堪怜，其情堪悯，而其行实可贱焉。此不心辄而自为辄，即俗化而无由化者。非天地之有意区别，非圣王之无心拔擢，实以乃祖宗贪逸欲而逃勤苦，丧廉耻而习谄谀，甘居人下，而安之若素。如其积习不振，贸然拔伍凡民，是率天下弃农桑而召冻馁也，是使卑逾尊，贱妨贵，少陵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也。”^④原本是奴隶主将奴化思想强加于奴隶，造成了奴隶，反污蔑奴隶自甘贫贱无耻和懒惰。创作小说《堕民》的作家莫莠在钱塘江南岸堕民村附近召集平民，以“我们过去为什么要歧视堕民”为题举行座谈会，平民包括贫民，直言不讳地直言对堕民的歧视。

凡是发生地方治安案件，堕民往往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丐户》，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② 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文类编》第6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

③ 林兰：《徐文长故事》，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84页。

④（清）范寅：《越谚》卷下《论堕贫》，光绪八年刻本。

无端怀疑。“凡发生盗窃、抢劫案件，皂役、地保、警察、保甲长均无须履行当局所颁布之法令，可至堕民聚居区任意查抄或抓捕，堕民人身、财产较一般平民更无保障。”^①只要有刑事案件，堕民成为首选怀疑对象。封建社会的衙役和民国时期的警察，无须履行当局颁布的法令以及法律手续，即可到堕民家中随意查抄和逮捕，其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绍剧演员大都是堕民，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堕民聚居在划定的区域，和普通的老百姓轸域分明。富贵人家发生窃案，警察常到堕民聚居区侦查。堕民就在这样的屈辱地位中求生存。”^②家住三埭街的“六龄童”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在解放前，凡绍兴有什么失窃，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可以在三埭中任何一家住户翻箱倒柜，不需要其他法律手续。”^③堕民地位极端低下，饱尝被歧视的辛酸。堕民被欺辱，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① 任桂全主编：《绍兴市志》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2页。

② 柯灵：《小浪花》，《西湖》1979年第1期。

③ 沈祖安：《绍剧概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大运河”曾让“越酒行天下”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 谢 寰

【摘要】浙东运河，始凿于春秋越王句践时期，深刻影响了京杭运河的形成，成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变内河为“港通天下”的出海通道。越酒，虽说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但直到明代遂步入繁盛期。酒是流体，不得不依赖内（运）河和外海的航运，然后换小船或车马运输到城镇。明清时期，大河上下，秦岭南北，越酒早已遍布城邑。京畿之地，繁华市井，多为黄酒；只有高原地带少数民族集居处，饮用土白酒。是“大运河”与航运业的开启，让绍兴老酒畅行天下。

【关键词】浙东运河 大运河 越酒 绍兴酒 航运

一、明清“越酒行天下”

越酒，虽说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但直到明代遂步入繁盛时期。其时，明末名臣王思任有《老酒豆酒赋》云：

老似民，豆似官。民乃门类之通用，官则席上之偏安。豆之佳者入圣，老之妙者犹仙。圣但知水之有力，仙则吞火而无烟。豆有花露之白，竹叶之青，翻翠涛于秘色；老有雪乳之香，凝霞之泊，泻红玉于春湍。重

曰：守吾乡高曾之规矩兮，听他处名号之多般。米欲精兮泉欲冽，老不酸兮豆不甜。

此赋不长，却道出了两种越酒：一为老酒；一为豆酒。老酒即黄酒，众所周知，无须赘言。豆酒即白酒，如今知者已不多，有必要稍做介绍。豆酒者，系绿豆酿造而成，俗称“绿豆烧”。豆酒清醇甘冽，与老酒均为佳酿。用此酒浸杨梅，红似胭脂；浸青梅，色如碧玉。唯不能泡人参，否则会丧失滋补功能。

据记载，旧时，籛箎师傅爱喝此酒。端午日，店（铺）老板请他们喝端午酒，在豆酒中投入雄黄，名谓“雄黄酒”。喝醉后，顿觉五内如焚，于是跑到府山（卧龙山）上，寻一块阴凉之地，脱光衣裳，睡在地上。此举常吸引男女老少前去观看，谓之看“蜒蚰螺”。籛箎师傅醒来，精气两旺，打起籛箎来更有节奏。

明代，另一位乡贤徐文长（徐渭），好杯中之物，尤嗜豆酒。他有个姓史的外甥，门槛很精，徐文长刚为他作了《百花卷》，转身又要其舅父再画一幅大花卉，他怕舅舅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特地携了八升豆酒去。素性慵懒的徐文长一闻豆酒的扑鼻醇香，精神为之振作，一反平时故态，命外甥取来数只小杯，一一斟满，几杯下肚，顿觉指间浩气如雷。于是，他一手执如椽之笔泼洒擘画，一手握杯吞饮，连浮三十小白，画也作成。徐文长兴犹未尽，又作七言古诗一首：

陈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亚。史生亲挈八升来，如椽大卷令吾画。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春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翔鼓催。翔鼓催，笔兔瘦，蟹螯百双，羊肉一肘，陈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进厥口，为侬更作狮子吼。

万历壬辰冬，青藤道士徐渭画于樵风径上

可见，豆酒之名益彰。另，徐文长在《菘台醋》一诗中说“吾乡豆酝（酒）逐家堆”，又说出了豆酒在绍兴之普遍，产量之多。据业内老人说，豆酒在20世纪50年代初尚有，后因绿豆来源稀少，只好辍产。

再说黄酒。明代中叶始，曾因“一斗糯米酿得的黄酒，可买三斗糯米”。酿酒高昂的利润，使从业者趋之若鹜。难怪徐渭著文疾呼：“盖自酿之利一昂，而秣者几十之四，粳者仅十之六，酿日高而炊日阻，农者且病而莫之制也！”（《徐文长三集·物产论》）由于利益所驱，农民连自

己的口粮都留不够，升斗小民更是饥肠辘辘。然而，绍兴酿酒仍是优质高产。正如晚明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在《初至绍兴》一诗中赞曰：“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可见那时的绍兴酿酒已很普遍。

当然，越酒不仅仅绍兴人自己喝，还远销外地。“山行而水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城绍兴，旧时，舟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早在越王句践时期，就能打造战船，攻打吴国。到了明代，绍兴早已能造大船，酒是流体，不得不依赖内（运）河和外海的航运，然后换小船或车马运输到城镇。大河上下，秦岭南北，早有越酒的经销点。只是高原地带少数民族集居处，为白酒；京畿之地，繁华市井，多为黄酒。据绍兴城内沈永和酒坊后裔沈大本说，在明代崇祯年间，他家酿制的黄酒，曾远销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等地。

入清，绍兴酒的外销一度受阻。朝廷严令禁止海上航运。平定海疆之后，朝野一片欢腾，尤其是沿海一带的商贾与渔民最为高兴，他们长期休航、休捕，生计无着，濒临绝境。

绍兴的酒商，其困顿情况虽说还不到他们的地步，但急切盼望解除海禁，恢复近海省际航运的心情，则和他们一样。康熙年间，朝廷颁布《弛海禁令》，于云台（今江苏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令浙江沿海地方照山东等处例，许百姓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但行前必须向地方官禀报，登记姓名，发给印票，船头烙号。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戍军”。尽管此令只是有限的松弛，但对百姓来说已是皇恩浩荡了。比如对绍兴酒商来说，船只的吨位小，固然经不起海浪的牵扯，运载的成本也比大船高，但可以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受益匪浅。况且，中国的海岸线不算短，近海北可达京津，南可抵闽广，这就为“越酒行天下”奠定了基础。如康熙二十年《会稽县志》记载：“越酒行天下，其品颇多，而名老酒者特行。”又如《嘉庆山阴县志》卷八引《会稽志》云：“越酒行天下。”

明末清初，随着“大运河”航运业的发达，绍酒的行销很快遍于全国，走向外域，真可谓山阴会稽酒商遍布京广，绍兴老酒畅行天下。

二、“大运河”让越酒源源流向域外

绍兴酒的鼎盛时期在清代。清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中说：“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新疆绝域。”到乾隆、嘉庆时，绍酒西至甘陇（甘肃）、新疆，东及台湾。

清代诗人袁枚更在《随园食单》中写道：“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越厚。”袁枚又说：“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故一些大酿坊常以“陈年老酒”或“远年陈绍”来标榜所酿之酒的品位，也是绍兴酒“行天下”的原因之一。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品饮绍兴酒，留下“越酒行天下，东浦酒最佳（良）”的诗句。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口通商时，绍兴阮社章东明酒坊年酿6000—7000缸，通过运河航运，销往新加坡；湖塘的田润德酒坊30公斤装加饭酒运销俄国；东浦的云集酒坊之酒运销东南亚。据记载，1894年前台湾是绍酒的最大市场，阮社诸楚和等酿坊年销台湾之酒占产量的30%。

民国十八年（1929），程叔度的《烟酒税史》（上海大东书局编印出版）载：“浙东西九区七十县，以五区（绍兴）所产（酒）为最多，出运占五分之四，行销遍各省，间有出洋者。”

绍兴酒除了航运销往域外，还通过办行栈、酒店，占领京津沪等大城市。五口通商后，绍兴黄酒最大的销售地是上海。最早在上海开设绍兴酒店的是东浦林头村王宝和酿坊，时间为乾隆九年（1744），地点在上海大东门外的里咸瓜街，当时资金为一万银圆，仓房常贮三年以上陈酒数千坛，自产自销，批零兼营。这里的“咸瓜”指咸黄鱼，绍兴人称其为黄瓜头鲞或瓜鲞。福建渔民亦称黄鱼为“黄瓜”，其账上也是这样写的。黄鱼受汛期影响，必须抓住时节捕捞，但鲜黄鱼一时销售不了，绝大部分用盐腌成咸黄鱼（绍兴人称“单鲍”）。

上海大东门外的十六铺，有福建船商的停靠码头。乾隆二十二年（1757），泉州人和漳州人在两条咸瓜街之间成立了泉漳会馆，咸黄鱼就在会馆附近进行交易。因咸瓜街地处城郭，又紧傍黄浦江，这样的有利条件，吸引了江浙两省的渔民前来加盟，市场日益红火。

一时间,船商、货主、掮客、购买者、搬卸工……交织成和谐的变奏曲。而绍兴的王宝裕酒店就开在这条街上,每天这里觥筹交错,座无虚席,这可忙坏了翻锅掌勺的厨师,跑累了打酒端盘的酒保,笑煞了独具慧眼的酒店老板。

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阮社章东明酒坊在上海小东门开设酒行,其后又在上海、天津开设数家酒行,多以批发为主。

光绪初年,湖塘、东浦等地绍酒客商在更大范围内设行栈。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浦云集信记(“会稽山”前身)在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设分售所。当时京津一带酒店菜馆饭铺多寄售以云集酿坊为主的绍兴酒。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云:“京师酒肆有三种,酒品亦最繁。一种为南酒店,所售者女贞、花雕、绍兴及竹叶青……”又云:“越酿著称于通国,出绍兴,脍炙人口久矣。故称之者不曰绍兴酒,而曰‘绍兴’。”

清末民初,湖塘叶万源酒坊产品畅销闽、广及东南亚。在绍酒业的大同行中,柯桥江头的高长兴酒坊与众不同。民国二年(1913),高长兴酒坊在上海福州路407号、南京秦淮河畔、杭州延龄路与仁和路口,各开了一家酒菜馆,各店均有烹饪高手掌勺,供应的酒均是远年黄酒,以酒、菜名噪当时,评为出类拔萃的高级酒家。总之,当时绍兴人开的酒栈、分售所、酒店分布南北各大城市,正所谓“流行遍域中”了。

三、产销结合的上海“绍酒大同行”

上海是绍兴酒销售的中心地区。据单文吉先生撰文,抗战前,绍酒最高年产量达7万吨,但抗战后只剩下2.5万吨,为过去鼎盛时期的36%左右,其中四分之一在上海销售,平均售价每五百克为八分银圆,上海绍酒业年营业额约一百万银圆。在清代,“王宝和”“章东明”领先,随后高长兴等相继开业于上海。至1948年,上海绍兴酒同业公会有会员249家,其中22家在绍兴本地设有酿坊,自产自销,批零兼营,这些被称为“绍酒大同行”。下面介绍几家上海的“绍酒大同行”。

阮社:章东明酿坊

前面说到,早在清乾隆年间,绍兴的大酿坊就在上海开设字号,如东浦林头(原属东浦、齐贤,现属灵芝)王宝和酿坊于乾隆九年(1744)

在上海大东门设店开张。阮社的章东明酒坊,在其子章兆良、章利川时,产量年年增加,但销售上仅依靠当地酒店和外省采购客商,已远远不能与生产状况相适应。有鉴于此,章利川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上海小东门开设了一家酒行,其后又在闸北增开了一家,分别称为“南号”和“北号”,作为运销本坊产品的机构。由于章利川本人仍然集中精力在绍兴经营酿坊,所以上海的南北两家酒行,都是聘用亲信可靠的经理负责。

之后,章东明的各房子孙亦去上海开设酒行,例如咸丰末同治初,章利川次子正卿开设“章东明正号”,长子荣堂之子章心甸开设“章东明信号”;同治九年(1870),荣堂之次子章浚申开设“章东明浚记”,心甸长子介轩开设“章东明介记”、次子芳轩开设“章东明芳记”。民国初年,浚申还在杭州官巷口开设“章东明浚记”。上海酒行除聘任经理外,还要请一名会计主管财务,由业主直接领导,对酒行财务有监督权。每年春节,业主亲赴各店盘账,清查财务和盘点存货,然后汇总成册,称为盘簿,由经理送回绍兴呈阅。各店经理还要汇报成绩,进行交流,并设宴庆功,经营好的得到鼓励,差的受到推动促进。

章东明所设的酒行,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这一营业方针在上海绍酒行业中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其他酒行多以门庄为主。抗战前,章东明酒坊的产品,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南至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行销范围很广。至于零售,虽系少量,经营也十分认真。酒行备有自行车,顾客可用电话要酒,随接随送。对大饭店、大酒楼或喜庆宴会,还可派人去免费烫酒。老顾客可以记账赊销,每年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收账。

除了开设酒行外,酒坊还聘用“水客”(贩运货物的行商),专跑各省推销产品。这些水客,除了发给固定工资(每月四五十银圆)外,还可按营业额收取2%—3%的佣金。酒坊还赋予水客一定权力,如在规定价格内签订合同,同意赊销或到货付款等,但必须负责把账款收回。水客的责任较重,须有“人脉”,交际广阔,能吸引客户,一年内只要出去二三次即可,其余时间可在家休息。有的水客还兼任酒行经理,是很受酒坊主器重的。但有很严格的一条纪律,即不允许推销别家产品,如有发现,立即解职、解雇。

绍兴老酒过去只在江浙沪营销,为了扩大销售渠道,打进北方酒业

市场，“章东明”想到了北方市场。清代津浦铁路修通以前，运销北方的绍酒，无论是通过大运河“漕运”还是“海运”，天津是重要口岸。章东明酒坊与天津的交易，过去一直是通过来采购的客商或推销的“水客”之手销往天津的。章利川在开设了上海南、北二号之后，决心在天津开设酒庄。由于天津的地位在各地分支机构之上，它不用章东明牌号，而取名“全城明记”酒庄（“全城”是章氏祖先之名），专做北方的批发业务，不兼零售。客户遍布北方，旺时年销京庄一万坛以上。如以五银圆一坛计，营业额达五万银圆。在全城明记的业务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与北京同仁堂药铺的关系。

由于章东明酒坊注重产品质量，所以商誉向来是有口皆碑的。自从它的产品通过采办客商行销京、津地后，即为北京同仁堂药铺所采用。全城明记开设后，同仁堂专门向章东明酒坊订购制药用酒，不再采用别家产品。而章东明酒坊自与同仁堂建立直接供货关系后，特为同仁堂酿制了一种称为“石八六桶”的专用酒，并保证这种专用酒要陈放三年以上才出厂供应同仁堂。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章东明酒坊很受影响，加之运输风险太大，北方运销业务受到挫折，对同仁堂的供应也随之不正常。其后东北沦陷，章东明对华北地区视为畏途，业务进一步收缩，天津全城明记虽仍存在，但已陷于停业状态，章东明酒坊与同仁堂的合约无形中也就废止了。

柯桥：高长兴酿坊

在绍酒业的大同行中，柯桥江头的高长兴与众不同。民国二年（1913），高长兴在上海福州路407号、南京秦淮河畔、杭州延龄路与仁和路口，各开了一家酒菜馆，各店均有烹饪高手掌勺，供应的酒均是远年黄酒。杭州的高长兴酒家，1951年更名为杭州酒家，成为杭州首家国营菜馆。

南京的高长兴菜馆，以做浙绍菜为主，是南京饮食行业中四大帮口之一。老一辈的人提起高长兴酒馆，就会想到腐乳肉、烧圈子（大肠）、炒鳊糊、砂锅鱼头。20世纪50年代，由于调整网点，并入了老正兴菜馆。1993年，新大楼落成，又研设了绍式虾球、绍式醋鱼、稀卤蹄筋、蛋清鱼条，合称为老正兴八大名菜，加上从绍兴运来的正宗陈酿，顾客天天立席等座。

上海的高长兴酒店,生意也久盛不衰。1938年,在西藏路11弄10号衍设了高长兴焕记酒馆。1944年,又在复兴中路33号开设了高长兴炎记酒馆。江头的酒坊嫌小,另在胜利大桥以东,府山西路以西,开了一个酒作坊。

这里介绍一张清康熙年间绍兴高长兴浩记酒厂坊单(见图)。商标名为“加官晋爵”。现把坊单中文字抄录如下:

本厂世业造酒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贰百余年。悉心研究,探源鉴水,运米丹阳,不惜工本,秘制上等佳酿,能久藏,年远不变。“劝业会”得奖金牌,以绍酒著名。久蒙各界诸君奖誉,名驰四远。自印花、公卖税骤增,本厂精益求精,足复加足,添造酒夹酒,并新法明秘制醇醪醇酒,更为脍炙人口。别号所无,迩来人心不古,鱼目混珠。本厂特印“加官晋爵”内单,赐顾诸君务请细认真伪,庶不致误。

浙绍高长兴浩记酒厂浩卿主人率孙增圭谨启

这张不足二百字的坊单,将酿坊的历史、获奖情况、所用原材料、酿酒技术等内容,通过寥寥数语,广而告之。

城区:言茂源酿坊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这是鲁



绍兴高长兴浩记酒厂坊单

迅小说《风波》中的“茂源酒店”及店主,现实中确有这么一家酒店,因为主人姓言,又叫“言茂源”。然而,绍兴史志少有记载,倒是外埠的上海有一些,如《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五章酒商业篇云:清乾隆年间,有绍兴人从本乡水运黄酒来上海并开店销售,在东门外沿江一带和商贸稠密地区都设有酒栈酒店,名声最大的绍酒店是王恒豫和王宝和。……除了王恒豫、王宝和外,旧上海较有名声的酒店有王裕和、永济美、同宝春、言茂源、马上侯、丰豫泰、章豫泰、章东明、章月明、全兴康等酒店,大都以经营绍酒(黄酒)为主,既营批发,又营零售和堂饮。



1922年上海四马路言茂源酒店



旧时上海南京路上的王宝和酒店

笔者亦在唐鲁孙《老乡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上海的柜台酒》一文中,读到如下文字:

上海四马路“高长兴”“言茂源”都是卖柜台酒的老字号,柜台高耸,擦得锃光瓦亮,不见半点油星儿,上面照例是大盘冻肴蹄、一盆发芽豆,还有油爆虾、熏青鱼、八宝酱、炒百叶几样小菜。

……像“高长兴”“言茂源”这样整天川流不息、酒客进进出出的大酒店,烫好的串筒酒,往您面前一放,锡筒没有不是东凹一块,西瘪一块的,据酒店人说:“起初是客人们喝醉了逞酒疯,摔得像瘪嘴老婆婆似

的,后来你摔我也摔,不摔就显不出您是老酒客啦!”

“高长兴”的竹叶青浆凝玉液,韵特清远;“言茂源”的陈年太雕酒色若金,琼卮香泛。……“言茂源”楼上辟有雅座,言茂源每天卖不完的团脐(母蟹),立刻用酒醉起来,由老板的如夫人亲自动手,加酒加盐放花椒的分量都有诀窍……

“言茂源”论座位,没有“高长兴”舒服,论酒的品质,也没有“高长兴”来得醇厚,可是到了螃蟹上市,“高长兴”的生意就赶不上“言茂源”了。

当年上海电影界名导演但杜宇、殷明珠,都是喝老酒的高段数人物,他们夫妇是“言茂源”的老主顾;老报人何海鸣、叶楚伦都吃过“言茂源”的醉蟹,据说风味绝佳,就是要碰巧了,才能吃得到嘴。

胜利还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秋高蟹肥的时候,走过四马路,想起了“言茂源”“高长兴”,找来找去,已无遗址可寻。经一位摆摊的长者相告,“高长兴”原址的楼面拆掉,重盖新厦后开了一家立群书店,“言茂源”将门面缩成一小间,虽然仍然卖酒,只应门市外送,已经不卖柜台酒。

作者把旧上海四马路上“言茂源”、高长兴等酒店的兴衰,作了详尽的记述和描写。

四、日军把持“大运河”对绍酒的影响

清朝,绍兴酒为何既繁荣京城,又远销云南边陲?已故中国著名酿酒专家、酒界学者辛海庭曾说,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继承了明朝的制度,除了“入贡”,御膳房就产黄酒,请来绍兴的做酒师傅,用玉泉山的水来做黄酒。御膳房还有一系列的制度,比如每年皇帝几坛酒、皇后几坛酒、嫔妃几坛酒……都有明确的规定。

辛海庭还说,清代是黄酒的天下,黄酒在“幕府阶层”(如有十衙九绍之称的“绍兴师爷”)很吃得开。又如“知识阶层”,《红楼梦》中谈到绍兴酒、惠泉酒都是黄酒,惠泉酒口感比较淡薄,而绍兴酒醇厚。

另一个因素,还与上海的绍酒大同行通过“大运河”,南上北下,开辟新航线销售有关。如上面的王宝和、章东明、高长兴等。东浦乡贤周清,1898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就兼做绍兴酒的推销员,将绍酒船载沿京杭大运河至北京定点销售。短短几年,分售遍及上海、广州、天津

等。在北京就有延寿街的“京兆荣酒局”、巾帽胡同的“玉盛酒栈”、煤市街的“复生酒栈”和杨梅竹斜街的“源利酒栈”，以及杏花春、斌升楼等各大酒菜馆。云集酒因周清南北贯穿的推销而风靡全国。

1915年，美国国会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加州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东浦云集信记酒坊的“周清酒”、绍兴咸亨酱园的“咸亨”腐乳等代表绍兴酒、绍兴酱制品赴会参展，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绍兴酒名声大振，被誉为“东方名酒”之冠，远销世界各国。

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对绍兴酒等民族工业造成严重的创伤。如电视剧《花红花火》塑造的“善元泰”酿坊，在绍兴确有其事。据善元泰的传承人朱清尧介绍，日军扫荡时，善元泰酒坊珍藏多年的黄酒被洗劫一空，店里的工人也逃走，当时元气大伤。再加上连年战祸，农业歉收，民不聊生，酒坊纷纷倒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善元泰酒坊终因无力经营而歇业。

另据百年老字号沈永和酒厂厂长傅保卫介绍，1938年冬，沈永和酒坊装了八九千坛绍兴酒的两支船队，一支在金华婺江遭日机轰炸，船翻坛沉；一支在绍兴龙尾山被劫，清洗一空。损失更为惨重的是1939年6月15日上午，日军飞机空袭绍兴，沈永和酒库被炸为一片废墟。从此沈永和一蹶不振，除城区两家南北酒店惨淡经营维持生计外，酒坊已无力恢复生产。

辛海庭先生曾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京杭大运河为日本人所把持。那时候的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没有现在这个水平，全靠水路水运。大运河一封锁就封锁到1945年日军投降，这使绍兴黄酒丧失了向北继续延伸的机会，对绍兴黄酒“北上”销售产生了“断崖式”的影响。

加之当时农业歉收，民不聊生，百业皆废，绍兴的酒坊也因此元气大伤。京津等北方城市慢慢成了白酒的天下，京津百姓饮用绍兴酒也成了一种奢望。至今绍兴黄酒消费市场“南热”“北冷”的现象，就是抗战时期落下的“病根”之一。

可见，绍兴酒“兴也大运河”，“衰也大运河”。“大运河”的兴衰史，亦是绍兴酒等传统产业的兴衰史。

白洋：一部人与海的发展史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王悦希

如今，提起安昌镇的白洋村，大家往往会想到“白洋十台门”。白洋是名士之乡，前后出过大明万历内阁首辅朱赉、明末名臣朱燮元、清贫师爷许思涓等十六位名人。但还有多少人记得白洋曾经拥有历史悠久、形式丰富的水文化呢？事实上，正是白洋独特的水文化元素，滋养了一代代白洋儿女，成就了独特的“绍兴精神”。

一、海港关卡自春秋始

在绍兴西北五十里的白洋村，古代为后海口岸，名曰“白洋港”。《越中揽胜》载：“大和山下之白洋港在春秋战国时，为我国五大出海港口之一。”可见，白洋港在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时期，绍兴便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第一大都会的美称。《绍兴市志》记载：“东汉时期，绍兴就以丝绸、越瓷为媒介，与中国的邻国互有民间往来和经济联系，越布已传至日本，越瓷已从海路运销马来半岛及西婆罗洲。”而到了隋代，“杨广为接轨大都市会稽，下令开凿大运河，越州白洋港濒海，亦称大和山，为浙东著名的海上交通和口岸贸

易大港。”而后，白洋港不断发展，成就了“会稽天下本无俦”的佳话。“唐大中八年(854)，越州的海外贸易已遍及日本、朝鲜、印度及南洋各地，远及中东和非洲东部。”唐代大诗人杜牧亦有诗赞道：“越州西界澗河，东奄左海，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绍兴作为沿海大都会，白洋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窗口，一直活跃在历史上。据《王忠文公集》载：“元至正四年(1344)，山阴白洋港仍有大船靠岸。”可见，直至元末，白洋港仍有巨船泊岸，充分证明其海外贸易之繁华。直到明中叶，白洋港才因海岸线北移而湮没。

白洋繁荣的海港文化奠定了绍兴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白洋文化，作为绍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绍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可能，同时也激励着一代代绍兴人自强不息、拼搏奋斗。近代以来，就有以周恩来、鲁迅、蔡元培、陶成章、秋瑾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探求富民强国之路，远涉重洋，赴欧美、东洋、南亚等地留学或考察，播下了与各国民间交往的种子。

二、海防重地筑巡检司

《白洋村志》记载：“唐代始设烽墩。明初置司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在大和山南麓缘山建城，设置白洋巡检司，是为拒倭要塞，驻弓兵三十二名御倭寇。

清雍正《浙江通志》载：“三江所，洪武二年(1389)建，……巡司二：曰三江巡司……曰白洋巡司，弓兵三十二名，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白洋山上(麓)，滨海缘山筑城。”《乾隆府志》又载：“白洋巡检司城，在西北五十里，大海之滨，山阴境内有白洋之山，缘山而城之，方一百一十丈，高一丈一尺，厚一丈。城门一、雉楼一、窝铺四、女墙一百七十六。”可见当时的白洋巡检司军势颇盛。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安昌大和山在钱塘江出海口南岸，扼山海之要，历拒倭寇进犯，有城，明初置巡检司，称白洋镇。”由此可知，安昌白洋的巡检司城，非邑域之城，而是防御性的城堡。

据《白洋村志》记载，明代倭寇多次袭扰绍兴，从白洋登陆，可直达腹地。而白洋巡检司城隐蔽在大和山的东南麓，于此设伏击敌，能给予其当头一棒。因此，白洋巡检司城在明清时期对浙东地区海防事业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白洋巡检司城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废,《嘉庆山阴县志》记载:“柯桥巡检署在柯桥西官塘,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详请以白洋司巡检移驻。”自此,历时数百年的白洋巡检司被废弃,而迁至柯桥西官塘的白洋巡检司如今亦无踪迹。

毋庸置疑的是,白洋海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绍兴文化注入了团结协作与忠诚爱国的精神品质。近代以来,绍兴便有以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为代表的烈士为光复中华,挥洒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三、观潮胜地誉白洋名

白洋北临钱塘江海域,南屏会稽山。陈桥驿先生在《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一书中论述:“会稽山以北原先是碧波万顷的海洋,后因地壳下沉,成为钱塘江、曹娥江所挟带泥沙沉积之场所,若干万年后,成为浅海沼泽地。距今约4000年前海水逐渐离开了南部丘陵、会稽山麓,向北退去,但地势低洼……屡受潮水的倒灌……”白洋儿女因地制宜,运用白洋港零星分散堤段,历经艰险,沿山修筑石塘,抵御海潮侵袭。

明王祹《绍兴谿狱记》载,元至正四年(1344)有大船靠岸,明末还可以在此地观潮。当时白洋是观钱塘江潮的佳处,王祹所谓的“潮”即名曰“白洋潮”。

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作为白洋朱氏外甥,有缘常来白洋走亲。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他来白洋吊朱燮元少师时,亲临海塘观白洋潮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白洋潮》,其文状摹白洋海口气势磅礴的汹涌大潮,道:“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展翼惊飞。渐近喷沫,冰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著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炮碎龙湫,半空雪舞。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白洋潮让人们感到自然的力与美的同时,也为他们的人身安全带来了隐患。因此,白洋人运用智慧修塘建闸,抵御自然灾害。在与自然

斗争的过程中既锤炼了白洋人坚韧的品格,又塑造了白洋人顽强的精神,并逐渐转化为绍兴精神的组成部分。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洋丰厚的水文化锤炼了白洋人坚韧勇敢、忠诚爱国的品质,也在无形中成就了“白洋十台门”以及“绍兴多名士”之类的佳话。事实上,研究水文化绝非仅仅研究其历史源流、发展状况以及价值功能等,更多的是通过这些,发掘蕴含在绍兴人骨子里的“绍兴精神”。研究“白洋”这一部人与海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绍兴精神的形成与绍兴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也正是这样独特而又富有魅力的绍兴文化,丰富了“绍兴精神”的内核。

此“己巳”非清同治八年(1869),而是民国十八年(1929)

绍兴文理学院 叶村人

中华书局1999年版《绍兴县志》第三十七编《文物胜迹》“兰亭文人即兴碑”条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三，绍兴袁天庚，上海孙玉声，吴兴姚洪淦，武进邓春澍、青(郁之误)餐霞，桂林陈福荫，杭城徐行恭等十九人在兰亭觞咏，追怀往事，即兴作诗五首，后刻石嵌于壁间，故名。”邹志方编《历代诗人咏兰亭》^①也沿其说。其实，此“己巳”非清同治八年(1869)，而是民国十八年(1929)。查析上述诸名士的生平经历即可明白。

袁天庚，字梦白，因耳聋故号无耳尊者，晚号白衲，室名八百里湖荷花词馆，绍兴县陡门杨望村人。旧宅位于绍兴市长桥直街。生卒年不详。民国时著名词人、书画家、文化鉴赏家。清光绪甲午(1894)出关，为程雪楼督抚黑龙江幕宾，聘为军事顾问。后寓居上海，加入南社。在南社中颇有画名，尤工花卉，书画多为题画。后在倪嗣冲幕府任职多年。著有《儻肤》四卷，《痴寮萝吃》二卷，《八百里荷花渔唱词》四卷、诗二卷。其《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七律诗云：

典午而运世几迁？右军一序独巍然。

偶来小集传觞咏，别有清谈胜篁弦。

白衲最宜三月节，青山犹认六朝天。

中原戎马何时已？怅对斜阳问昔贤。

另，其词集中有《沁园春·谒岳鄂王墓感时事不觉涕零》词云：

^① 邹志方编：《历代诗人咏兰亭》，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大宋江山，大将旌旗，岿然崇封。溯君王南渡，何来白雁，兵戎北指，未抵黄龙。铁像无心，金牌有恨，浩浩荡荡神鸦晚风。斜阳赤，千秋苍土，一片精忠。年来军事难穷，倒对干戈作内攻。痛誓师杀贼，谁为仇敌，残民辱国，辄号英雄。天地忌才，贤豪丧志，覆辙相寻例或同。栖霞路，有填胸热泪，洒向幽宫。

面对日本侵略者大肆吞食中华国土，残杀国民，国民党当局却破坏同仇敌忾的大好形势，掉转枪口打内战，这与南宋初年宋高宗及权相秦桧投降卖国，残害忠良，又有什么不同呢？袁天庚借古伤今，表达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倒对干戈作内攻”“覆辙相寻例或同”政策的忧虑，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心。此词写作时间当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可见袁天庚不可能参与同治八年(1869)的兰亭修禊活动。此其一。

其二，徐元钊(1861—1926)，字吉荪，号遏园，晚号周园，会稽人，近代图书馆事业家、藏书家徐树兰之子。光绪十四年(1888)副贡，司铎台州、太平，推升河南知县。工诗词古文，作画其余事，花卉古拙可爱，著有《遏园诗草》。其有《奉和无耳尊者十月三十日放舟兰渚遇雨醉归原韵》诗云：

镜水稽山里，峰尘误少年。
不堪修禊客，迟入小春天。
丝竹联吟侣，烟波荡画船。
从今兰上里，风雨尚凄然。

此诗写于哪年不详，但徐元钊卒于民国十五年，可见袁天庚民国十五年前曾与徐元钊参与过兰亭修禊活动。既然称“吟侣”，年龄不会相差很大，其生年可能在咸丰末年或同治初年。

其三，参与“己巳”兰亭修禊的孙玉声(1864—1940)，名家振，别署海上漱石生、警梦痴仙，上海人。清末民初小说家，知名报人。出身官宦家庭，文学修养高，酷爱戏曲，迷恋京戏，经常出入上海于三雅、南丹桂、金桂等茶园听戏。光绪十九年(1893)聘为《新闻报》编辑部主笔，二十四年自办《采风报》，三十一年担任《申报》本埠新闻编辑，前后从事报业达19年之久，成为“上海通”。代表作有《海上繁华梦》《三十年来上海剧界见闻录》《上海百名伶史》《上海戏院变迁志》等。其《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七律诗云：

兰亭修禊群贤集，风日清和是暮春。

曲水畅观觞咏乐，崇山游尽古今人。

悟言契合情犹昔，俯仰兴怀迹已陈。

此会快然欣得地，相娱一室岂无因？

邓春澍(1884—1954)，一名澍，号青城、石圣，又号五百石印富翁，自号邓蛮，江苏武进人。青年起设私塾课徒，爱好写字、吟诗、作画，精铁笔。以画石著，故称石圣。以藏印丰，故又自号五百石印富翁。著有《绘余计草》《四韵堂印存》《两宜室随笔》《青城画萃》《青城石谱》《胜游图韵》等。其《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七律诗云：

欣从吴会集群公，都是骚坛角逐雄。

觞咏刚逢上巳日，笑谈绰有永和风。

兴义韵夏琅玕碧，潋滟香斟琥珀红。

一例兰亭传盛会，山阴如在画图中。

郁葆青(1881—1941)，名锡璜，号餐霞，又号诗龛、兰耦等，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诗人，善书法，尝于上海营别墅于湖上丁家山，与陈鹤柴、孙玉馨、姚洪淦组织鸣社。著有《餐霞书稿》《餐霞集》《郁屏翰赴闻》《餐霞书话》《兰襟集》《鸣社话旧集》等。其《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七律诗云：

山阴驴背驮诗叟，来续兰亭修禊筵。

三月樱花春未老，千秋鸿雪迹成烟。

情怀寥廓泯今昔，天地穹庐岂变迁？

一十九人真放浪，此身如在永和年。

姚洪淦，字涤源，一字劲秋，号心僧，吴兴人。生卒年不详。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辛亥革命后寄居上海，著有《劲秋诗稿》。其《己巳上巳兰亭觞咏》七律诗云：

永和癸丑山阴会，禊事重修几暮春。

万里风烟干净土，一亭觞咏古今尘。

南华妙彻蒙庄旨，东晋难逢逸少人。

香火斯文缘又结，后来追念感前因。

以上四人，孙玉声、邓春澍、郁葆青的生年已经说明他们绝不可能于同治八年(1869)参与修禊活动，舍此，“己巳”只能是民国十八年(1929)。

第五篇

文物鉴赏

葛云飞营装披挂

绍兴博物馆 娄 烈

葛云飞营装披挂由上衣(甲衣)和下裳(围裳)两部分及配件组成。上衣长76厘米,袖长68厘米,胸围140厘米,下裳长105厘米,腰围90厘米。上衣前面直襟对开,铜纽扣系襟,无领,长袖,马蹄形袖口,深藏青色丝绸面料,镶月白色边,白色细麻布和石青色薄丝料作内衬,衣面缀黄铜小泡钉,前胸有金线绣的海水、寿山、火珠、双蟒团纹,两袖边各有一条金线绣的海水、火珠、云



葛云飞营装披挂

蟒纹。下裳分左、右两幅,前面直边对开,后面弧边,圆角下摆,裳料和色泽与上衣相同,镶月白色边,缀黄铜小泡钉,两膝部各有金线绣的海水、寿山、火珠、云蟒团纹,蓝色绵绸系腰。配件不全,仅存一侧护肩、前

挡、左侧挡,以及左、右护领与护耳,配件的料子和色泽同上衣,镶月白色边,缀黄铜小泡钉,护肩、前挡、侧挡正面中间均有金线绣的火珠、云蟒团纹,护领与护耳面各有一条金线绣的火珠、行蟒纹。这套营装披挂是1841年清军定海总兵葛云飞在抗英战斗中牺牲时所穿,1936年葛需生捐赠,20世纪50年代王赋甫转交文物管理部门,现藏绍兴博物馆。一级文物(编号10751,12:66)。

葛云飞(1789—1841),字鹏起、凌台,号雨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属杭州市萧山区)人。清道光三年(1823)中武进士,先后在浙江、福建水师营任职,有丰富练兵、实战经验,著有《制械要言》《制药要言》《浙海险要图说》《水师缉捕管见》《名将录》等。道光十八年(1838)升任定海总兵。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正在家中守孝的葛云飞闻知定海被英国侵略军攻陷,即赴镇海守卫并准备收复定海。次年,英军退出定海,葛云飞率师入驻。定海作为舟山群岛主岛,是镇守要地,葛云飞考察了定海地形地势,认为只守不攻必败,要以攻兼守争取主动防御。于是,他一边修筑土城、炮台,一边制订拒敌于海上的防御计划,报请两江总督给予军备支援,但没有得到支持,又请求预借三年薪俸用于加强防御和筹备水战,再次遭拒,最后只同意修建土



葛云飞故居(金燕摄)

城。1841年9月26日,英军集结29艘炮舰进攻定海,葛云飞与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将士奋起抗击,定海保卫战正式打响。英军倚仗坚舰利炮连续发起进攻,葛云飞和将士们与敌激战六昼夜,多次击退敌军,在战斗中王锡朋、郑国鸿两总兵先后英勇牺牲。10月1日,葛云飞率领最后200多名勇士与英军浴血奋战,葛云飞身负数十处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被炮弹击中胸部,壮烈殉国。牺牲时他仍手握战刀,挺立不倒。清廷为表彰他的忠烈,谥壮节,建专祠。《清史稿》有传。

1936年4月24日,葛氏后裔葛需生将葛云飞所遗营装披挂,通过乡贤王子余捐赠给绍兴民众教育馆展出。抗日战争期间,民众教育馆被日军飞机炸毁,所幸的是营装披挂逃过了此次劫难,随后由王贻甫保管。20世纪50年代,王贻甫将葛云飞营装披挂转交给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后来的绍兴市文物管理局)。2006年,绍兴市文物局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首次对这件文物进行科学保护和修复,2016年移交绍兴博物馆收藏。

鸚鵡鏡的奇妙故事

绍兴博物馆 姜 烈



唐代鸚鵡銜綬紋銅鏡(浙江省紹興博物館收藏)

2019年9月的一天,杭州一家旅行社打来电话,说日本客人委托他们打听浙江绍兴是否有古代铜镜展览,有没有唐代鸚鵡纹铜镜展出。这让我想起15年前一个与铜镜有关的故事,而这面铜镜正是绍兴博物馆基本陈列中的“鸚鵡銜綬纹铜镜”。

鸚鵡銜綬纹铜镜,原藏品登记名称为双鸾銜綬镜。唐代。直径27.8厘米,纽径2.2厘米,缘厚0.6厘米。圆形,镜面平,镜背中心置半球形纽,纽侧有一穿,纽座饰六片花瓣,镜区平地浮雕一对鸚鵡图案,鸚鵡嘴銜宝相花结彩长綬带,围着镜纽展翅追逐,镜缘为凸边,内切边不十分规整。青铜质地,表面呈黑漆古色。镜体破裂,现已初步拼接成整

体。1979年4月绍兴县棠棣公社朱一大队(今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朱家坞村)出土(何校金送缴)。二级文物。绍兴博物馆收藏(编号5370,6:118)。《浙江出土铜镜》和《绍兴文物志》均有载录。鸾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鸟,其形象类似于凤凰。鸂鶒在唐代也被认为是祥瑞之鸟,两种图案经常出现在唐代铜镜上,有时会产生混淆。仔细观察,鸾鸟的头部较小,嘴尖腿长,鸂鶒的头大而圆,嘴短腿矮,上喙下钩,因此,该镜图案当为鸂鶒,称鸂鶒衔绶纹铜镜比较恰当。

据浙江省博物馆陈浩先生介绍,日本鸟取县三朝町三德山三佛寺也有一件中国鸂鶒纹铜镜,与绍兴这件铜镜时代相同,图案相似,尺寸一致,但在镜的正面用阴线加刻了佛教密宗胎藏界曼陀罗诸佛像,并有“长德三年”和“女弟子平山”等字样。日本学者认为该鸂鶒纹铜镜是中国唐朝铸造,公元8世纪由遣唐使从中国带回日本,珍藏了两百余年后,到平安时代的长德三年(997),一位叫“平山”的佛教女信徒在镜面上刻上佛像和文字,奉献给三德山三佛寺,此后三佛寺将其保存至今。现铜镜破裂已修补。

2002年秋,日本方面得知浙江有一件高度相似的铜镜,即与浙江省博物馆联系,希望了解具体情况。2003年10月初,日本三佛寺住持米田良中、奈良国立博物馆佛教美术研究室室长松浦正昭、三朝町教育



唐代鸂鶒纹铜镜(日本鸟取县三朝町三德山三佛寺收藏)

委员会教育长德田洋辅、鸟取县教育委员会事務局文化财主事滨隆造等一行6人专程来浙江省博物馆考察这件铜镜,中日双方对绍兴出土的双鸾衔绶镜和三佛寺收藏的鸚鵡纹铜镜进行了研究,确认两件铜镜为出自唐代同一铸镜作坊的“兄弟镜”。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当地的广泛关注,同年11月中旬,鸟取县前副知事河本永义率领包括日本记者在内的20余人访问团,前来浙江省博物馆亲自见证这件铜镜。

日本称之为“兄弟镜”的铜镜,在中国叫“同模镜”,陈浩先生对此专门做过探研。铸造铜镜一般先制模,再翻范,后浇铸,如果铜镜图案特别精细繁复,则要制祖模、母模和蜡范进行失蜡法浇铸。但要做到两镜完全相同,必须是同范或同模。然而当时多用陶范,陶范浇铸一次即毁,那么只能是同模了。同模镜就是用一个镜模翻制出两个或多个镜范,然后浇铸成同样的孪生铜镜。其实,同模镜从战国到明清历代都有,只是被发现的不多。这两件远隔千里之遥、离别千年之久的“兄弟镜”能够再次相认,真是一个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奇妙故事,同时也要感谢圆这个故事的三佛寺住持米田良中先生、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先生等一批中日学者和热心人士。

泗龙桥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马峰燕

泗龙桥，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鲁东村南部，纵跨绍兴青甸湖与鱼渎江之间宽阔的水道。该桥原名鲁墟桥，由三孔拱桥与十七孔梁桥组合而成，俗称廿眼桥。据《绍兴县地名志》记载：“因桥形像龙，桥墩凿有四只龙头，故名泗龙桥。”该桥始建年代不详。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载：“鲁墟桥，在（山阴）县西北一十三里。”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八、明《嘉靖山阴县志》卷二、清《康熙绍兴府志》卷八、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八以及清《嘉庆山阴县志》卷五等文献都有类似记载。可见，该桥至迟在南宋即已存在。现桥为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鲁墟村王氏和东浦陈忠义、酒坊主陈阿龙为首集资重建。

一直以来，由于桥名变更，人们通常认为泗龙桥始建于清代，对该桥的由来在认识上存在模糊之处，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证。根据笔者考证，泗龙桥的前身是鲁墟桥。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地名演变而言，泗龙桥所在的鲁东村，原是鲁墟村的东部。因此，泗龙桥与鲁墟桥在同一个村的范围内。第二，从方位、道里方面来看，《嘉泰会稽志》称，鲁墟桥在山阴县西北十三里。按，宋代山阴县治的地理位置

在绍兴城内塔山西边,即今绍兴文理学院附属中学一带。从今塔山西边进入绍兴护城河(古人乘船去绍兴城西,常取水偏门出城进入护城河),由护城河向西北迂回进入青甸湖,再向西到泗龙桥的实测距离大约7千米。由于宋代的1里比现在1华里要稍远一些,所以上面的实测距离,相当于宋代的13里。因此,宋代鲁墟桥的方位、道里与当今泗龙桥的方位、道里是一致的。第三,从水环境变化来看,《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载:“(鲁墟桥)南为漕河,北抵水乡,如三山、吉泽、南庄之属,又北复为漕河。漕河之北复为水乡,渺然抵海,谓之九水乡,盖大泽也。曾文清诗云‘谈夸水乡胜,谓不减吴松’,即此是也。”鲁墟桥地处水泽之中,南北两边都有运河。按,鉴湖在南宋时期由于围垦越来越严重,大部分已经退化为河道,所以鲁墟桥南边的运河,实际是今天残存的鉴湖遗址,在宋代曾发挥漕运的作用。而鲁墟桥北边的运河即西兴运河,是如今尚存的浙东古运河的一部分。《嘉泰会稽志》对鲁墟桥水环境的描述与今泗龙桥南北两边的水系分布情况相吻合。宋代吴淞江尚比较宽阔,曾几(谥号“文清”)的诗借此表明鲁墟桥当时所跨的水面也比较宽阔。考察今鲁东村附近青甸湖与鱼渎江之间的水道宽度大多超过

泗龙桥



100米，泗龙桥南北长达96.4米，也与鲁墟桥超长的跨度相吻合。另外，泗龙桥南面的桥亭——迁善亭上刻有对联“建近千年路达南北，名驰廿眼水通东西”，也表明泗龙桥自宋代即已存在。综上考证，泗龙桥的前身就是《嘉泰会稽志》所记载的鲁墟桥。

泗龙桥是拱梁结合型石桥。拱梁结合型石桥是一种适于在河道较宽、水流较缓的地方建造的桥型，它在沟通两岸的同时，能发挥既确保通航又省工省料的优点。这种石桥为全国其他地方罕见，而在绍兴的水乡多有分布，因而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桥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泗龙桥的三孔拱桥在北，象征龙首，十七孔梁桥在南，象征龙身和龙尾。拱桥高敞是为主桥，也是舟楫航道所在。拱券构造为纵联分节并列砌筑，薄墩，跨度很大，中孔净跨6.1米，两旁的边孔跨度均为5.4米。南、北对称筑阶落坡。桥面两侧置实体石栏，间立风灯墩、石望柱，部分望柱上刻有捐助者姓名，桥墩置抱鼓石收结。桥栏两面雕刻花卉、暗八仙和菱形纹饰，线条流畅，雕刻精美。梁桥低平，桥墩用条石顺丁叠砌，上面均架三块石梁作为桥面。梁桥近主桥附近的四孔最大跨度为5.4米，其余均为3米。梁桥上设有石质护栏，保障人行安全。梁桥造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平面并非直线，而采用蛇形链接形状。这种造型是根据天然河道水流动力的特点有意设计的，旨在借助桥体形成的拱力以消减、抵御河道水流的冲击力，延长桥体的寿命。泗龙桥状如伏水舞龙，十分壮观，其蛇行链接状完全符合现代桥梁学原理。

泗龙桥是绍兴现存水面跨度最长的石桥之一，其所在的鲁东村（原鲁墟村）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父祖辈的“故庐”所在，诗人在作品中曾多次吟咏当时古桥周边的景色，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1979年被公布为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与广宁桥、光相桥、太平桥、谢公桥等12座古桥组成绍兴古桥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在我国桥梁建筑、历史、工程、水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泗龙桥被《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著录。

绍兴博物馆收藏的 三件北宋越窑青瓷简介

绍兴博物馆 陈 峰

越窑青瓷是我国起源早、规模大、烧制时间长而又影响较为深远的青瓷窑体系。越窑的主要窑场集中于今天浙江的绍兴、上虞、余姚境内，这里山峦起伏，江河湖泊密布，土地肥沃，优越的自然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越窑青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士大夫阶层高贵华丽的生活追求更为越窑的繁荣兴盛创造了条件。越窑青瓷肇始于东汉，经过三国、两晋的积累，发展于唐、五代、北宋，到北宋中期，随着各大名窑的纷起，越窑逐渐衰落至停产。

北宋初期，越窑仍属三大官窑之一，并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装饰以纤细刻花为主，图样繁而有序，技术娴熟流畅。装饰题材广泛，常见的有持莲婴戏、双凤衔枝、双蝶飞舞、龟伏荷叶、鸟栖花丛及牡丹纹、莲瓣纹、龙纹、水波纹等，纹饰清丽洒脱，栩栩如生。窑具多采用泥条支烧，故多数器物底部有支烧痕。当时越窑产品的品类和器形，在唐代创新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拓展。有宫廷和民间的日用品瓷，有殡葬用品、瓷墓志，有装饰用品，有用于校勘和演奏的乐器等。根据对越器出土的初步统计，仅在这个时

期的日用品,就有几十种器类,如盘、碗、洗、碟、杯、钵、釜、盂、唾壶、大缸、盆、瓶、罐、灯、多角瓶、捣药壶、罍、水注、托杯、盅等。当时的越窑产品还大量销往海外,极大地促进了越窑的繁荣。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各地名窑迭起,贡窑停烧,外销减少,越窑逐步走向衰落,至南宋完全停烧。

悠久的历史、重要的文化传承造就了绍兴灿烂的历史文化。绍兴博物馆收藏有一定数量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产品。下面选取馆藏的三件北宋越窑青瓷做简要介绍。

北宋越窑“咸平六年”青釉四盞瓷罍

1979年上虞市上浦镇石浦村出土。口径12.0厘米,高26.5厘米,底径8.5厘米。盘口,长颈,弧腹,圈足。颈肩部四向置双腹盞。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釉质滋润,有细开片。腹部有铭文四行,曰:“上虞窑匠人项霸造粮婴(罍)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斤咸平六年七月廿日记。”三十一字,记产地、作者、用途及纪年等。下腹部有一处粘渣,盘口一侧及四执盞残缺。越窑青瓷。(图一)



图一 北宋越窑“咸平六年”青釉四盞瓷罍

北宋越窑青釉剔花圈足瓷粉盒

1963年绍兴珠宝商店移交。口径11.8厘米,高5.5厘米,底径10.8厘米。子母口,直肩,斜腹,弧底,圈足外撇。盖为直沿,弧顶,顶面剔雕连理花蕊四朵,外围三道弦纹,外缘饰一周月牙形纹带。通体施



图二 北宋越窑青釉剔花圈足瓷粉盒

青釉，釉面有缩釉点，合盖处无釉。底部有垫烧痕迹。越窑青瓷。（图二）

北宋越窑青釉刻莲瓷罐

1993年绍兴市文物公司调拨。口径6.2厘米，高8.3厘米，底径6.8厘米。敛口，平沿，圆唇，弧肩，圆鼓腹，高圈足直立，底心微弧凸。腹部浮雕三重仰莲花瓣，使整个器形犹如一朵初开的莲花，造型优美。内外通体施青釉，釉色晶莹，花瓣沿缘泛青紫色。底部残留垫烧痕迹。越窑青瓷。（图三）



图三 北宋越窑青釉刻莲瓷罐

版权页